

鳳凰週刊

楊秀珠案幕後

被貪腐出逃改變的楊氏一家

揭秘抗日劇中的「鬼子」群演

尼泊爾懸念：印度還是中國？

內外蒙古兩大活佛的興衰





《凤凰周刊》上期封面



凤凰周刊官方网站



凤凰周刊苹果电子刊



凤凰周刊微博



凤凰周刊微信



世界遗产地理官方微信

鳳凰週刊

PHOENIX WEEKLY

為全球華人提供獨立意見

咨询服务热线

深圳0755-25934567/北京010-65281005/
香港00852-22008790 传真0755-25934579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董事长/出品人 刘长乐
行政总裁 崔强
编委会副主任委员 王纪言 杨家强 周军
编委会顾问 余秋雨
编委(姓氏笔划为序) 王酉年 王多多 邓飞 刘庆东 刘爽 何新京 吴晓镭
钟大年 段敬 郭志成 唐建 袁路 喻凌霄
编委会秘书长 孙谦

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

社长/总编辑 孙谦
副社长 丁晓曙
副总编辑 蓝艺
主编 师永刚 周宇
副主编 崔世海 段文
总编室主任 魏恭 总编室副主任 黄楠
编辑部主任 崔世海(兼) 编辑部副主任 王毕强 路琰 漆菲
主笔 叶润洋 段宇宏 袁凌
主任编辑 晓波 李光
编辑 徐伟 陈祥
首席记者 钟坚 张弛
主任记者 孙杨 曾鼎 吴如加
记者 湛彦辉 徐佳 王琰 李克难 马军 刘荣
邱锐 郭天力 赵福帅 曹蓓 闵云霄
特派记者 李想(华盛顿特区) 蔡源(墨尔本) 田晶(巴黎)
特约主笔 曹景行 杨锦麟 南方朔 谢国忠 阮次山 何亮亮 石齐平
美术总监 小米 图片总监 丁大伟 美编 黄静 虎妹
多媒体发展部主任 吴穷 广告总监 李泽红
多媒体编辑部编辑 马茹均 莫文辉 韩丰泽 康亦玮 钟新星

香港凤凰周刊副总经理 崔博

海外事务总经理 夏婷婷 / 社长办公室主任 赵海燕
大区业务总经理 齐崇轩 柳楚光 傅张伟 高卉 周卫 李莉 / 出版事务部主任 李迪 / 副主任 张云
驻地代表 北京 贾楠 / 上海 金龄 / 广州 陈卫东 / 南京 任浩

法律顾问 王霖 财经顾问 沈铭

编辑出版 香港凤凰周刊有限公司
编辑部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 电话 00852-22008790
社址 香港新界大埔工业邨大景街2-6号凤凰卫视总部 电话 00852-22008888
深圳办事处 深圳市深南大道2008号中国凤凰大厦1号楼6楼 邮编 518026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楼 邮编 518001
电话 86-755-25934567(订约热线) / 25934558/25580179/25934597
Email: weekly@phoenixtv.com.cn
北京办事处 北京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金龙建国温泉酒店3211室 邮编 100005
电话 86-10-65281005/65281006(订约热线) / 65211745(办事处)
Email: cuibo@phoenixtv.com.cn
北京凤凰雨翔广告有限公司 汽车、外航行业总代理 IT、房地产行业代理
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10号院 电话 010-84467053/84467054
浙江金色凤凰影视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浙江省区域广告总代理
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内)凤凰科技楼7号楼6层 电话 0571-87175087
上海新泽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广告总代理
上海市余姚路288号1号楼7楼 邮编: 200042 电话 021-63511838
深圳市派动广告有限公司 华南区钟表、金融、洋酒、红酒、地产行业总代理
深圳市福田区上步中路南方日报大厦7楼 0755-83226011 0755-83225602
凤凰周刊理事单位 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中国内地进口/发行总代理 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工体东路16号 电话 86-10-65063082
承印人 凸版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北角电气道169号宏利保险中心20楼

中国大陆广告总代理 神州电视有限公司

北京分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77
上海分公司 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1927室 电话 021-52925188
成都分公司 成都市人民南路二段55号峨山饭店商务楼2705室 电话 028-85588710
武汉分公司 武汉市建设大道700号香格里拉饭店432号 电话 027-85781338
西安分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东大街319号索菲特人民大厦东楼2层 电话 029-87928666
沈阳分公司 沈阳市和平区和平北大街69号总统大厦A座2103室 电话 024-22814065
凤凰卫视广告综合业务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公园南路(朝阳公园西南角)凤凰中心南楼3层 电话 010-65207833
广东一代传媒 广州市东山区文德路67-69号金德大厦28楼 电话 020-83226130

广告委托代理商 深圳市凤凰星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邮编 518001)
广告热线 0755-25580179 传真 0755-25580169
广告客户服务热线 0755-25580179/25934597 传真 0755-25580169

本期所有文字和图片作品经著作人授权本刊,未经许可,不得摘编。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作品并不代表本刊立场观点。
本刊字体由方正电子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教育转型应走在产业转型之前

□ 周兼明

《中国青年报》近日公布的中国社科院对2013年应届生的就业调查报告显示,昔日被誉为农家骄子的农村家庭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达30.5%,已成为就业最困难群体。报道引用《人民日报》的文章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寒门子弟曾将改变贫困的希望寄托于教育,然而梦想还未出发,在现实前就已折戟。大陆的教育体制所承载的阶层流动功能,正在慢慢丧失。

阶层固化问题固然重大,但若一味按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来评判大学生失业率,反而可能遮蔽了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更要害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的同一调查显示,城市家庭出身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也达到13%,考虑到城乡人口比例和基础教育差异,城乡大学生的失业率还不算过分失衡。前些日子,大陆发布了2014年教育公报,数据显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37.5%,这一看似喜讯的数据透视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城市化与工业现代化水平远超中国的德国,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只占30%,70%以上高中学生只能选择接受各类职业教育。这些年来大扩招加上适龄受教育人口的下降,使得中国高校入学率过快上升,普通高校学生比例过高,职业教育的人才太少,不仅已成为大学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因,亦验证了当下教育结构与整体产业层次的不相适应,更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这非常值得反省!

大学生多,乍看起来是好事。但如果大学生成了新增劳动力绝对主力,且与中国当下或未来的产业结构不匹配时,便成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难题。人社部数据显

示,近两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中,应届大学毕业生所占比例都超过50%,在独生子女和高校扩招这两个条件的推波助澜下,此数据以后还会水涨船高。想想新增就业人口中有一大半都是大学生,那些低端行业的劳动力只会流失得更为严重。或许,对一个欧美人来说,读完大学去从事技工或服务性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无法接受。所以我们看到,一边是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说“用工荒”,北京的钟点工收入高的近万元,但另一边是有大量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这种教育和就业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说明中国的教育发展战略与布局的转型已迫在眉睫。

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已成为必然。一方面,在原有的产业结构中,电力、石油、冶金、化学、机械等重工业及基础性产业的比重实在太高;另一方面,急需新增的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将快速上升。这些产业结构的变化不仅需要高层次的创新型、知识型人才,更需要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中国将会有2200万个工程技术人才缺口,其中大部分是懂得网络技术的高端工科人才,仅软件产业到今年的人才缺口就达300万。而现实情况是,工科的高等教育一直遇冷,大量学生逃离工科,其增幅远低于扩招数量的增幅。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严重匮乏,已成为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与转型的突出问题,这也是先进的工业化德国一直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原因。要解决社会就业困境,势必要从教育与国民经济、产业升级的关系这一高度来重新布局人才培养,科学而合理地确定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既要让教育结构与正在转型的产业结构相适

应,也要把握住产业结构变化的未来对人才需求的脉搏和提前量,使人才供给能满足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的需求。

调整高教结构也符合大陆实际情况。毕竟,大陆还有大量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一味大幅度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对那些学费负担过重又一时难以回报的家庭、以及仍处在低端的产业来说,也是灾难。尽早尽快加大职业教育、专科教育的资金投入,增加专业技术技工的培养,不仅是为中国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奠定一个务实的人才基础,也是对低收入家庭和低端产业提供务实帮助。

当下不少大学的科研选题与产业需求严重脱节、大学教育体系与科研体系严重脱节、大学的评价体系与产业发展严重脱节,这些都导致大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产业人才。对大学教师准入的文凭门槛越来越高,使得大量教师只能从校门到校门,完全缺乏产业经验与工程实践经验。要鼓励企业界人士参与到职业教育体系中,他们的到来,对产业需求与教育的衔接大有裨益。

此外,还需在大学与社会上营造一个崇尚技能、尊重劳动、重能力轻学历的风尚。只有建立多样化的人才观,才能提高学生们对成为技能型人才的兴趣。不深化改革中国的教育理念与转变教育结构,要想改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产业结构想要升级转型,教育结构的升级转型需先行。对谋求发展的中国,这才是根本。



扫二维码
看往期精选



18 杨秀珠案幕后

COVER
STORY

杨秀珠在美受审不断推进，其遣返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胞弟杨进军被遣返，在海外流亡12年的杨秀珠归期将近。杨犯一旦归国，其震荡效应殊未可知。

红云红河集团
HONGYUNHONGHE GROUP
赠阅部分嘉宾

卷首语 Editorial

3 教育转型应走在产业转型之前

现在时讯 Trending

6【瞬间/封面/台港澳/中国观察/环境&科技/阅读/军事】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8 杨秀珠案幕后
26 被贪腐出逃改变的杨氏一家

大陆时事 Mainland Politics

30 中国卫生领域潜力巨大
32 抗日剧中的“鬼子”群演

台港澳 Taiwan Hong kong & Macau

36 香港政商界刮起创办智库风

抗日剧中的“鬼子”群演

身为日本人，却在中国影视剧
中扮演侵华战争的日本兵形
象，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32▼



观察 Observer

38 中国国企改革的亮点与悬念

国际 World

40 默克尔十年
46 印度封锁尼泊尔内情

军情 Defense

48 俄牵头“四国情报联盟”刺探IS

特别报道 Feature

50 摩托车驰骋的草场
58 联合国70年：中国角色之变
66 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世界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角色

财经线 Business

- 68 大陆能否承受GDP增速破7
- 72 P2P+保险, 谁是赢家?
- 74 财经资讯

图谋天下 Galleries

- 78 贫穷笑不出来

历史档案 History

- 84 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
- 88 微史记

文化 Arts & Culture

- 90 情非得已, 势所必然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
- 94 被误解的英国《大宪章》

行走 Traveling

- 98 我的故乡昆明

三地书 Books

- 102 穿行于古老又新鲜的唐诗

资讯前线 Advertorial

- 76 浙江花园村首创村域城镇化发展新模式

36

香港政商界刮起 创办智库风

当内地创办智库蔚然成风时, 香港政商界的智库也如雨后春笋冒出, 最大智库由前特首董建华牵头。



默克尔十年

在外界看来, 默克尔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有原则, 但能灵活运用和尊重现实。

40▲

50▼

摩托车驰骋的草场

驾驶割草机打草、或者乘着皮卡车和摩托奔驰的牧民, 无从真正赶上外界的急速变化, 却在草场上留下了过深的辙痕。



联合国70年: 中国角色之变

与上世纪70年代“参与不投票”的沉默角色不同, 如今的中国已然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

58▲



广告目录

奥迪 / 第一跨页 周刊征订 / 封三 《世界遗产地理》 / 封底
《凤凰周刊·生活》 / 13 松下 / 17 北京友谊宾馆 / 45 多媒体 / 75
芬迪 / 97 将本刊作为指定读物的航空公司和酒店 / 104





MOMENT

瞬间

英国 2015 / 10 / 2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英期间在威斯敏斯特英国议会大厦发表演讲，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

全球每年125万人死于交通事故

尽管交通工具数量增加，全球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近几年保持不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10月19日在日内瓦发表的一份报告：

自2007年以来，全世界每年有

1250000 人
因为交通事故死亡
95% 在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的国家

54% 中低收入的国家
机动车数量占全世界百分比

每十万人中 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美国
10.6人

非洲是全世界交通事故
死亡率最高的地区

资料来源 德国之声 10月20日

瑞典	2.4人
瑞士	3.3人
荷兰	3.4人
西班牙	3.7人
德国	4.3人
法国	5.1人
奥地利	5.4人
意大利	6.1人
希腊	9.1人
波兰	10.3人

中国
18.8人

救命！我爸妈是千禧一代

•《时代》周刊 / 2015.10.26

→ 到目前为止，千禧一代的成员——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人基本上专注于自我。他们受到“直升机父母”的呵护，拿过无数奖杯，结交了众多朋友。他们是亲人眼中“特殊的雪花”，是婴儿潮一代养育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现在，千禧一代面临的一个新挑战转移了他们的关注重点：育儿。

美国的千禧一代父母超过2200万人，日均生育约9000名婴儿。同上一代人相比，这批父母谙熟电子产品，民族成分多样，结婚较晚，不太囿于传统性别角色。千禧一代的很多人在美国经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下滑时期走入职场，他们促成了人人都应随时处于接通状态的文化。与此同时，这些刚刚成年的人从小到大视个性和自我表现为最高价值观，他们试图把自己的家庭当作微型民主团体，连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也希望得到配偶、子女和朋友圈的赞同。他们教育孩子要坚持自我本色和尝试新事物，往往在不经意间训练小家伙们把体验当成记录下来并与全世界人分享的东西。

千禧一代承受着强大的压力要当伟大父母。宝宝中心国际育儿网今年2月发布关于现代母亲的年度报告，它调查了2700名年龄在18岁至44岁之间的美国妈妈，结果发现，约80%的千禧一代妈妈认为做“完美妈妈”很重要，而X一代（生于60年代中期-70年代末）持相同观点的妈妈约占70%；综合各年龄组来看，64%的妈妈认为如今养育孩子比过去更有竞争性。当今育儿过程的另一个固有特点是：信息过量。在本刊的调查中，58%的千禧一代父母觉得可参阅信息非常或极端泛滥，而X一代的比例是46%。甄别所有人的观点并确定哪个最权威最终会耗费大量时间。心胸开阔，善解人意，有探索精神。这就是千禧一代父母在被问及希望孩子长大后具有哪些品质时给出的答案。这些千禧一代父母或许正在达到他们的预期效果。



美国的千禧一代父母同上一代人相比，这批父母谙熟电子产品，民族成分多样，结婚较晚，不太囿于传统性别角色。



1

美联社

2015/10/19

研究：中国沿海湿地极濒危 或破8亿亩红线

除了空气质量，中国不断缩小的湿地问题也不容小觑。10月19日，一项研究指出，中国沿海湿地极度濒危，总面积势必突破政府划定的“红线”。该研究由保尔森基金会与中国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合作。报告指出，中国所有类型的生态系统中，沿海湿地受到的威胁最严重，但保护力度最小。大规模和快速的填海造地是沿海湿地消失的首要推动力。报告认为，按照中国对2016年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规划，沿海湿地总面积势必突破政府规定的8亿亩湿地保护“红线”。

2

彭博社

2015/10/20

中国建筑资产总量超美

以很多标准衡量，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以建筑资产规模计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据最新公布的阿卡迪全球建筑资产财富指数，2014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建筑资产规模最大的国家，到2025年其建筑资产规模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这项研究指出，2014年中国建筑资产规模为47.6万亿美元，为全球最大；美国位列第二，为36.8万亿美元。未来10年中国建筑资产的规模将超过紧随其后的四个经济体的总和。在中国建筑资产快速增长的同时，美国却在进行替换老旧机械、设备及建筑的软投资。



《康熙》走了：一个娱乐帝国的崩解年代

• 《金融时报》中文网，节选 / 2015.10.19

→ 一个电视节目，能令人爱憎强烈，评价两极，本身就反映一种时代断面；尤其当它曲终人散、人走茶凉，仍能激发一众在电视频道、新闻网站、社交媒体纷纷议论，仍让人愿意回头一顾，重看那些掌声、讪笑与衰微，背后，或许浓缩一个社会的文化痕迹。

享寿十二年，台湾刚宣布停播的《康熙来了》，无疑可归于此类。

《康熙来了》的崛起，本身就有多重时代迭影。先说内部气候，2002年，野心勃勃的台湾《中国时报》集团少东，一意跨出纸媒版图，购并台湾“中天电视”，开始重整旗下几个频道。2004年，原有“中天资讯台”改制为“中天综合台”，《康熙来了》就是综合台转型后的第一记响炮，自此成为镇台之宝。

再看外部气候，《康熙》之前，台湾综艺节目仍由无线电视台称霸，高成本、大卡司集中轰炸周末黄金时段。周间带状综艺节

目以娱乐新闻、星座命理、模仿秀为主；至于晚间九点到十一点的精华时段，当时主旋律是政论谈话节目，尤以电视台TVBS、三立、民视多空交锋。

在此竞争格局下，中天电视祭出奇兵，挪借政论节目的形貌，套入娱乐八卦访谈的血肉，由《康熙》杀入晚间十点的兵家必争之地。此前，台湾的综艺谈话性节目，大多是主持人与来宾，一人一只沙发分坐两头，一问一答，娓娓道来，像是节奏缓慢的业余网球赛，蔡康永先前主持的节目《真情指数》就是一例。

《康熙来了》以知性作家与搞怪少女的反差组合，一冷一热，一刹车一油门，意外开创娱乐谈话节目的新型格；而且代入政论节目的节奏与形式后，两位主持人对垒多名来宾，机关枪式的节奏，主题在全场来回狂奔，岔话、跑题、高空拦截、互抢篮板，像极一场打满四十分钟的斗牛篮球，唯一规则就是没有规则，唯一禁忌就是百无禁忌。

如此新鲜出格，在强弩之末的政论节目时段里，不仅刮起收视旋风，也奠定节目毁誉参半的主调。无论爱恨好恶都不能不承认，小S是节目成败的控球员，她直率、无厘头、膝盖反射式的谈话风格，尤其博得年轻观众的支持；蔡康永反而更像配角，一个睿智稳重的大叔，守在边线旁，慢条斯理接下一球，再回传给小S，或轻轻拨进篮筐。

讽刺的是，《康熙来了》一方面标志台湾娱乐节目的浪潮荣光，另一方面也佐证台湾电视产业的日落衰微。历经纳斯达克股灾，一度被看衰的网际网路，接触率快速蹿升；相形之下，光辉灿烂的“媒体之王”电视，在台湾开始显露老态。以《康熙》诞生的2004年为例，台湾的GDP增长率为6.25%，总广告量则成长了10.03%，然而，无线电视广告量却急缩26.2%，有线电视下跌14.1%；隔年，无线与有线广告量继续滑落了23.5%与8.3%，意味着台湾电视产业进入“低增长”或“负增

长”时代。

在此生态结构下，经营主管无不绞尽脑汁开源节流。以往，周末的招牌综艺节目每集两小时，制作成本动辄台币300万元以上，《康熙来了》则开创一种低成本的节目形态，固定的棚内景、主持人加上几名来宾，插科打诨就能撑满一集，外景或动画后制趋近于零，而且一天连录五集，开棚梳化的成本也压到最低。

所以类似节目席卷深夜天空，《康熙来了》每集50万台币的制作费已称豪华，其他同类型节目大多30万台币之谱，有些甚至下杀不及20万台币，品质可想而知。若要维持较高制作成本，电视台为追求获利，就必须另辟财源，例如，台湾三立都会台由大牌谐星吴宗宪主持的《综艺大热门》，就卖给另一频道东森综合台重播；其他戏剧或综艺节目，也常采取“自家首播、卖给无线台重播”的分摊模式。

《康熙》在台湾造成的产业后坐力，在它的模仿者身上尤其清晰，乘以市场萎缩的重力加速度，电视台越来越不愿投资自制节目，宁可向外购买版权，或一再压低制作成本。对于自制率与重播率，主管机关几乎只能道德呼吁或口头警告。影响所及，近年除了猪哥亮与吴宗宪两大“本土天王”，台湾综艺圈几无足够分量的新面孔及新节目。

《康熙来了》这个拼贴主持人名字、谐拟中国帝王年号为名的台湾节目，见证电视产业日不落帝国的崩解。中天电视所属的媒体集团，也已易主卖给食品公司老板。如今，台湾电视的首要竞争者是YouTube、脸书，《康熙来了》迎合网络世代的喜好脾性而生，也因网络世代集体脱走而终老。（黄哲斌）



中国既没有能力像美国那样在国际层面反恐，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武力为导向的传统思维方式。因此，中国必须在反恐问题上自我创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有效方式。

中国需要调整反恐战略

●《联合早报》，节选 / 2015.10.20

→ 毋庸置疑，无论从内部还是外部来说，中国的反恐正在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局面。从内部看，起源于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疆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频繁，主要表现为几个特征。

第一，恐怖组织（或者恐怖组织指使的个人）经常用暴力冲击地方党、政、警察机构。第二，他们用暴力残杀地方温和的穆斯林领袖，对那些与汉族友好的温和穆斯林领袖和民众施加了压力，甚至威胁其人身安全。第三，在很多场合，他们无差别地残杀普通平民，尤其是汉族民众。第四，激进穆斯林行为和恐怖主义早已经从少数民族地区向全国各地延伸。在人口流动的今天，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就很难控制。从各地爆发出来的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事件来看，恐怖主义分子可以说是已经遍布整个国家。第五，他们和海外的关联越来越深。这一特征在全球化时代也不可避免。就中国来说，由于海外拥有大

量的穆斯林和藏族人口，恐怖分子通常很轻易就可以利用中国穆斯林和藏人的海外社会关系，为他们的恐怖主义活动服务。

从外部看，穆斯林激进主义也在影响中国的正常外交，对其产生着很大的负面影响。土耳其最近的反华活动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年来，只要有反对党和非政府组织强大的地方，就很容易产生针对中国的激进行为。本来是当地政治力量之间的政治斗争，但一旦涉及到穆斯林等宗教行为，就会演变成针对中国的行为。这一点今后会越来越明显。

随着中国的崛起，利益遍布世界各地，中国的问题也必然会成为各国地方政治的一个焦点。如果是在穆斯林国家，当地的“反华”行为就会很快激进化，甚至有可能演变成恐怖行为。因此中国需要调整反恐战略，改变目前的颇为被动的局面。这就要求人们要分析迄今为止的全球和中国本身的反恐战略，考察这些战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目标，

在哪些方面没有成功，不成功的原因在哪里。

自从发生“9·11”恐怖主义事件后，美国一直在主导世界范围内的反恐，那些也同样面临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包括中国，也在各方面和美国合作或者追随美国反恐。这种紧密的合作和追随方式，往往导致其他国家反恐的“美国化”。“美国化”指的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指的是美国反恐的两大方法。第一，暴力化，即以暴制暴；第二，民主化。

从结果来看，无论是军事手段还是推行民主，两者都失败了。在当今世界，内外条件都不能导致美国的成功。美国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或者搞殖民（例如菲律宾）或者搞占领（例如日本和西德）了。在世界范围内来说，这样做已经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就当地社会来说，当今的世界是主权国家，各国都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即使就美国国内来说，占领成本过高，很难持续。

美国反恐战略的失败，说明了恐怖主义越来越甚。首先，军事手段征服不了恐怖主义，反而导致越来越多的恐怖活动，并且以美国和西方为目标。例如今天

“伊斯兰国”的首领，就是过去萨达姆政权的军人领袖。第二，美国推行民主的结果，不仅难以发展出西方式的民主政权，反而使得很多国家面临甚至成为失败国家。现行政权一倒，往往爆发内战，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政治温床。第三，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反恐，也导致着全球范围内激进穆斯林的崛起。“伊斯兰国”已经吸引了来自包括欧洲、俄国、中国、东南亚等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可以说是“联合国军”。

那么，中国该如何反恐？很显然，中国不能重复美国的方式。中国实际上既没有能力像美国那样在国际层面反恐，也没有像美国那样的以武力为导向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必须在反恐问题上自我创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有效方式。什么样的方法才会有效呢？就是在用强制手段遏止恐怖主义嚣张的同时，诉诸文化方式、通过动员温和穆斯林来全面管控激进穆斯林主义，在有效缩减和控制激进穆斯林的社会基础的同时，防止激进穆斯林演变成恐怖主义。

中国需要的是重建文化软实力，并把之引入反恐。

（郑永年）

中国股市重现生机 部分投资者悄然回归

• 路透社 / 2015.10.19

→ 中国政府几个月来一直在努力,试图让投资者重返饱受冲击的股市。现在随着资金开始回流,这个愿望有可能变为现实。中国指标沪综指目前仍较6月高点低1/3,但市场无疑已经显现恢复活力的迹象。最近沪综指触及七周高点,也获得四个半月以来最佳单周表现,而且六周以来首次出现资金净流入。实际上,单周交易量与成交金额也在10月16日突破10日与100日均值。

“重新买回股票的时候已到,”南海基金管理的基金经理David Dai表示。在股市暴跌时期,他将资产组合中股票的比例削减

至只剩10%。目前他所管理的2亿元人民币基金中,股票占比达到70%,投资项目包括云计算、卫星导航与制药等行业。“市场回归正常。我认为目前没有任何系统性的风险,”他表示。

不过,股票交易员表示,没有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股市为何突现恢复生机的迹象。中国股市在夏季经历了剧烈震荡,之后的股市仍是数周不见起色,大量投资者离场观望。一些分析师认为,当前的买盘是为了在政府出台新的经济刺激措施前先行布局。中国2015年全年经济增幅可能创下2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另外,美国今年升息可能性下降也



刺激了买盘。

“大家都认为,股市此次反弹是因为部分投资者增加股票仓

位,”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位基金经理说。“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很多投资者在股市崩跌时遭了殃,甚至大败亏输,他们是否会很快重新入市,我表示怀疑。”

上海前四大追踪主要股指的上市交易基金(ETF)过去数周有小额资金流。这些ETF通常是保险业者等大型机构投资人用来对股市涨跌押注的工具,因此ETF买气温吞意味着资金实力雄厚的投资人仍持审慎态度。对于其他人士而言,年中股市暴跌所带来的伤痕难以抚平。“我现在不会回到市场,”现年22岁的广州学生Zhou Junan表示,他1.5万元人民币的投资亏了2/3后,于9月退出市场。Zhou称,“在连串疲弱的经济数据之后,没有什么经济面的好消息来提振股市。”

中国会否为强国地位而开战?

•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 2015.10.19

→ 澳大利亚学者保罗·迪布最近写道,由于中国存在长期的系统性问题,这将阻止其继续崛起为亚洲强国,而且中国作为一个“脆弱国家”承受不起战争,因为战争失败的风险太大。但他忽略了中国的战略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而这些都在深刻地影响着今天乃至未来中国的政策抉择,包括发动战争的决定。

中国方面宣传的“中国梦”理念要求恢复中国传统,从中国的角度看就是恢复中国作为亚洲重要大国的合理地位。从国内方面看,它要求中国不断发展和积累综合国力;而从外交政策方面来说,它也要求中国以对己有利的原则来解决台湾问题以及南中

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当中国说一定要实现两岸统一时,中国是非常认真的;而当中国说南中国海属于中国时,它也是认真的。在北京看来,中国宣告的“九段线”是不能讨价还价的。同样,以对己有利的原则来解决中日钓鱼岛争端对北京来说也很重要。

在考虑中国是否会开战时,重要的是理解中国是如何看待该地区,又是如何看待亚洲的安全挑战的。给中国的民族身份带来伤痕的“百年屈辱”观念有一种强大的历史力量,而认识到这种力量至关重要。中共利用“百年屈辱”的伤痕以及中国社会内部的民族主义,将自己在安全争端上的活动合理化并推而广之。

有一个很有力的政治表述,那就是结束“百年屈辱”的是中共,复兴中国大国地位并实现“中国梦”的也将是中共。中国不能在台湾、南中国海和钓鱼岛问题上退缩。这样做会打破“中国梦”,而一旦“中国梦”破灭,中共的合法性也将破碎。

保罗·迪布还提出,中国没几个有实力的朋友,面临战略孤立问题。我觉得这种评估不能令人信服,因为随着中国推广“一带一路”计划,中国及其邻国之间将会实现更高层次的整合,中国的软实力将越来越大。“一带一路”是中国大战略和周边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与邻国间的相互依存发展,邻国将它们的成败系于中国崛起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条条大路通北京,中国将再次成为21世纪的“中央之国”。

该计划的地缘政治意义是重

要的,并对保罗·迪布“孤立的”中国的观点提出挑战。中国对发展中邻国的投资——特别是考虑到投资并不附带政治改革要求是如此之好,以至于接受国不会让中国的经济慷慨遭受任何风险。这势必将会影响到它们在危机时的外交政策考量,一些国家保持中立或与北京而非华盛顿结盟的可能性更高。

保罗·迪布说中国无法承受失败,这点是正确的,但我不同意他的解释,即这会使中国不敢进行战争。“中国梦”的成功与否不仅事关国内经济增长,还事关中国能否重返亚洲大国地位,能否以对己有利的原则来解决海上领土争端,能否防止美国围堵,能否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并削弱美国及其盟友的影响力。中国将为捍卫这些目标而战。

(马尔科姆·戴维斯)

中国再现山寨名城

• 《朝鲜日报》网站 / 2015.10.20

→ 中国港口城市大连最近出现占地40万平方米的“山寨威尼斯”。“山寨威尼斯”的大小是实际威尼斯的千分之一，是大连海昌集团从2011年开始斥资50亿元人民币投资建成的。为了真实再现威尼斯的面貌，海昌集团将海水引入大连市内并挖出宽15米、水深1.2米、长4000米的人工运河。法国ARC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运河两岸的欧洲风格建筑。

10月17日开始，运河一公里范围内已经可以乘坐小船游览。到明年5月，运河两岸的200多个欧洲风情的建筑建设完成之后，游客将可以感受威尼斯的异

国风情。运河里还有只能在威尼斯看到的黑色小船“冈朵拉”，以后还将有威尼斯的水上巴士Vaporetto和水上出租船。

中国山寨其他国家的名城并非首次。2013年在浙江省杭州出现“山寨巴黎”，2011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出现由房地产公司斥资60亿元在城市郊区建成“山寨奥地利小镇哈斯塔特村”。2015年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出现与实际大小一样的“山寨狮身人面像”，埃及政府因此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诉，要求中方将复制品拆除。

但就在9月，山寨埃及狮身人面像的石家庄长城影视基地



又按照1:1的比例，继续山寨兴建北京天坛和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卢浮宫玻璃金字塔。据附近摊贩表示，影视基地从今年春节前后开始收费，

票价人民币10元；如果想进入狮身人面像内另加收10元。收费人员出具的票据正面显示是石家庄长城影视基地试营运管理券。

外国高科技公司如何在中国生存？

• 《南华早报》网站，节选 / 2015.10.12

→ 在过去的几年间，很多人都相信，国内企业之所以能崛起并在逐渐壮大、利润丰厚的中国互联网行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仅仅是因为外国高科技公司被阻挡在市场之外。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呈现出另一种情况。

例如2003年，亿贝公司通过收购当时中国主要的消费者间拍卖平台易趣网而进入中国市场。但是到2006年，亿贝公司决定关闭其中文版易趣网网站。由于没有了解国内市场，而是决定把所有内容移植到亿贝的全球平台上，亿贝公司迫使中国客户接受令人不太舒服的用户体验，而其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在这段时间则反其道而行之，允许其顾

客决定许多新的条款。亿贝公司在中国的失败并不是政府禁令或保护国内竞争对手造成的。相反，不了解中国市场导致它难以赢得国内客户。

谷歌撤出中国内地市场则略有不同。正式成立于2005年的谷歌中国在起初时遵守中国内地的互联网审查法规，对其搜索引擎实行自我审查，直到2010年1月。由于审查力度加强以及遭到所谓中国内地黑客的网络攻击，谷歌中国决定不再自我审查，而是把服务器撤到香港。前谷歌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在他的《谷歌如何运作》一书中说，当时高管在这个问题上意见有分歧。施密特认为谷歌应该留在中国内地，而

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则因为审查制度而强烈支持撤出。

在本案例中，政府监管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这是不是谷歌撤出的主要原因呢？每家公司都必须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全球主要的职业社交网络服务公司领英(LinkedIn)则是如何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好例子。2014年2月，领英遵从中国的网络审查法规，正式启动中文版领英网。与其雇佣一个只会接受公司总部指令的有名无实的“中国区总经理”，领英决定聘请一个“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享有管理领英中国的高度自治权，如同一个独立的初创公司一样。

基于同样的原则，提供拼车服务的优步通过在国内建立一个实力雄厚的企业来积极参与与中国业务，与国内的竞争对手

“滴滴快的”进行竞争。优步中国将成为一家“中国”公司，有中国的投资者、中国的管理层，还有完全独立于其他市场的决策权。在短短九个月内，中国三大城市——成都、广州和杭州的乘坐人数就超过了纽约。尽管优步仍面临着挑战，但它仍然专注于中国市场，并决定把它当作是全球战略的核心。

目前断言这些公司从长远来看能否取得成功仍为时尚早，但至少它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些公司在中国所坚持的因素包括：理解国内背景、认清和授权国内的决策权、寻找国内的领导人才、与合适的合作伙伴建立协作型生态系统、建立创新的商业模式以加强与消费者的互动。一概而论所有外国高科技公司都有同样的感觉并且遭到“封杀”远非全部的真相。

美国“中考”取消大陆考生成绩或因分数过高

•《中时电子报》/2015.10.20

→ 大陆教育培训机构新东方10月20日透露，俗称“美国中考”的SSAT取消了9月19日一次考试中357名中国考生的成绩。

目前官方网站未公开声明，但有学生家长邮件询问得到回复：“在对该次考试的考试数据进行审慎调查和仔细分析后，SSATB（美国中学考试委员会）有充分的理由对此次考试成绩的有效性进行质疑。因此，基于考生同意书和SSAT考生手册中的有关条例，我们决定取消此次Upper Level SSAT考试的所有

成绩。”并表示将退回9月份的SSAT考试费用。

SSAT中方考试管理委员工作人员则透露：“我们才接到美国方面的通知。目前还没有接到在官网发表的通知，所以暂时还不做处理。关于取消的具体情况，美国官方已经通过邮件通知考生和家长了。”

名为hudunews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SSAT考试是美国私立高中入学考试，适用于美国、加拿大私立中学的入学，相当于大陆的中考。SSAT难度高、学费贵，这些一流的私立高中素有小

常春藤之称，在美国也只有2%学生能够就读，中国大陆只有北京和上海两地设有考场。新东方上海美国高中业务负责人张骥洲表示，有几十名新东方学生成绩已在10月初公布，却突然变成了“等待”状态。

类似的北美入学考试中，中国考生的成绩历来都因过高而被怀疑。满分2400的考试，美国本土学生拿到2200都很难，却有大批大陆学生获得更高分。9月19日的考试是SSAT考试中心只针对北京、上海的加场。当时有留学机构相关人士认为这太有针对性了，称这有可能是“美国布下的局”。而当考试成绩出来以后，真的有大批考生取得高分。

据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报道，在深圳某机构培训

班中上过学的70%学生都在9月19日考试中取得2400满分，北京某机构也爆出很多满分案例。但张骥洲表示，此次被取消的分数从2000到2300分都有，可能是美国官方为了体现决策的公平性。

以往的类似考试中，大陆考生曾因作弊而被美国取消成绩，影响最大的一次是大陆考生在SAT作弊导致考试改革。但此次参加考试的大多是14岁的初中生，他们是否懂得作弊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曾表示，这种让学生投机取巧的事，小则害了学生，大则害了国家，“一个国家的精英人士如果都作弊欺骗不脸红，这个民族就没有未来”。



香港凤凰卫视倾力打造 全球华人精品生活杂志

**《凤凰周刊》征订的读者
征阅全年《凤凰周刊》+《凤凰周刊·生活》**

可享受690元优惠，即刻节省90元

单订阅《凤凰周刊·生活》全年240元

用户可免费获得凤凰精美礼品一份！

征订热线：陈先生 0755-25934591

广告热线：张先生 0755-25469762

城市版合作：聂小姐 0755-25934586

征订传真号：0755-25934593

邮局汇款

收款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1008号荔景大厦9层

收款人：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邮编：518001

银行汇款

开户名：深圳凤凰生活文化传媒广告有限公司

帐号：7705 5795 9990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红岭支行

若通过银行汇款，请将汇款收据及您的详细邮寄地址

一起寄回或传真至本刊发行部。

邮寄方式

平邮免费；挂号邮寄每本加收挂号费3元，

半年挂号费18元，全年挂号费36元。

全球变暖给中国带来好处？

•《南华早报》/ 2015.10.16

→ 中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全球变暖将给中国带来好处，在增加北方干旱地区降雨的同时，也减少南方炎热地区的洪涝灾害。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团队说，如果全球变暖现象持续下去，地球的热赤道将北移，使得东亚季风雨带从中国南方向北方推进。

热赤道是指每一条子午线上年均气温最高的一系列地点组成的一条环绕地球的连线。专家预测，假如这样的气候变化发生在中国，从西部青海省流至东部沿海山东省进入渤海的黄河两岸将重新出现竹林。此外，水稻种植区很可能会扩大至中国北方干旱地区的长城一带，而长年缺水的北京将不再需要从南方调水。

在权威研究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中，由杨石岭教授领衔的科学家团队说，这一根本性变化将“很快出现”在中国。杨石岭任职于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在报告的结论中说，中国北方将“最终随着全球

持续变暖而变得湿润”。

支持其说法的证据深埋在黄土高原之下。黄土高原位于黄河中上游，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研究团队对距今2万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的C4植被（光合作用初级产物为四碳化合物的草本植物）生物量进行了分析，发现全球变暖导致季风带向北推进了多达300公里。科学家预测，随着地球再次升温，未来将会重现这一趋势。不过这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他们说，如果全球升温持续下去，困扰中国北方地区的干旱气候将因为降水的增多而得到缓解。报道称，这一新发现对全球变暖将加剧该地区缺水问题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近几十年来，亚洲季风雨带逐渐南移。由于恰逢全球气温升高，中国主流科学界担心，目前中国每年出现的北方干旱、南方洪涝现象正是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之一。此类担心帮助中国三峡大坝和南水北调工程赢得了支持。这两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分别是为了抗击洪涝灾害



和解决缺水问题。然而，与包括西部新疆省区在内的中国北方其他地区一样，北京近年来的降雨量却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科学家还发现，由于草原和树林面积的扩大，新疆和内蒙古的沙漠面积在缩小。据一位了解杨石岭研究工作的地球科学家说，这一新发现为帮助人们了解气候变化对中国以及全球其他地区的影响提供了新的信息。这位甘肃省兰州大学的研究员说：“从长期来看，也就是从每数千年就会重复的规律来看，他们

的说法似乎是可信的。但中国北方在今后几十年是否会变得湿润仍有待讨论。过去几十年的观测数据似乎与他们的说法相矛盾。我们看到中国北方以与全球变暖相同或更快的速度变得干燥。”他说，这一最新发现不应被当作借口来逃避当前缓解全球变暖负面影响的努力。

专家称，虽然旱涝灾害是中国科学家和中国政府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但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等问题同样需要全球采取一致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埃博拉在男性幸存者体内可存活达9个月

•德新社 / 2015.10.16

→ 科学家对塞拉利昂93名男子的精液样本进行检测，在其中半数发现埃博拉病毒。这一风险似乎随时间呈递减趋势。感染埃博拉病毒2-3个月的9名男子的精液样本中无一例外地发现了该病毒。感染埃博拉7-9个月的43名幸存者中，仅有11人的精液样本中发现该病毒。

研究者尚不清楚埃博拉为何可长时间在精液中存活，以及是否会由此感染他人。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纳塔莉·布罗特表示，存在潜在的感染风险，但目前尚未完全确定。

相关研究报告于10月14日刊登在《新英格兰医药期刊》的网站上。世卫组织称，此前的研究显示，病毒可在精液中存活约3

个月，在一个案例中存活了6个月。世卫组织认为，埃博拉通过性传播的方式由男性感染女性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该疾病的主要传播渠道仍是通过血液等体液的直接接触。

目前，埃博拉在西非地区已导致11000余人死亡，疫情在逐渐缓和。有约17000名埃博拉幸存者，其中约半数为男性。《新英格兰医药期刊》的报告还公布了3月在利比里亚的一个埃博拉病例细节。一名男性幸存者在感

染埃博拉病毒5个月后，通过无保护的性行为将该病毒传染给了一名女性。

世卫组织等机构建议男性幸存者在康复后至少三个月内避免性行为，或者在性行为时使用避孕套。三个月后，应每月进行检测，直到连续两次结果为阴性。世卫组织还表示，埃博拉由女性幸存者传染给男性的可能性比较小。布罗特表示，男性幸存者精液中的埃博拉病毒对其本人的健康影响尚不清楚。

海外汉学家们
构筑的历史学版图

• 法广网 / 2015.10.13

→ 某种意义上,《开拓者》可以被看作是《在美国发现历史》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同样是基于《中国历史评论》这一立足于北美历史学界、面向中国学界的学术刊物而生发,编著者王希、姚平等也都是美国史学界华人学者里的佼佼者,两本书也都由历史学家的生命经验和学术生涯出发,希望藉此能够探寻他们个体背后的历史学版图。

而不同之处在于,《在美国发现历史》关注的主要是上世纪80、90年代前后第一批留美学者,内容也主要以他们的回忆文章为主,更加注重私人化的回忆和感受。而《开拓者》的主体则是以外国汉学家为主,其内容以访谈的形式出现,提问者多是被访者的门生故旧、学界同仁,所以讨论的话题也更为专业,有时提问者反而说得更多,所以看似是一本访谈录,但其中藏有大量的学术探讨。

这本书访谈了十余位学者,其中多为在海外中国学界具影响力的成名大家,如艾尔曼、伊佩霞、史景迁、包弼德等,其后也有少数中国学者。中国学界经常对海外汉学采取两种颇为极端的态度,一是极度鄙夷西方的理论框架,简单地认为西方汉学无法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和一味追求理论的窠臼,尤其喜欢针对西方学者的软肋(比如对古典汉语和典章制度的错误理解)大肆抨击,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二是过分迷恋西方理论,将种种道听途说的名词概念加以发挥,然后将相对应的史实材料有选择性地套入理论模型之中。



伙食不好就起义!

• 西班牙《世界报》,节选 / 2015.10.15

→ 美国拥有很多文化摇篮,但美国美食的故乡在哪里,也许多数人都答不上来。要找到这个答案就必须去位于波士顿郊外的内蒂克士兵装备研发中心,这里是美国的美食“圣殿”,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属于全世界的。

是的,内蒂克的影响力比西班牙的罗卡兄弟餐厅和美国的麦当劳的总和还要大,军事设施的性质也是其最特别的地方。快餐、能量棒、“奇多圈”、速溶咖啡和袋装生菜等都是内蒂克被创造出来的。某种程度看来,五角大楼也在监视着我们的冰箱,并在超市里与我们如影随形。内蒂克在饮食行业中比重之高超出你的想象。几年前,这个隐蔽的实验室发明出了一种“坚不可摧”的三明治,在长达3年的时间内不会腐败变质。

烹饪专家阿纳斯塔西娅·马克思·德萨尔塞多日前在美国出版了名为《做好战斗准备的厨房:解密美国军队如何影响你的饮食方式》的新书,就以上问题进行了研

究。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了全国1/3的科研项目,这一数字是其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的2至3倍。奇怪的是,食品业的顾问和领导者中有很多是军人,政府对这一行业研究的投入在总预算中占到了相当一部分。

军用口粮必须符合以下这些标准:保存时间长、分量轻以及富含营养。在战时,糟糕的饮食简直是比敌营的蛊惑造势更可怕的对峙。因此,科学家们大力研究防腐剂、香精和调味料,能使战士们从餐盘中体会到距离家庭和母亲并不那么遥远。这就是对“自家制”的追求,而这个术语如此抽象,使得全世界都相信这是好的。

“最早启用营养学家的是美军,”西班牙巴伦西亚大学生物科技教授何塞·米格尔·穆莱特表示,“他们对待食品问题总是非常严肃的。”他认为,在那个“生态”和“自然”都还是附加值的时代,防腐剂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尽管在今天名声不太好。当今人们对化学品的憎恶催生出了很多误

解。正是有了防腐剂,我们才拥有了更多食物,同时还避免了罹患沙门氏菌病、肉毒杆菌中毒和布鲁氏菌病。

当然,并不是所有都是那么现代化的。军队最大的贡献无疑是罐头食品。糖果商人尼古拉斯·阿珀特在1810年凭借这一发明赢得了当时法国政府资助的一个战时食品大赛的冠军。他的创新意味着物流运输上的一大突破。不幸的是,拿破仑遭遇了滑铁卢,但罐头食品使得日后无数士兵免受了饥饿的折磨。

200年后的今天,内蒂克仿佛一个后现代的欢乐糖果屋般的存在,烹制着纳米技术的食谱。德萨尔塞多在书中指出,美国儿童的饮食并不健康,因为他们的菜单并不是为他们度身定做,而是为军队设计的。二战期间发明的脱水奶酪很快得到了大规模生产,成为最受欢迎的口粮。战争结束后,军用乳酪大量囤积,各食品企业决定将这些存货混入其他食品中增加风味。这就是“奇多圈”的前身,这一风靡全球的零食不但使很多家长爱恨交加,也是很多球迷在电视机前欢呼雀跃时最爱的小吃。



中日顶尖战机对阵谁会赢？

●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 / 2015.10.16

→ 随着中国与日本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中国军机与日本军机之间的遭遇次数增多。在东中国海，多次发现中国空军的苏-27靠近日本飞机，导致以冲绳为基地的日本F-15战斗机紧急起飞。这些遭遇似乎已成新常态，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事实上，将持续至中国歼-20战斗机投入行动之际。

作为中国第一种第五代战斗机，歼-20预计将于21世纪10年代末入役。与此同时，日本仍在使用F-15J战斗机。尽管这是一种性能优异的战斗机，日本防卫省曾希望用F-22“猛禽”战斗机取而代之。但是，令日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国会禁止“猛禽”战斗机出口，日本因找不到能真正替代F-15的战斗机而陷入困境。

日本于1981年接收首批F-15J战斗机。这种战斗机是授权三菱重工公司制造的，除电子对抗装置和雷达预警装置（美国政府拒绝出售这些装置）之外，在很

大程度上与美国本国型号相同。这种机型最初装备AIM-9“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和半主动雷达制导AIM-7“麻雀”导弹——后来被AIM-120“阿姆拉姆”导弹取代。最后，在F-15J的武器中，还包括一门20毫米M61机炮。

日本共接收了223架F-15J，已因事故损失8架。F-15J已长期服役。日本于21世纪初启动一项升级计划，然而，由于升级成本很高，每年只有不足10架飞机能够进行。在日本的F-15J中，只有大约一半接受了升级。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生产的歼-20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谜团。作为中国第一种第五代战斗机的歼-20，于2011年首次披露。歼-20是一种双引擎单座隐形战斗机，据信略长于F-15J。其机身长而宽，用于储存武器和燃料。这种机型似乎有3个内部武器舱，两个较小的武器舱存放短程导弹，一个较大的武器舱存放远程空对空导弹和空对地武器。

歼-20的机头整流罩似乎很

大，足以隐藏一台先进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使之有能力发现遥远目标并用雷达制导导弹进行攻击。较新的原型机似乎装备了一套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和一套电子光学瞄准系统，用于进行空对地攻击。

歼-20的确切角色尚不可知。这种飞机似乎是为执行远程任务而制造的。歼-20可能会与俄罗斯制造的米格-31（一种特别关注于击落敌军空中加油机、空中预警控制飞机以及侦察和情报收集飞机等机型的高速（隐形）截击机）类似。另一种选择是，将其改造成一种远程中型轰炸机，类似于美国的F-111——能够打击冲绳和日本境内各个基地等目标。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歼-20被装备成一种用于夺取空中优势的远程战斗机。在与F-15J对阵时，哪种飞机将获胜？

假设歼-20的设计人员成功缩小了这种飞机的雷达截面，F-15J在较远距离发现歼-20方面可能遇到麻烦。与此同时，F-15J

缺乏隐形性意味着，借助于一台合格的雷达，歼-20将轻易发现这种日本战斗机。这对在进行超视距作战的F-15J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尤其是如果歼-20装备“霹雳”-15导弹的话。如果距离较近，F-15J可能占有优势。据称歼-20动力不足，至少就目前而言。众所周知，F-15系列战斗机具有无与伦比的近距离格斗能力。

最后一个考虑因素：尽管仍处于原型机阶段，迄今为止人们尚未看到歼-20装备加特林机炮。尽管空战专家在机炮之实用性这一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在近距离格斗中，F-15J用其M61加特林机炮快速发射炮弹的能力，也是派得上用场的。

在我们比较成都飞机工业集团生产的歼-10多用途战机和三菱重工生产的F-2战斗机时，近距离优势属于歼-10，远程优势属于F-2。在夺取空中优势战斗机方面，形势发生了转变。ATD-X战斗机（日本下一代战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上天，日本可以稍有放松。但无论如何，中国即将超越其宿敌、跨入第五代战斗机的世界，将对大国竞争态势产生重大影响。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杨秀珠案幕后

杨秀珠在美受审不断推进，其遣返或只是时间问题。随着胞弟杨进军被遣返，在海外流亡12年的杨秀珠归期将近。杨犯一旦归国，其震荡效应殊未可知。

记者 / 钟坚



纽约当地时间10月5日，中国“天网”行动“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在曼哈顿联邦移民法庭第三次过堂。身材矮小的杨秀珠一如往常的身材臃肿，戴着手铐和脚镣，缓缓步行，间或透过被隔离的候审厅，往门外投来好奇的目光。

16天前，杨秀珠胞弟、同为“百名红通人员”的杨进军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大陆官方媒体称，这是“天网”行动公布“红色通缉令”之后，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杨进军被强制遣返，是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重要进展，为双方下一步该领域合作打下重要基础。腐败分子无论跑多远、跑多久，我们都会全力将其捉拿归案。

10月5日，庭审内容包括杨秀珠申请政治庇护和反酷刑保护，但是法官并未作出裁决。杨秀珠二弟杨寿弟和另一位杨姓女子作为杨秀珠的证人出庭作证。

“红色通缉令”二号嫌犯、潜逃新加坡四年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今年5月9日已被遣返回国。作为“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对杨秀珠的追逃，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放松。

2003年出逃后，杨秀珠曾辗转新加坡、荷兰、美国等多个国家。12年来，浙江省纪委牵头的专案组始终未予撤销，“工作从没有停止过”。7月底，浙江省纪委相关科室负责人告诉《凤凰周刊》，杨秀珠案各级领导都比较重视，追逃组更是积极努力、不遗余力，“哪怕逃到天涯海角，也要将她追回来”。据陆媒报道，习近平与奥巴马会晤时，曾特别强调了遣返外逃人员，并且第一个点名杨秀珠。

从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一名普通服务员，到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倚靠各种手段和利益输送，一路蹿升为省管干部，而后忽然急转直下，成为“中国头号女巨贪”。杨用粘柔的官场交际手法吐丝布茧，为自己织就了一张似乎牢不可破的保护网，亦打

2015年9月18日，杨进军被遣返回国。这是“天网”行动公布“红色通缉令”之后，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

造了一条畸形的升迁路径。

出逃多年，杨已年近七十，当年提携她的旧知故交或升迁，或去世，或退职，背后的大佬们早已退场，案情迷雾却至今未解。

昔日宿怨已归去

7月4日，杭州西溪路殡仪馆，温州市前市长陈文宪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此间举行。陈文宪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任温州市市长多年，在其任内主导温州机场、金温铁路、珊溪水利枢纽工程和褒贬不一的人民路改建等项目。

温州历年来多任主官有“三陈”在民间素有口碑，分别是陈作霖、陈文宪和陈德荣。陈作霖是文革结束后温州第一任市长，主政温州期间，引进了商品经济概念，着力发展民营个私企业。陈作霖之后的陈文宪在温州有“改革市长”的称谓，温州民众对他印象甚好，认为他是“一个对温州有贡献的市长”。

上世纪90年代末期，陈文宪赴中共党校学习，回来突然接到一纸调令，黯然离开温州，转任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而后因受贿被判刑11年，两年前已刑满释放。

今年6月底，陈文宪因肾功能衰竭并发其他病症去世。虽然离开温州20多年，但他在温州官场和商界的人缘不错。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凤凰周刊》记者注意到，有来自浙江省内温州、桐庐和杭州的500多位亲友送花圈道别。

陈文宪任温州市长时的搭档副市长冒康夫、副书记陈艾华、人大副主任孔祥友和宣传部部长等人，陈的上司浙江省领导卢文舸、葛洪升，温州现任市长徐立毅，以及温州和浙江巨贾正泰集团南存辉、绿城集团宋卫平等人都送了花圈。唯独少了陈过去的亲密搭档杨秀珠和当时一位温州主要领

导，杨秀珠逃亡国外，那位主要领导退职多年，蛰居杭州。

陈文宪与杨秀珠搭档时间较长，从温州规划局局长任上直至任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杨秀珠与其始终是下属或工作搭档，应该说知根知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之间的关系渐趋微妙。

温州有媒体人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陈文宪当年分管城建规划，做事高调，能力强。“一开始杨与陈关系走得比较近”，而向上走的路数，杨秀珠有自己的一套。

温州市人大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杨秀珠似乎天生是搞关系的料，她跟领导打交道，能很快拉近人的距离感。别的下级官员对市长唯唯诺诺，但杨不然，她跟市长汇报工作时，不是通常的大家主客位置正襟危坐，而是表现得极为随意和放松。

“在（市委）大院里，杨秀珠叫陈文宪不是叫职务，而是大哥大哥地叫。”杨秀珠前夫李松坤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按她的性格是会这么做。当年很多温州官员时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身为下属的杨秀珠经常胳膊搭在市长的胳膊上，貌似很亲密地对话，毫不避讳。

1990年代初，陈文宪刚从宁波调来温州当市长的时候，还未分配住房，就住在温州的一家大酒店。温州有知情人士透露，有人看到，杨秀珠经常很晚到酒店去找市长汇报工作。彼时，杨秀珠已与前夫分居多年，为单身女人。

上述温州市人大老领导称，杨秀珠接近陈文宪一是基于工作需要，二是那时她刚从市规划局副局长任上扶正，立足未稳，群众非议不断，需要得到新任市长的信任和支持，同时也希望借助陈的力量把规划和土地的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杨秀珠与陈文宪的合作的“蜜月期”并

不久，随着陈文宪与温州时任主要领导因为工作理念和方式的相左，杨秀珠见风使舵开始与书记结盟，并迅速与陈交恶。“在外人看来，这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92岁的温州市老干部胡显钦说，他俩不是一条线上的人。

1997年，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文宪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设温州半岛工程的议案，陈是最早公开提出把洞头岛跟温州大陆连接起来的温州官员。从北京回来没多久，陈文宪被安排去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不久调令就下来了，陈被调到浙江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任职。

知情人士分析，一心想在温州做番事业、并且已有所建树的陈文宪从主观上讲，并不想离开温州，但最终还是被“挤走了”。温州坊间有称，陈文宪的调任和后面的落马都跟杨秀珠有关。挤走强势的陈文宪，对杨秀珠来说可以大展手脚，不再有被压制感。

陈文宪调任后的第二年，当时《温州侨乡报》一名记者根据市里一个关于半岛工程的会议写了一篇报道，里面提及陈文宪向全国人代会提出议案，要求建设温州半岛工程。

本是一个很正常的工作稿，但不久杨秀珠遣人到报社追查信息来源，追问写稿记者为啥要提到陈文宪的名字，后因为情况属实不了了之。其时，杨秀珠已任温州市副市长，官运正盛。杨秀珠和陈文宪间的恩怨由此可见一斑。

官场朋友时反目

陈文宪刚从宁波调来温州之初，对这位女部下很器重，杨秀珠遭非议时曾多次力挺。有说法称，陈文宪曾说过，工作上这么有魄力的女同志不提提谁？



杨秀珠攀着陈文宪往上爬，后来升为市长助理后，马上便觉得陈碍手脚，甩开他另寻靠山。陈文宪并不是杨秀珠仕途中唯一“贵人”。杨被认为擅长在仕途关键节点利用不同“贵人”，但转身之后，变现则极为功利市侩，至今留下不少话柄。

熟悉杨秀珠的人说，她善于走上层路线。温州市妇联任职期间，为当选温州西城区副区长，杨拼命巴结时任温州市人大副主任汪月霞。杨秀珠认识汪月霞之后，经常跑到她家里送东西，希望汪月霞帮她引荐省里的一些领导。

1993年后，已身为温州市市长助理的杨秀珠仕途蒸蒸日上，年老的汪月霞此时已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置上退休，“有几次路上或开会遇到，杨头也不抬，打招呼都不跟她打。”温州当地一位资深传媒人曾亲耳听汪月霞聊起这段往事，唏嘘不已。

时任温州妇联主席张围是一名南下干

部，性格爽朗，说话直接，对投机取巧、善于逢迎的杨秀珠很是不满。杨秀珠几番巴结不上，只得作罢。在温州妇联的时候，杨秀珠违反规定几次动用公款吃喝招待的费用，张一概不予报销。

李松坤说，文革时期杨秀珠并没有像媒体说的当过造反派的头头，杨出身苦寒人家，那时只是饮服公司下属饮食店的一名会计，但杨秀珠有些文化，头脑灵活，因而受到各方的关照。文革结束后，中国上下各级都成立清查“四人帮”办公室，杨被抽调成为商业局该办公室的成员，清查“四人帮”办权力很大，可以决定一些人的政治生命和工作去留，被确定是文革余孽的就常被开除公职或判刑。

杨秀珠那时就表现出对权力的极大兴趣和极度迷恋，开始网织上层关系。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杨秀珠经人介绍与省领导有一面之缘后，为更深度地接触省领导，

有一次故意把幼小的养女“遗忘”在领导家门口，领导家人发现门口走丢的小女孩并收留，杨秀珠适时前去百般逢迎。

杨经常有机会到省里送材料，因此认识了不少省里的领导。杨的另一绝招是敢于“拦轿”。那时浙江省里开会常选在屏峰山一带，看到省里主要领导的车过来，杨秀珠会跑过去拦住，递交材料，口头反映情况。“别人看到领导多少有些畏惧，说话结结巴巴，杨秀珠却不惧，说话条理清楚，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李松坤回忆说有些领导看到杨秀珠个子小、胆子大，对她有了印象。

一来二去，杨秀珠与当时浙江省的主要领导有了交流，有的仅仅是几面之缘，有的此后与杨秀珠有了互动。“有一次我回家，听她说起明天要去省里某某书记家里。”李松坤说，在商业局清查“四人帮”办公室，杨秀珠也没什么明确职务，但在办公

室的几年，跑东跑西，为自己积累了不少政治人脉。

很难说，杨早期认识的这些老领导是否有助于她，但杨秀珠知道在官场需要这些来装点门面。

在温州妇联干了几年，她到西城区任副区长。当时温州西城区城乡结合部私建违建现象很多，杨对分管的这块工作很是尽心，冲在第一线，不留情面地拆违，深得领导青睐。而后，杨秀珠被温州市选送到上海同济大学参加为期3个月的规划培训班，培训回来被分到温州市政府规划处（规划局的前身）任副处长。

以后，杨秀珠凭这段短暂的培训经历对外宣称自己是“同济大学硕士”，知情者说这是“真文凭假学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出逃前，杨秀珠确实是同济大学校友会的“名誉会长”。

胡显钦老人透露，当时同济大学有个校领导与杨秀珠是老乡。杨秀珠当上规划局长后，经常有意识地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到温州做课题项目，顺便拉近关系，杨秀珠还出资修缮了同济大学的一处大门。最终杨秀珠不仅拿到了同济大学的文凭，还得到一个所谓的校友会名誉会长的头衔。

杨秀珠系工人出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到各类专家和高级人才集聚的建设规划部门，领导大家，杨心里有些发虚。名校文凭成了她在专业人才济济的规划建设部门谋求立足的资本。

杨秀珠任温州市规划局副局长时，她的上级是局长娄式番，是高级规划师，同济大学科班出身。不懂专业的杨秀珠起初对娄式番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未几便露出她擅权专权的作派来，与刚刚在专业上耐心将她“扶上马，送一程”的娄式番借故翻脸。

“两人有矛盾的起因是，杨秀珠想自己当局长，把娄一脚给踢开。”对老局长娄式番，温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院长丁俊清评价称，娄业务素质精湛，但为人温和，很多大事要事都是杨秀珠说了算，娄倾向于明哲保身，对杨秀珠在局里大搞帮派，打击异己，表态不多。但即使是这样，杨秀珠还是对这位短暂的“盟友”除之而后快。

娄式番不久便被调至温州旧城改造指挥部养老，杨秀珠随即顺利上位当上规划局“一把手”。2015年7月末的一个下午，《凤凰周刊》记者拨通娄式番的电话，已年过八旬的娄在电话中口齿不清。他告知记者，自己卧病在床多时，对过去与杨的一切他都不愿多言。而娄式番的老伴接过话头，称自己的老伴“与杨秀珠斗争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

喜欢骂人“狗生的”

升任规划局长那年，杨秀珠在民主评议环节卡了壳。温州市委组织部下去走了一圈，群众反映杨秀珠作风不好，为人粗鄙，喜欢骂人“狗生的”。任前公示期间，群众反映杨秀珠有八个问题，除了作风粗暴、工作方式简单等之外，还有人向温州市人大反映，杨秀珠曾利用家里长辈去世大肆收礼。第二天杨回应组织，这个钱有收，但放在规划局下属单位勘察处一个部门的保险箱里，她没拿。

杨就这样巧妙地让下面单位给她挑担子，成功化解了障碍。相关部门对其的考评结论是，这个人魄力很大，有冲劲，也干了一些好事。最终还是通过了对她的任命。

当上温州市规划局局长是杨秀珠人生的一个转折，也是她疯狂贪腐的开始。“杨秀珠那时也没那么多钱，当上局长后的那



杨秀珠目前关押于美国新泽西州哈德逊县惩教中心，这是一个县级监狱，用来关押短期内等待审判或处理的囚犯。↑



年春节，杨托人送别人一瓶五粮液就算是拜年。”温州人大一位老干部回忆。

1993年温州旧城改造正式启动，杨秀珠捞钱的好时光来了。这是温州建城以来首次大规模城市化建设改造，温州知名建筑如巴黎大厦、府前大厦、五马大厦都是那时由温州籍华侨开发的。

像大陆其他城市一样，上世纪90年代

初温州与外商、港商的接触，双方都是小心翼翼，“邀请来的华侨们最多到老家看一看，然后就住在宾馆里不出来了。”胡显钦说，华侨对内地改革开放政策和政府的态度不太明了，但90年代后期城市化拆迁改造启动，这些人知道利益丰厚，主动向官员靠拢，开始抢项目。

温州环城东路华盖山动物园地块，

因为靠近山脚，“原址迁建后规划为公用绿地”，丁俊清称，杨秀珠却随意变更，将其违规转给法国华侨陈其跃用于房地产开发。

内地媒体曾报道，1996年10月30日，动物园地块第二次招标时未公开招标，采用的电话邀标形式，参加招标的仅三人，分别是法国华侨陈其跃和其他两位华侨。土地

底价定为8888万元，容积率调高至3.5，可建面积为5.3万平方米。陈其跃以9000万元中标，该价格比第一次动物园拍卖地价低3380万元，由于容积率调高一倍以上，可建面积却增加了3.2万平方米。事后陈其跃向人感叹“别看我好像赚了，其实我被人割得眼泪都出来了”。

此时杨秀珠的公开寻租舞弊已肆无忌惮，温州一位退休人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时杨秀珠给陈其跃打电话时，他就在旁边，杨公开作弊，居然不避旁人。杨在电话里告诉陈其跃，你投高标就是了。结果是陈中标，杨给陈提高容积率。

“杨秀珠是很早就懂得利用提高容积率方式受贿的官员。你中标，对方提高容积率，你得给人好处。”胡显钦说这几乎成了房产开发的一种常见潜规则。

杨秀珠任职的温州规划局一度集纳了这座城市老城区的城市拆迁、土地征用、规划设置和变更以及土地买卖诸多大权，“很多原本要放在市委、市政府台面上需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大事，都变成她一个人说了算。”

“一个本质不好的人”

温州曾经接近杨秀珠的知情人士称，杨秀珠任副市长后主持开会，原定两点半开会，杨秀珠两点20分就在门口等着，看到迟到的与会者，杨张口便骂，“你这个短命儿，老娘开会你都迟到，下次你不用来了。”被骂的人灰溜溜地入座，杨秀珠接着骂。

但杨秀珠骂归骂，之后她会去安抚当事人，她说假如我不骂你，以后谁听我的话。杨秀珠的管理哲学是：不骂你是没前途，骂你则是爱你。

杨原来任职的规划局系统是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杨派性很强，感觉不是她的人

就疏远，背后加“穿小鞋”。技术干部出身的丁俊清属于杨骂都不屑骂的人。丁喜欢搞研究、写论文，不喜欢拉帮结伙，与杨不是一路人。杨秀珠就明确在单位里讲，丁的论文打印不能用单位里的纸张。

在市面上已经出现BP机、小灵通的年代，丁俊清是市规划院的技术负责人，和另一位总工都没被允许装电话。有个合作单位看不下去，出钱帮他俩装了一部办公电话用于工作联系，杨秀珠得知后让办公室的人追查，丁只得付费了事。“当时我在单位里因为跟杨秀珠保持距离，被高度孤立。”丁俊清说起这些来，眼眶湿润。

杨秀珠昔日下属们现在大多或退休或调离，被杨秀珠拉拢的为数不少的下属和亲戚，有些因涉杨案被判刑，如温州

2002年3月，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视察温州火车站。



规划局原副局长高某等人，也多已刑满释放。反倒是像丁这样不与杨秀珠走近的人庆幸自己当初能独善其身。也有的刚开始与杨亲近，后来看不惯她的行为愤然离去。如在中海地产任职的朱世枢，以前是杨秀珠的老部下，杨一度想重用朱，但朱对杨秀珠的腐败行为公开叫板，随后朱便辞职下海。

在深圳定居多年、现已60多岁的高级工程师朱世枢对《凤凰周刊》记者反复强调，“杨秀珠就是一个本质不好的人”。

众人看来长于钻营投机的杨秀珠，在温州市当时有的领导眼里却是个“香饽饽”。规划局长任期满后，杨得以担任市长助理、金温铁路温州段总指挥等重任，在一片非议和争议声中，继续被提拔任用。

1995年3月，温州八届人大会议中一项议题是讨论杨秀珠当副市长的提名问题。在此之前，温州市开了个小型座谈会征求对杨提拔的意见，一位人大常委提出，杨的工作是得力的，但是今后要注意作风问题，不要经常性出粗口。当天下班前开的小范围意见征求会，晚上，这名委员就接到杨秀珠的电话，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怎么当众提意见。这位人大常委大吃一惊，这才知道杨秀珠组织部门也有人。

温州资深媒体人士吴逢旭评价杨秀珠善于揣摩领导的心思：有些领导想权力的，她频繁请示汇报，让领导有大权在握之感；有些领导想金钱，她给你送钱；有些领导什么都不想的，给你送温暖和关怀。

“杨用各种手段拉拢和腐蚀了温州和浙江的部分党政领导，打通仕途进阶的各个环节。”温州当地知情人士称，90年代后期的杨秀珠身居副市长重要位置，与她关系走近的至少有两三个省内重要高官，向下

则有众多铁杆簇拥。

温州市人大的一位老领导通过自建公助方式在温州饭店旁边有一套私房，在旧城改造中也属拆迁范围，但土木工程专业出身的老领导发现安置房的容积率不按规定办，于是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此事。杨秀珠闻讯后专门给他打电话，提出可以给他原址附近专门建一个别墅，前提是老同志不要再提容积率这事，被拒绝了。

杨赖以攀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手里有越来越多的政治黑金，以打点各方。温州车站大道原来是作为温州市的第一路，当时规划要造8车或11车道，但是杨秀珠却把这总长1公里左右的黄金地段变成100多个房开项目，“每个项目据说她受贿100万元，那条路她收了最少1个亿。”温州知情人士推测。

官场防线崩溃

当地知情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杨秀珠主管温州城建规划的数年里，有很多省内或中央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公司进入温州，这些公司或者个人进入温州，参与温州的城市开发和建设蛋糕的划分，获利颇丰。杨秀珠为此十分卖力，靠这个不断积累政界人脉。

鹿城区金桥路上的一个小区，开发已有十余年，是一个老小区。温州电力局一位退休官员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项目的具体牵头负责人是“一位浙江省级领导的夫人”。温州坊间称，该小区开发的土地证、施工证，均是杨秀珠从中帮忙办理。

坊间这些传闻无从证实，但1998年前后，已近退休之年的杨秀珠再获重用，到省城出任建设厅副厅长。据称当时浙江省建设厅厅长曾一度抵制杨到建设厅来，但他与同事们的联名反对无效，有更强大的力

杨秀珠经常故意夹着图纸，装作若有所思状直奔省领导饭堂，用餐的省领导见杨秀珠如此忙碌的样子，一般都会体恤地招呼她就近坐下吃饭。杨就此获得了与领导亲近的机会。

量在杨秀珠背后推动着她前进。

到杭州之初，杨秀珠势头不错，活得游刃有余，浙江省委四套班子成员中不乏她熟悉的领导。在省里，杨秀珠这个副厅长官不算大，但她还是温州时的做派，平素工作中对当时的几个浙江省主要领导，她居然都不叫省长、书记头衔，而是直呼其名“某某，在哪里呀？”其言行直惊煞旁人。

杨也不改好大喜功的毛病，有人看到，到了中午或者晚上饭点，杨秀珠经常故意胳膊下夹着图纸，装作若有所思状地直奔省领导饭堂而来，有在此间用餐的省领导一见杨秀珠如此有为、工作忙碌的样子，一般都会体恤地招呼她就近坐下吃饭。杨就此获得了与领导亲近的机会，不了解内情的很多人觉得，杨秀珠真是神通广大，经常跟省领导一起吃饭。

流传温州官场的一个说法是，杨秀珠当年要不是出事，官职还有可能继续攀升。然而世事难料，杨秀珠在省城官场混了没几年，浙江省四套班子纷纷换届。2003年，浙江省委书记由习近平正式接任，原有的班子领导有的赴任新职，有的退居二线。浙江官场生态有了不小的变化。

另一方面，杨秀珠在温州规划建设系统专权跋扈多年，树敌众多，温州人大、建委系统一些老干部反对之声渐起，各类揭发举报信件到处寄送。危机最初在杨秀珠

的弟弟杨光荣受贿案中突破，随后迅速扩大，杨构筑的防线很快出现巨大裂隙，杨已经感觉到这种越来越近的危机。

2003年4月20日，浙江省建设厅在温州万豪大酒店召开全省建设系统工作例会，参加会议的是浙江省各个地市县的建设局局长。

上午10点左右，杨秀珠发表讲话，谈“三个代表”的重要性。她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县市建设局的局长，都是党的干部，必须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我们的事业都要为人民服务。

一位参加过这个例会的温州媒体人称，杨在会议上强烈谴责温州拆迁安置中种种错误，比如拆了老百姓的房子8年、10年了，但还是没把人家安置好。她讲了很多例子，如温州广场路、新信街的拆迁区域，有些拆迁户老人希望住进新房，结果在外面死掉了；有些拆迁户，房子拆的时候孩子还没出生，现在都已经读小学了，住房问题还没解决。

“杨那天的语气非常强硬，说得慷慨激昂，振振有词，完全是脱稿演说。”这些其实都是她造成的，但她说的好像是跟自己无关的事。讲话完已到午餐时间，众人都去酒店餐厅用餐，但没见到杨前来。好事者问悉，杨去看她老母亲去了。

但谁知道，杨秀珠一去不复返。2010年前后，杨秀珠母亲去世，杨秀珠也未回家料理丧事。

人未归国，案未了结，2015年7月30日，接近浙江专案组人士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对杨案涉案人员的盯控一天都没有放松过”。相关人士透露，除了已经锒铛入狱的杨秀珠案涉案人员，一些与杨秀珠有利益关联的人员也在布控侦查中，此案因事涉敏感，暂不便透露案情。●

被贪腐出逃改变的杨氏一家

杨秀珠出身平民，行事泼辣，热衷权力。兄弟姐妹七人，三人涉贪腐。三弟杨进军从美国被遣返，四弟杨光荣被判刑。在杨秀珠案的阴影下，一家人的生活深受影响。

记者/钟坚

秋日正午，阳光把谢池巷照得半明半暗，500米左右的商业街两侧，林立着高矮不等的居民楼、琳琅的商铺。谢池巷48号一处老式单元楼的5层曾是“红色通缉令”嫌犯杨秀珠的居所。

杨秀珠出逃后，名气大噪，有关杨的故事被人津津乐道，谢池巷这里年轻的居民很少知道这段历史，只有少数几个老人知道杨秀珠的一些轶事。

住谢池巷48号时，杨秀珠官运正蒸蒸日上，乖张的脾气越发见长。胡同口补鞋的师傅老王几次看到，清晨时分，鹿城区公安局局长王天义提拎着早餐小心翼翼地送上5楼敲门，给杨秀珠送上笑脸和热气腾腾的早点，未几，便听到，从五楼飘来杨破锣式的骂娘声，表示对王所送早餐质量的不满。杨的声音独特而沙哑，传播很远。

当年的这对铁杆，命运曲线在数年后都掉头下行。王天义在杨秀珠出逃那年被以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刑；杨秀珠现在还亡命天涯，在温州的杨秀珠家人至今仍担惊受怕。

平民子弟

杨秀珠的祖上是温州永嘉县人，在她爷爷这一辈，杨家已搬到温州市区谋生。杨秀珠的前夫李松坤认识杨时，她家住在温州市区东门的横巷，那一带多是城市苦力、工人居住的贫民区，现在属繁华的五马街商圈，旧时的痕迹早已不再。

1960年代的杨秀珠一家，是个大家庭，杨秀珠兄弟姐妹七人，杨秀珠的父母，还有一个祖母和他们共同生活。杨家在横巷的房子很简陋，那个年代普通的人家，大抵都是这样。杨秀珠父母均在国有单位工作，父亲是温州一家搬运站的搬运工，为人老实，只懂得下蛮力，后来调到搬运站的起重队。母亲是温州玻璃厂的工人，在厂里表现突出。

杨秀珠是杨家长女，下面有四个弟弟，两个妹妹，杨秀珠与最小弟弟杨光荣差十六七岁。杨秀珠不到20岁就参加工作，在温州商业局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一家集体商店上班。其余兄弟姐妹，有的在读书，有的还没工作。尽管有三个人工作，但是因为人多，生活上有点捉襟见肘。

杨家和邻居们都处得非常和睦，几乎

没有什么矛盾。邻居见杨家日子过得紧，对她家多有接济。“杨家有几个人有固定的工作，而且都是在国有、大集体企业上班，温饱是无虞的，说不上有多苦。”李松坤说，杨秀珠那会儿时运不算好，只能去集体企业，不能进像她父母那样的国有企业。温州商业局那时要招一些有文化的工人，杨秀珠初中毕业，在一般工人中也算有些文化，于是便被招进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

刚开始，杨秀珠在温州市饮食服务公司小南门粮站卖馒头，因为她很会巴结领导，很快被提拔为开票员。过去镇街粮店里备有长长的一本票簿，上头用粗线一格一格地划出了馒头、馄饨、包子的种类，杨秀珠负责吆喝着从窗口找钱撕票。“杨秀珠有文化，做事说话都泼辣，店里的经理都是老实的人，比较服她。”李松坤说，杨秀珠后来又调到解放北路中心店当会计，定期在几个店轮换。

年轻时的杨秀珠对父母长辈极为孝顺，遇到祖母有个头疼脑热的，她急得跑上跑下。作为家里长女，杨秀珠几乎顶了家里半边天，从小兄弟姐妹什么事都听杨的安排，即使是弟弟妹妹们外头受到欺负，也不

杨氏姐弟



杨秀珠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2003年出逃。现在美国曼哈顿联邦移民法庭受审。



杨秀英

曾在温州市社代企业局工作。



杨龙翔

曾在温州市检察院任职，已退休。



杨寿弟

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股东。2001年前往美国。



杨进军

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01年出逃美国，2015年9月18日被强制遣返。



杨秀兰

温州糖业烟酒公司下属合作商店营业员，已退休。



杨光荣

原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4年被判10年6个月。

温州五马社区谢池巷48号，杨秀珠与养女当年在这幢单元楼（图右）住了很长时间，这片单元楼原来是华侨居住，现在看上去已很破旧。杨秀珠当时住在5层。

找父母，而是找大姐杨秀珠去摆平。

文革开始后，各派串联武斗火热，杨秀珠在保皇派“温联总”里混个小头目，并不显眼。文革结束后她的运气反而来了，各个单位都成立清查“四人帮”工作小组，见她头脑灵活，就调到商业局以工代干，杨秀珠那时实际上已受重用。1977年，杨秀珠入党。清查工作结束后，办公室解散，杨秀珠被分到市妇联当副主任。

李松坤那时是温州供销社系统清查“四人帮”办公室成员，与杨秀珠经人介绍认识后，两人就结合了。结婚后的李松坤和杨秀珠住在县前头，李松坤回忆那时的生活，还是很惬意，“我们有单位分配的公房住，两人都在响亮的政府单位做事，工资加起来相当于有十三级干部（副主任科员）那么多，日子很不错了。”李松坤很满意那种生活，但杨秀珠似乎不这样想。

她每天忙碌着、算计着官场的各种事，在家里数落着某人如何之坏，一心想往上爬。李松坤则希望杨秀珠安心工作，多照顾家里，不要老想着当官什么的。杨秀珠争辩说：当官有什么不好，别人会尊重你，佩服你，听你的话，办点什么事也比较容易。两人常说不到一块儿去。

姐弟七人，三人涉贪

杨秀珠仕途刚起步时，大妹杨秀英还在龙湾区农村上山下乡当知青，杨秀英比杨秀珠小几岁。知青回城后，杨秀英通过正式的招工手续安排到市饮食服务公司，和杨秀珠原来单位一个系统，杨秀英当单位保管员。以后或许是杨秀珠官越做越大，杨秀英被调到温州市社代企业局工作。

杨秀珠官做大后，杨秀英的儿子潘冰被安排到城建规划系统工作。温州一位曾与潘冰一起吃过饭的人说，潘冰这小子人不



错，老老实实，做事也勤恳，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但杨秀珠出逃后，潘冰的境遇大为不同，“在单位都没法做人，各方面压力很大，虽然他职位小，不可能与杨秀珠有什么利益关联，但是外部的舆论压力令他喘不过气来。”没多久，潘冰辞去公职，下海经商。

杨秀珠下面最大的弟弟是杨龙翔，杨龙翔当年作为知青去黑龙江吉祥农场兵团下乡，文革差不多结束之后，从黑龙江农场调回温州，顶替父亲的工作进了搬运站起重队，当一名工人。

1970年代，温州曾发生一起抢枪案件，市郊的一些老工人的小孩没工作，无人管，几个人抢走公安的配枪，一时搞得人心惶惶。以后政法部门开始面向有单位的、为人老实、政治上可靠的工人阶级队伍中招人，杨龙翔是知青，又是工人身份，于是被招到温州市检察院工作。

杨龙翔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温州市检察院的一名处级干部。但在杨秀珠出事后，杨龙翔也面临一些麻烦，有人举报他收受了别

人几万块钱，但组织部门后来审查发现杨龙翔收的钱与他的职权无关，杨平安落地并办理了退休手续。退休后的杨龙翔极为低调，深入简出。温州媒体前几年托人带话想就杨秀珠的事采访杨龙翔，杨龙翔婉言谢绝。

一些了解杨家的街坊邻居表示，杨秀珠父母老实，兄弟姐妹也大都是实在人，不像杨秀珠喜欢抛头露面，呼风唤雨。

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的居委会都很热心，知道谁家小孩不读书在家里待业，都会动员你去厂里或店里工作，无论单位好点差点，只要你愿意，基本都会有一份工作。杨秀珠的二弟杨寿弟从学校出来后，到温州二轻系统的下属企业剪刀厂上班，当时在温州南站那一带，也算大厂。杨寿弟比较满意这份工作，在厂里混得不错，成为一个多面手的技工，会做剪刀，又会修理电扇。

三弟杨进军在文革结束之后参军，退役后办了个公司，之后不断转换门类。计划经济时代结束，杨寿弟的剪刀厂形势不好，也跟杨进军一起混。李松坤说，在杨秀珠的

七个兄弟姐妹中，年龄上小杨秀珠一轮的杨进军的性格有点像大姐杨秀珠，也是咋咋呼呼的，行事比较大胆。

杨进军被上榜大陆“红色通缉令”的原因是涉嫌贪污贿赂犯罪。公开资料显示，杨进军的浙江明和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主要经营五金交电化工、机电设备、金属材料等，杨进军任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杨寿弟则是股东之一。杨进军出逃后的2004年，公司被吊销。

此前媒体公开报道称，1996年底，杨进军经商亏本，杨秀珠于是找来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几名高管，盯上了开发温州鹿城区水心汇昌小区的一笔土地配套费。经过几个人的运作，1100多万元的巨款全部落入了杨进军的私人口袋，用于平账。

浙江省检察院早就盯上了杨进军，但由于此案牵涉杨秀珠，是省管干部，各方都比较谨慎。听到风声的杨进军2001年左右出逃美国，杨寿弟也跟着一起跑出去。直到今年9月杨进军被美方遣返回国，目前羁押在看守所待审。

对于同时到美国的杨寿弟，温州有媒体曾咨询检察院相关人士，被告知杨寿弟并不是“红色通缉令”名单上的人，目前没有发现他有涉嫌犯罪迹象。

杨进军之后是妹妹杨秀兰，也就是杨秀珠的二妹。杨秀兰和最小的弟弟杨光荣跟杨秀珠年龄相差较大，退休前在温州糖业烟酒公司下属的合作商店当营业员。杨秀珠当妇联主任时，杨光荣还读初中。在杨家，杨光荣最小，兄弟姐妹批评他较多。以后杨秀珠仕途顺遂，对她较亲近的弟弟们，也伸手帮一把，杨光荣被她安排在温州铁路房地产开发公司当副总经理。

2003年2月，杨光荣因涉嫌受贿被温州市鹿城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2004年3月23



2001年12月，杨秀珠在温州市参加某会议。

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认定杨光荣受贿18万元，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按照刑期计算，杨光荣应该已经出狱，但是没人知道出狱后的杨光荣住在哪里。

被打乱的生活

几个兄弟姐妹都是本分老实人，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平静地在这座城市生活。但因为杨秀珠，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了。

1980年代初期左右，李松坤和杨秀珠黯然分居了。“两个人没吵架，也没什么争执，她过她的生活，我干我的事。这段缘分就断了。”李松坤说，他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是“杨秀珠自己要搬出去的”，“那时好像脑子一热，觉得谁离开谁一样能生活”。

“她就是那样的偏执。”李松坤烟抽得很凶，一根接着一根，说起前妻，李神情淡然，杨秀珠是他生活中的过客。两人离婚后，李松坤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安静地住在温州一个小区里，有时会去上海帮子女带带小孩。

杨搬离了他们的家，另外找地方住，还带走了养女。

养女抱来时才2个月大，小的时候很乖巧，李松坤经常带着她到公众场合，别人都夸赞。李杨两人分开时，养女已有八九岁，还在念小学。女儿一直跟着杨秀珠过，后面搬了几次家，住得时间最长的是谢池巷，以后也搬到县前头。按说都在一个城市里待着，彼此住得也不远，但奇怪的是前夫李松坤与杨秀珠分手后三十多年，竟没有见过一次面，杨秀珠也没让李看望过女儿。

彼时，杨秀珠步步高升，与前夫早已不是一个圈层的人。

杨秀珠当年与李松坤分居后，两个人没有办手续，很长时间挂在那里。李与杨的协议离婚书，李松坤都已经写好签字，单位也

盖好公章，交给杨秀珠，一直没动静。两个人的户口还是在一起，那年月，李松坤的粮票和煤球票什么的都是通过杨秀珠的妹妹转交的。直到1986年大陆首次进行居民身份证登记，杨秀珠通过派出所给李一个单独的户口本，上面写着分户的原因：离婚，至此两人才算在法律意义上真正离婚。

离婚后的杨秀珠没有再结婚，她一心向着官场迈进。单身女人杨秀珠未必没有绯闻，在温州流传很广的说法是，杨秀珠在温州景山公园那一片曾经有一幢别墅，有时她会带一些男性到那边过夜。但如今已无法证实。景山公园管理处早年属于杨秀珠治下，相比繁杂的城市，山上静谧舒适。公园管理处的一位年长的清洁工证实，杨秀珠曾经常过来住。老人笑称，杨秀珠一度打算在山上的住处修建游泳池什么的，后来因故没有建成。

外界有关杨秀珠的声色故事中，最为焦点的人物是杨秀珠曾经的司机杨胜华，杨胜华贪污数千万元，潜逃国外8年之久。杨胜华被一些传闻认为是杨秀珠的情人之一，杨秀珠经常夜里带他去她在景山公园的住处。杨秀珠不在时，有时杨胜华会带自己的朋友去，顺便炫耀一番。杨胜华出事时已是温州一家国企的董事长，但他出逃后其钱财的去向成为一个谜。2011年6月杨回国投案，7月被检察机关依法决定逮捕。2012年3月，杨胜华涉嫌贪污、挪用资金被起诉。

杨秀珠的生命中，与她颇为亲密的人是她的养女。女儿性格温顺乖巧，杨秀珠的脾气却刚愎暴躁，两人如何相处，外人无法想象。包括工作、生活、婚姻在内，杨秀珠几乎承揽了养女的一切，杨的女儿成年后在温州市政府下属一个机关工作，女婿也是杨秀珠物色的，一度在温州江滨建设指挥部任职。

杨秀珠调到省里的时候，也把女儿安排

在杭州工作，女儿女婿一家都生活在杨的身边。2003年，杨秀珠出逃的时候带走了女儿女婿和外孙女。向来对杨秀珠言听计从的养女，据说在杨秀珠决定出逃时苦苦相劝，让杨不要跑，有错就认错，没有过不去的坎，但杨秀珠不听，一家人只能听从她的安排。

杨秀珠当副市长时，经常有开发商以海外考察的名义，让杨的家人去香港地区、德国、法国旅游，因之护照、身份证照齐全。那时也没那么严格的边控，杨秀珠于是带着家人顺利出逃。出逃的第一站是新加坡，有媒体曾报道杨秀珠投靠当地一个华侨时，遇到敲诈，杨秀珠只得动身去美国。

知情人称，杨是一个人离开新加坡，女儿女婿一家人都留在新加坡，有人2011年还在新加坡碰到过杨秀珠女儿一家。近两年，杨秀珠女儿女婿一家人据称又移居加拿大，但日子过得很窘迫，杨的亲家母有时还要拿出退休金接济他们。

李松坤算来，他的养女今年已46岁，原本一家人在温州有固定的工作，在国内过着安定幸福的日子，但因为杨，整个被搅乱了，“她不跑，女儿女婿生活稳定，不会这么辛苦。”而杨秀珠也众叛亲离，挚爱的女儿、外孙女都不在身边，身陷囹圄，在异国他乡的牢里，等着命运的裁决。

在美国，现在帮助杨秀珠的只有二弟杨寿弟和堂妹一家，“很多人都说杨秀珠笨，都一把年纪的人，还要弟妹耗费大量的金钱在美国打官司，无论怎么个结果，她事实上已经是人生的输家。”李松坤有些怨恨前妻给女儿生活带去了不好的影响，但他又说，“她这人脾气就是这样，要是别人老老实实躲在哪个角落过此一生就得了。她却不明智，喜欢出头露面，跑了12年了，最终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中国卫生领域潜力巨大

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因此来自中国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

文/李一诺（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采访整理/李光

比尔·盖茨一直如此看重中国。北京代表处是盖茨基金会在海外设立的第一个代表处，自2007年开设以来，我们针对中国的需求与合作伙伴开展了一系列公共卫生项目，主要包括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以及烟草控制。中国的结核病项目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应对耐多药结核病挑战的全球典范。中国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减贫扶贫方面均积累了成功经验，且中国具备快速增长的创新实力和制造能力，与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有长期合作关系，这些因素使得中国扮演独特而重要的角色。

对抗艾滋病的中国专利

艾滋病项目是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最早开始的项目，重点就是动员社区组织参与HIV防控。2015年7月，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的通知》，也算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认可，我们很荣幸能够通过以上项目为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做贡献。

现阶段中国卫生领域仍面临非常棘手的问题：中国每年有近100万新增结核病患者，耐多药结核病病例约占全球的五分之一，这种疾病治疗难度大，成本高；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和消费国，烟草相关疾病的负担也最高；HIV感染者的数量仍在不断上升，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艾滋病毒携带者已经接近50万，同年，新确诊病例达到10.4万例，创历史新高。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对艾滋病毒的防控工作依然赶不上其传播速度。



↑ 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

但是，中国也因此成为基金会实现全球目标的越来越重要的合作伙伴。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期间，中美双方签署了一份旨在为发展合作建立一个框架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消除极端贫困及推动全球发展以及公共卫生及全球卫生安全都有着共同的目标。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中国办公室有着双重使命：继续支持中国应对国内挑战，同时支持中国将其创新成果和经验分享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全球健康和发展目标。近期，基金会和中国商务部签署了《关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是中美携手推动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篇章，充分体现了双方对全球发展的共同承诺。

我们支持的一些中国创新项目已经显示出巨大潜力，有望帮助全球应对一些最棘手的卫生和发展挑战：乙脑疫苗去年通过世卫组织认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获得该认证的第一个疫苗产品，今年4月首次被全球疫苗免疫联盟采购用于老挝全国免疫行动；青岛

澳柯玛公司的疫苗冷链设备Arktek于今年获得世卫认证，并在年初西非抗击埃博拉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于艾滋病预防的男性包皮手术器械——“商环”——6月通过WHO预认证，已经在非洲若干国家进行了临床试验，获得了当地医生和患者的积极肯定，有望为降低艾滋病毒感染发挥重要作用（详见载于《凤凰周刊》2015年第27期总第556期《非洲包皮，中国环切》）；在我们的支持下，中国企业生产的口蹄疫疫苗、小型农机产品、新的结核病诊断工具等等，都在帮助解决全球挑战方面初显实力。

创新来自中国独特国情

说到上述创新，我觉得它们发生在中国有必然性。一方面，中国整体国力不断提升，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实施，都促使中国对创新和技术研发的投入不断提高。中国在研发上的投资已占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5%，位居全球第二。在这个大背景下，自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创新涌现出来。

另一方面，中国的创新产生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独特情境。比如，“商环”的诞生背景其实是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整体医疗水平相对较低，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可能因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患者额外的痛苦，并且费用相对较高。正是这个原因促使做批发生意的商建忠先生发明了“商环”。而这样的发明很难出现在一个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消费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家没有原因也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创新，因为他们无法感同身受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解决诸多卫



生和农业挑战有着鲜活的经验,其面临的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似,因此来自中国的创新成果和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

用慈善改变市场力量

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是“为穷人投资”,或者叫做“催化式慈善”。其核心是投资那些政府和企业无法投资却又十分有前景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那些能够改善全世界数以百万计最贫穷人口生活的想法与创新——包括更好、更便宜的药物,改良的农作物品种,还有数字银行工具等等。

在盖茨基金会,我们相信催化式慈善的力量。

市场往往无法满足最贫困人群的需求,私营企业对穷人所处的市场通常知之甚少,因为穷人消费能力有限,无利可图。此外,公共部

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往往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双方无法通过有效合作来扭转市场的力量使之惠及穷人。非洲每年有数百万儿童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几乎不会致命的疾病,如:麻疹、疟疾、乙肝、黄热病等。有人会以为,如果有那么多孩子死亡,那就应该会有大量的国际性投入来拯救他们,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没有消费者会为一项研究埋单时,市场是不会在这项研究上投入大量资本的,穷人的购买力有限,因此他们的需求不会被市场关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疟疾疫苗的原因。所以,盖茨基金会要用资金建立一个系统,使得市场能够服务穷人。通过我们的先期投资和技术支持,验证一个产品或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从而降低商业企业和政府的投资风险,吸引他们跟进。这种催化式慈善可以触发企业和政府的进一步行动,将创新带给最需要

的人们。基金会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资金、技术和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关系改变市场的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承担了政府无法承担、企业无力承担的风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我们来说,这是创新的必经之路。盖茨先生曾经说过:敢于冒险的人需要支持者;好的想法需要布道者;被遗忘的群体需要倡导者。我们的基金会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举例来说,我们的全球创新平台“大挑战”在过去十年中所支持的所有项目中只有不到一半能够产出符合期望的成果,但是这从来没有动摇过我们持续投资的信心和决心。因为这些项目中哪怕最后只有几个成功了,它们仍然能够拯救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的生命,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

抗日剧中的“鬼子”群演

身为日本人，却在中国影视剧中扮演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兵形象，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人？

记者/孙杨

荒无人烟的郊野土路上，颠簸驶来一辆军用越野车。敞篷车斗里站着一位年轻女子和一群日本士兵。年轻女子的手脚被粗重的镣铐锁住，衣服破烂且沾着斑斑血迹，但脸上却挂着坚贞不屈的表情。

突然，一个急刹车，在一阵扬起的灰土中，为首的日本军官跳下车，一手握着军刀，一手在高处挥动，表情警惕且凶狠，用日语大喊着发号施令：“赶快下来！快点快点！快跟我过来！”“鬼子”们见状，立刻将年轻女子拽下车，推搡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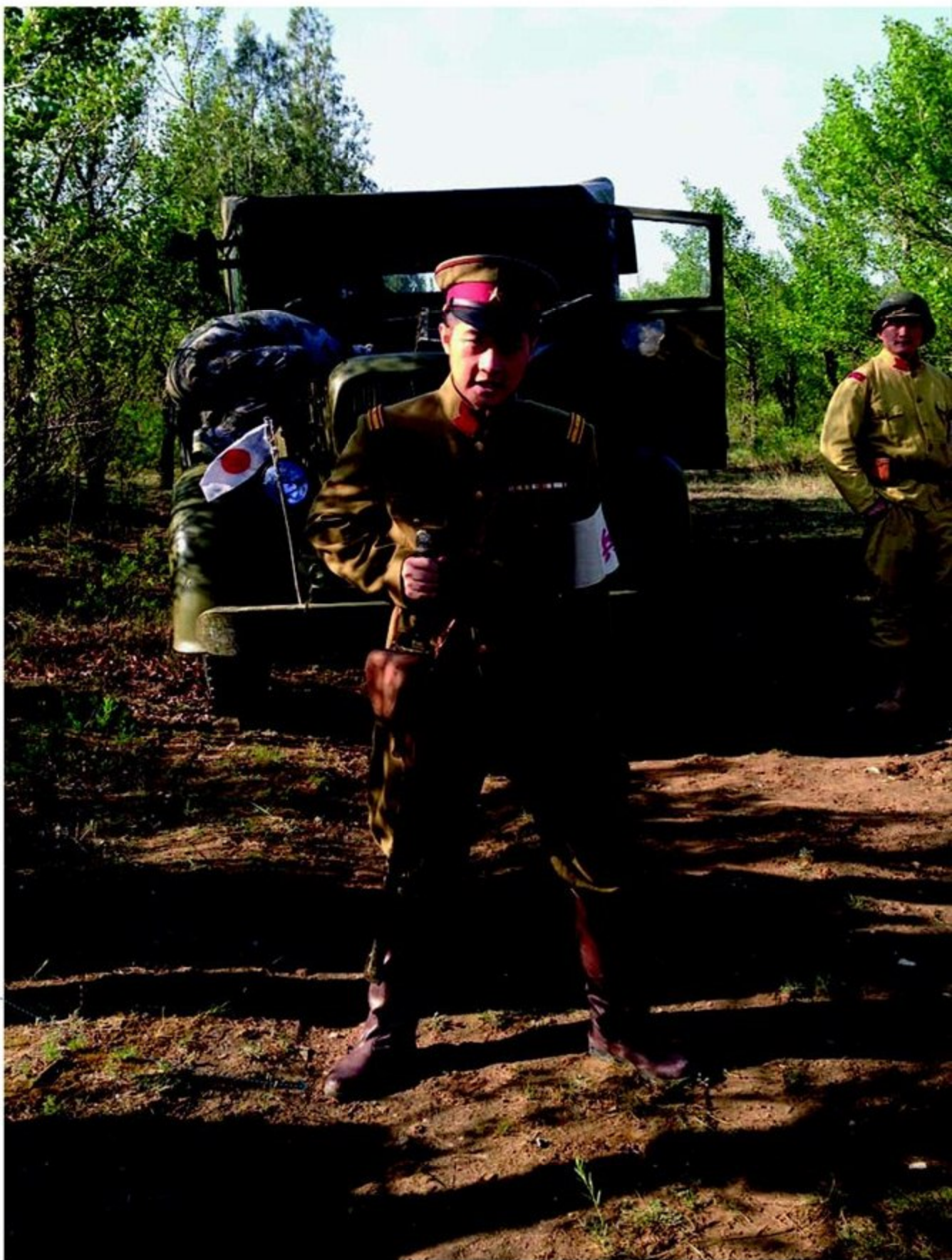
“Cut！”一声叫停，将人们的思绪拉出画面。原来这是一部抗日战争题材电视剧的外景拍摄现场，而刚刚结束的这场戏，拍的是日军押送著名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去受刑的情节。

饰演日军军官的松田俊秀，是一位地道道的日本人，在日本大阪长大。因父亲从事中日贸易，六七年前才随家人到中国读中学。

在近年大陆拍摄的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中，起用日籍演员来演日本兵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这些反派角色在剧中的语言也是纯正日语，一改以前的蹩脚日式中文。一些日本演员因为多次在影视剧中扮演日本兵的角色，成了“鬼子专业户”，比如因参演多部抗日剧而出名的矢野浩二。

相比矢野浩二等著名“鬼子专业户”，大陆抗日影视剧中一些以前大多由中国群众演员饰演的日本兵角色，也开始由真正的日本人出演。这导致在抗日影视剧组中，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日籍群众演员。

身为日本人，在中国影视剧中扮演侵



华战争的日本兵形象，身份与环境的矛盾，令人好奇他们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在中国演日本兵，他们的国人是什么态度？为此，《凤凰周刊》记者特别走近这些日本群演，揭秘他们的拍戏经历以及在中国的生存状态。

日本留学生半年三次演“鬼子”

“导演审完效果没问题，你们可以走了。”直到押送赵一曼的镜头拍完几个小时后，剧组工作人员才通知扮演日本鬼子的十几位群众演员可以离开了。松田俊秀终于松了一口气，卸妆准备离开。虽然在此之前，他有过一些影视剧的演出经历，但还是难免有些紧张，担心自己的表现不能令导演满意。

今年22岁的松田俊秀，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大三级在读留学生。生活中的松田俊秀清秀白净，略带腼腆，中文表达流畅，言谈举止彬彬有礼，穿着打扮大方入时。令人很难将他和剧照上那个板着脸孔、凶神恶煞的日本军官联系起来。

松田俊秀告诉《凤凰周刊》，因为从小就对表演感兴趣，中学毕业时，他曾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的表演和主持专业，但是，日本留学生的身份，令他在面试时遭遇了一些“尴尬”。

在北京电影学院面试时，一位考官看完

大制作的电影，剧组有场戏需要日本群众演员，不知他是否想试试。

根据朋友提供的信息搜索网络新闻，松田俊秀得知，这部电影名叫《浮生如梦》，讲述上世纪20年代，日本为侵略中国，秘密派遣一批间谍潜伏在上海，大批有志爱国人士与敌人展开较量的故事。影片主演除了一大批中国一线艺人，还有日本知名演员浅野忠信参演。因为心中仍然保留着对表演的小小心愿，松田俊秀决定参加面试，并顺利通过。

这场戏是在怀柔影视基地内一处日式居酒屋布景棚里拍的，松田俊秀和另一位日本群演被要求扮演喝酒聊天的日本客人。虽然只是一个没有台词的镜头，但是仍然来来回回拍摄了好几遍。

按剧本要求，松田俊秀和朋友穿着和服，面对面地跪在榻榻米上，一面“喝酒”，一面交谈。虽然没有台词，但是为了令表演更加真实，导演要求两人除了不时做些添酒、点头、眼神交流的动作，还要用日语进行真实的交谈，举止和表情都要尽量模仿上世纪20年代军国主义时期日本成年男子的模样。

有了这一次的表演经历，松田俊秀成为各种影视公司和经纪人常联系的日本群演之一。不到一个月后，就有其他经纪人邀请

前后剧情是什么，但是却被分配了台词。

这个短暂的镜头是，黑暗阴森的监狱中，松田俊秀和另一位日本朋友扮演的日本警察背着手、叉着腿，站在牢房铁栅栏前巡视，然后透过一个小窗口，表情凶狠、紧张地朝镜头方向用日语大声喊：“这帮贼都在干吗？还不赶快让他们过来。”这时，矢野浩二扮演的角色入画，镜头便迅速移开了。

直到今天，松田俊秀仍然不知道矢野浩二在剧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能和他演上“对手戏”，已经让松田俊秀感觉既开心又有趣。

松田俊秀最近一次进组演“鬼子”，是今年4、5月份期间，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出品的电视剧《东方战场》的影视经纪人找到了他。这是一部意在向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献礼的大型电视剧，主演云集数十位两岸三地知名艺人，而松田俊秀最终通过面试，获得日本皇军小头目的角色，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拍摄情节。

松田俊秀告诉《凤凰周刊》，最近几个月，更多的经纪人找到他，邀请他面试的影视剧包括一部由成龙主演的电影和一部由日本人气男星小栗旬主演的作品。甚至还有在横店拍摄的剧组也找他，有的甚至要求他进组两到三个月，扮演戏份稍重的角色。但是考虑到自己身为学生，仍然要以学业为主，所以时间超过3天，或拍摄地在北京以外的剧组，全被他推掉了。

面试、试妆、讲戏，一个都不能少

“拍《浮生如梦》那场戏，我们在硬硬的榻榻米道具上跪了半个多小时。”松田俊秀告诉《凤凰周刊》，原本以为群众演员主要起背景板的作用，很容易演出，结果发现，一样有专业的要求，有时甚至要接受剃头、化丑妆等牺牲个人形象的要求，所以并不是那么好完成。

由于不同角色需要不同气质的演员，所以群众演员也是要面试和试妆的。据有抗日剧演出经验的日本人士介绍，一般来说，经纪人会先和群演们要照片，发给导演

“我本人基本不看这类电视剧”，松田俊秀和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群演不约而同地表示，即使是投资越来越多，制作水平越来越严格，但是在他们这些真正的日本人眼中，抗日影视剧里面的错误和夸张成分还是太多了。

他的履历突然提问：“你怎么看待钓鱼岛问题？”毫无心理准备的松田俊秀，顿时愣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只得尴尬无比地说：“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与北电失之交臂的他，最终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录取。

2014年11月，一位同为在京留学生的日本朋友突然给松田俊秀发来信息称，有部

他到另一部抗日题材的电视剧《少帅》中再度扮演日本人角色。

不过，这次他要扮演的是一名伪满洲国的日本警察。著名的“鬼子专业户”矢野浩二也参演这部电视剧。

与上一部戏全程没有台词，也没有主角出现不同，虽然这一次松田俊秀依然不知道

组初审,通过后才能来参加面试。

露脸较多的日本宪兵角色,通常会安排一些30岁以上、长相成熟、蓄须的日本人扮演,而太瘦弱、头发染成过浅颜色的则往往会被淘汰。

“虽然扮演日本警察和军官时,都戴着帽子,但是剧组还是把我的鬓角和两侧头发剃掉了。”松田俊秀说,为了令形象更接近战场上的日本士兵,剧组还将他的脸上打了深色粉底,看起来黑黑、脏脏的。

而扮演居酒屋里的日本客人时,剧组则要求松田俊秀穿上和服,并且用发蜡和发油给他做了一个油光锃亮的大背头造型。

群众演员们参演的镜头情节大多很简单,且不需要知道前后承接的剧情,但是演职人员仍然会在开拍前给大家讲戏,分析角色特点,提出表演要求。

通常来说,剧组都会要求演员表情动作稍微夸张些,能模仿出中国观众熟悉的那种接受过军国主义教育、凶残冷酷的日本人形象。松田俊秀说,为了完成要求,大家经常会私下对着镜子练习。有时还会自由发

挥一些表情动作。

在他看来,很多角色都有着固定的表演套路,例如,扮演日本军官的时候,下巴略微收低,嘴唇紧抿,眼睛稍稍眯起一些,自下向上看前方,会显得比较凶狠,不苟言笑。而双腿叉开站立,靠前的一条腿微弓,一手紧紧地握住军刀的刀柄,略微皱着眉头,则会显得十分警惕,演押送犯人的日本士兵再合适不过。

说台词时的语速、语气也要拿捏到位,有的要求语气凶狠,有的要求语速快,透露出紧张气氛,还有的则要求一字一顿,语气沉重。所以,一句简单的台词,可能反复拍几遍。

“虽然是群众演员,但仍然要提前一天入住剧组安排的宾馆,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就起来化妆。”松田俊秀说,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时间,有时轮到自己那一场戏,已经是下午了。而拍完也不能立刻卸妆离开,而是要等着导演有空审过样片,确认没有问题才能收工。所以一个最终只被剪辑成几秒钟的镜头,也是至少耗费2到3天时间才完成的。

近年来,网友兴起了一阵给影视剧找茬的爱好,有些影视剧因为反复使用同一位演员扮演不同角色而被网友截屏后发帖嘲笑,而令剧集在观众眼中蒙上了不专业的印象。所以现在,经费宽裕些的剧集都会要求群演每人只拍一个角色一场戏,不能重复出现。

这意味着,经纪人需要寻找更多的外国群演,虽然增加了不少压力,但是相比本国群演,外国群演的酬劳较高,利润空间较大,也驱使经纪人们产生不断挖掘外国人资源的动力。

据了解影视经纪行情的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剧组给本国群众演员的普遍待遇是,长期固定使用,3000元/月,包吃住;临时群众演员每天酬劳不足百元。而一个外国群演的酬劳,通常在1000~2000元/天之间,

一般情况下,影视公司会将外国群众演员的酬劳全额交给经纪人,经纪人与群演间如何分钱不会具体过问。普遍的行情是,经纪人会抽走至少50%。

松田俊秀告诉《凤凰周刊》,以他拍摄的三部剧作品为例,他得到的报酬分别是



以往的抗日影视剧,“鬼子”的扮演者多是中国人。随着制作水准的提高,为演出效果更加逼真,近年来起用日本演员演“鬼子”已屡见不鲜。

600元至1000元之间,这个价格,是在最初接到角色的时候和经纪人谈妥的。

为了和剧组、影视公司建立良好关系,“拿钱办事”的经纪人大多比较负责,在京郊和北京周边省份拍戏,经纪人通常会安排车在市区里接人,拍完再送回。为了招揽更多外国群演,经纪人还会经常要求已经认识的日本人多多介绍自己的朋友过来。

绕不开敏感的历史问题?

近年来,随着影视剧产业化发展,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因为成本低、观众多、好过审等原因,数量和规模都出现了“井喷”。

特别是2015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更出现了一大批献礼剧。据内地媒体报道,仅2015年下半年,就将有《百团大战》、《根据地》、《战火中的芭蕾》、《诱狼》、《开罗宣言》等10部重点影片以及《东方战场》、《东北抗日联军》、《巨浪》、《黄河在咆哮》、《吉鸿昌》等12部重点电视剧陆续上映。各地还将有更多相关影视剧、舞台艺术作品呈现。

然而随着观众口味日益挑剔,纠错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影视剧中的敌军角色,不论大小,都起用日本演员出演,以求演出效果更加逼真。

一些在本国内颇具知名度的日本演员,陆续受邀出现在部分大制作影视作品中。例如曾经在日本创下收视纪录的电视剧《半泽直树》中饰演重要反派角色而获得日剧学院赏最佳男配角的演员香川照之,曾先后在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和中外合拍的反映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拉贝日记》中出演日本鬼子和指挥官。

曾经获得过日本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渡部笃郎则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获邀出演日军高级军官。

在上述电影拍摄和上映期间,两人都曾遭遇或多或少来自日本舆论的关注和质疑。

与他们两人决定参演,主要是看中导演知名度较高、演员阵容强大,以及影片的

国际影响力不同,还有一些日本籍演员,则选择专门在中国发展演艺事业。其中一些人因为外形独具特色、演技成熟和工作敬业,成为各大剧组的“抢手货”,不时在各种抗日影视剧中露脸。

最被中国观众熟悉的莫过于矢野浩二。原本相貌清秀的他,因为在《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等高收视率电视剧中扮演日本军人,而被冠以“鬼子专业户”的名号。

其他出名的“鬼子专业户”还包括参演《烈火金刚》、《血色湘西》等电视剧的三浦研一,参演《雪豹》、《我是传奇》等的涩谷天马,参演《借枪》、《伪装者》等的平田康之以及参演《太行山上》、《乱世三义》等的冢越博隆。

然而,与这些多少混出些名堂的日籍演员不同,在抗战影视剧作品中,还有更多默默无闻的日本籍群众演员的付出。

例如,有媒体统计,在电影《金陵十三钗》中,除一位日军大佐和两位中尉外,其余日本兵均没有名字。但查阅演员表,共有39位日本国籍的演员出演了日军军官和士兵,其中绝大部分是真正的日本人。

松田俊秀告诉《凤凰周刊》,根据大使馆统计的在册信息,目前在京日本人超过八千人,而在京的日本留学生为一千多人,主要学习语言专业。其中北京外国语大学约有日本留学生400至500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有200至300人,其余学校人数较少,松田俊秀就读的传媒大学,只有20余位日籍学生。

平日里,这些在京留学生有自己的活动圈子和网上交流群。大家互相联系和分享信息非常容易。所以每次有戏要拍,就会有人在圈子里发布信息,招呼有兴趣的人一起去面试。

面对一个日本人,出演本国反派角色是否有所顾虑的问题,松田俊秀说:据他了解,身边朋友愿意参演影视作品的原因都很简单,有的是觉得好玩,想近距离了解下影视剧作品拍摄过程;有的是希望赚些零花钱。而他自己则认为,这些都是值得记忆的难忘体验。

由于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相较其他同胞更长些,对中国的舆论了解得更多,松田俊秀也坦承,最初有经纪人找到自己出演反派角色时,也曾有过小小顾虑,担心会被国内的朋友知道和指责。但是家里人却都很支持他尝试去做新鲜的事情。放假回国期间,他也曾主动向国内朋友提起过自己在中国拍戏的经历,没想到大家不仅不指责他,反而都觉得是值得羡慕的体验。

“在日本,大部分年轻人对历史和政治不太感兴趣,没有人会太过关注你拍了什么角色。”松田俊秀以个人亲身经历向《凤凰周刊》总结。虽然最近一段时间,日本媒体也关注中国“抗日神剧”现象,但是大部分人看到,都当做一条趣闻,一笑而过。

“我本人基本不看这类电视剧”,松田俊秀和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日本群演这样告诉《凤凰周刊》。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即使是投资越来越多,制作水平越来越严格,但是在他们这些真正的日本人眼中,抗日影视剧里面的错误和夸张成分还是太多了。

“剧中角色通常将和服穿得松垮邋遢。”松田俊秀说,在日本,和服有固定而繁琐的穿法,特别是女性和服,穿着方式非常讲究,但是在中国电视剧中,则非常敷衍。另外,一些中国演员虽然很努力地模仿日本人的举止和动作,但因为不是“生活中的习惯”,所以总是令人觉得“夸张和别扭”。

当然,对于他自己拍摄的几部剧,松田俊秀还是非常期待的。“希望能看到自己的脸出现在银幕上,哪怕只有一秒钟。”松田俊秀说,虽然并非表演专业出身,但是参演了这么多部剧后,他也不排除今后会尝试向影视方面发展。

这种想法,也令他总是想起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那次失败的面试。松田俊秀说:如果有机会重来一次,他希望告诉那位考官,作为日本的年轻一代,两国摩擦和争端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虽然他是在日本出生并长大,但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朋友,也在他成长中留下了重要的影响。

香港政商界刮起创办智库风

当内地创办智库蔚然成风时，香港政商界的智库也如雨后春笋冒出，最大智库由前特首董建华牵头。

文/凌德(香港)

香港政改方案在今年年中被否决后，政坛版图也随即加快重组及换代速度。多位重量级的议会领袖先后表明，将于明年立法会选举退下前线。当中最瞩目的是立法会主席曾钰成，他近期在不同场合均表示明年不再参选。

但令人意外地是，曾钰成同时也宣告，明年他退任立法会主席后，将会创办一个新的民间智库，除了研究一些政治的大课题，也会订出政纲，以供有意参选下届特首选举的人采用，为香港前路出谋献策。

曾钰成雄心勃勃地说，该智库找专家研究政策之余，也会找持份者一同讨论政策，“甚至开居民会、咨询会，落区听居民意见或推销政策，成为倡导型智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内地学术界创办智库蔚然成风。在香港，政商界设立的智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最大智库董建华牵头

香港智库目前规模最大的当属前特首董建华牵头的“团结香港基金”，该基金开宗明义是荟萃香港、内地及国际精英，为香港长远发展出谋献计。基金计划就六大范畴做研究，打头炮的土地规划研究报告将于短期内发表。

除了董建华，来自商界的香港富豪林建岳也在10月初宣布成立一个新智库“香港文化协进智库”，并已聘请《文汇报》前总编辑李晓惠加入智库工作。消息人士称，林建岳成立的智库，有意包揽香港传统商界分子，以在日后大展拳脚。

泛民方面，已退出公民党的温和泛民

政客汤家骅，宣布辞去立法会议员一职后，也准备专心经营其新成立的智库“民主思路”，并不排除日后将有升级版，将智库变身政党，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智库”是从事政策研究及倡导的机构，属于公民社会组织之一，与作为政治组织的政党一同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社会发展，在西方已流行多年。但在香港，直至九七回归前夕，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政经变化，才催生了第一波的智库潮。较著名的有一国两制研究中心、香港明天更好基金及Vision 2047 Foundation。

其中，Vision 2047 Foundation是由一群世居香港、热爱香港的欧美及犹太裔商界及专业人士组成，定期举行论坛、早餐会、分享会甚至组织交流团等，旨在提升所有对香港有影响的人士或组织对香港回归中国所带来的变化的认知，加深世界对香港的了解，为香港

港教育学院教授吕大乐掌舵的“新力量网络”；2003年成立、由一群30多岁的年轻专业人士组成的“三十会”；以及2004年成立的“Roundtable研究所”等等。

根据国际公认权威地位的美国宾州大学评估，目前香港每100万人口，就有超过四个智库，比例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当地13.5亿人口，只有429个智库。以人口计算，香港拥有亚洲第三最多的智库，只有亚美尼亚和马尔代夫的智库与人口比例较香港多。

不过，相比西方智库对社会和经济政策有很大贡献，香港虽然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智库，但几乎没有一个达到世界标准，对社会政策的影响力亦不算大。

美国宾州大学专门研究智库总监James McGann指出，个中原因，与香港智库差劣的研究素质有关。

他说：“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领袖，而你

香港没有多少个智库像美国一样能负担聘请10个以上的常驻研究员，亦造成本地高学历人才觉得在智库工作吸引力不大。

平稳过渡至2047年作做好准备。

回归后，香港发生不少重大事件，如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及后又遇上禽流感 and SARS肆虐，楼股双挫，失业率高企，社会经济蒙受打击，中产人士对前景感到焦虑。不少知识分子乘势成立智库，形成了第二波的智库潮。

当中的代表有在2002年成立、由香

又想打造一个新的，以及富有动态的研究所，你必需依照基本的标准。你必须在咨询过程，以及在数据的取得和研究的方法上，有一个透明度，可惜这些（在香港的智库）大多都不愿意公开。”

更甚地是，香港社会上有不少所谓“智库”或关注组鱼目混珠，充斥政坛。香港年轻时事评论员朱家健接受本刊记者访问时



2014年11月10日，前行政长官、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牵头的“团结香港基金会”正式成立。顾问涵盖政商、教育、体育等各界重量级名人，包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国学大师饶宗颐、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长实副主席李泽楷等。

指出，数年前，香港忽然兴起关注社会话题，智库热潮崛起，以青年事务为主或以青年成员作骨干的智库亦五花八门，但不少智库其实只是以一人核心的挂名组织，巧立明目，意图捞政治油水，对社会或关注的议题根本没有投入。

他举例说：“我曾经遇过一个年轻人，声称自己创办了某某智库，其实香港成立组织很简单，这个智库只有他一个人。后来被人识破洞悉其葫芦后，他又另设了一个什么动力智库，换汤不换药，不做实事又套用新组织名称，意图掩耳盗铃。”

对香港智库的作用拭目以待

今年1月，内地官方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一时间，内地刮起了“智库风”，成为今年的关键词之一。与此同时，经历过政改方案被否决、普选计划落空后，下届香港特首人选依然由1200人选委会

决定，香港何去何从成为摆在港人眼前的一大课题。当地一些政商界人士也兴致勃勃地赶上内地智库热潮，纷纷创立智库。

据了解，中央政府曾就香港成立智库做过调研报告，认定智库对香港管治有正面作用。因为过去十多年，特区政府政策调研不足，政党的政策建议亦没有足够的调研基础，不少都是以选举为主导，因此中央更欢迎独立智库的出现。有香港商界人士不讳言，因为中央鼓励，所以愿意支持智库工作。

但与内地智库稍为不同的是，近来香港成立的不少智库，均有意为2017年特首选举“造王”，成为问鼎特首宝座者的后盾。

分析指出，有意参选下届特首人士假智库之名，至少有以下四点好处：第一，透过智库之名筹划参选政纲，至少更易给公众印象，他们是富有诚意参选特首；第二，透过智库不时发表对当今政策的看法，又或对政策往后应如何变化的建议，更容易替他们属意的人选营造舆论；第三，借助智库

这相对不政治化的名义，更容易透过集思广益之名，汇聚各路有影响力人士，建立人际关系网；第四，当然是更方便先行组织竞选班底，进可攻退可守。

香港城市大学专业持续进修学院学术统筹宋立功也认为，智库并非政党，却是一个伸缩性颇大的政治平台。智库可以主打研究、民调、举办研讨会收集民间意见及宣扬政治理念；倘若有丰沛的人脉，更可游说包括政府、商界、政党以至具影响力的民间组织，推动政治与社会改革。由此可见智库这个平台具有宽阔的发挥空间。

他说：“待时机成熟，人力及财力资源到位后，智库可进一步提升成为政党或政团，在选举中一显身手。近年最佳的例子莫过于叶刘淑仪早期成立的汇贤智库，经过努力之后，吸纳大批社会精英，蜕变为新民党。”

宋立功预期，除了汤家骅的“民主思路”，曾钰成主催的重量级智库之外，相信泛民温和派与建制开明派将陆续还会有政治人物构思新的智库。

不过，汇贤智库主席、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对未来智库在香港的发展持谨慎乐观态度。她认为，在香港成立智库远比在美国困难，以她筹办汇贤智库的经验来说，聘请研究人员比筹募资金更困难，“香港没有多少个智库像美国一样能负担聘请10个以上的常驻研究员，亦造成本地高学历人才觉得在智库工作吸引力不大。小型智库如汇贤要解决人手问题，需透过将个别研究委托外面的学者进行。”

另一边厢，香港政党以短视的民粹意见炮轰政府，以争取民众支持，这对情况毫无帮助，也令政府面对压力，被迫接受政党的要求，智库经过仔细研究后提出的建议则受到无视。这样只会令智库再没有兴趣进行高质量的研究，窒碍智库在香港的发展。

“香港的政治气候不断变化，促使更多智库成立，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但他们能否有所作为，却是另一回事。”叶刘淑仪说。

中国国企改革的亮点与悬念

虽然国企的民营化并不在中国目前的选择范围之内,但仍有必要让效率低下的国企增强活力。在维护国企核心地位的同时,完善其体质、增强其竞争力才是本次改革的本质。



梶川光俊

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

参赞,负责收集并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财政和金融方面的信息。因此,我希望从一位长期追踪中国经济动向的外国人的视角,在充分依据中国所处内外环境的基础上,对《指导意见》所体现的改革内容进行一些分析。

激发国企活力≠民营化

参照日本的经验,一说到国企改革,人们会以为指的是国企的民营化。确实,吸引民间投资发展混合所有制是指导意见的内容之一,但在以公有制为原则的中国,国企是公有制的核心主体,如果大幅进行国企的民营化路线,将意味着国家基本制度的变革。在《指导意见》中,包括了“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提高国有资本效率、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中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等内容。由此可以看出,本次改革的主要目的不是推进民营化,而是要强化国企素质、激发企业活力。

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开展国企民营化路线以来,很多国企都实现了股份公司化、民营化发展。而在中国,要实现国企的民营化,至少存在以下两点障碍:

首先是与作为国家基本法的宪法之间的关系。中国宪法第6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明确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原则。国企是生产资料的核心所在,国企的全面民营化是与该条相抵触的。在中国现任领导层所发布的全面深化改革基本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三中全会通过)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这体现了符合该条宪法精神的方针,这一表述也被用在《指导意见》的第二项“总体要求”中。

同时,为了维护中共领导层最为重视的社会稳定,必须有一个确保在发生社会不稳定事态时、能够遏制该事态的有效体制。令人记忆犹新的是,今年夏天发生股市动荡时,国企在金融市场摆脱股价暴跌的困境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企在主要市场享有支配地位,也有利于让作为中国治理国家之根本的“党的领导”在经济领域得到贯彻。

综上所述,虽然国企的民

营化并不在中国目前的选择范围之内,但依然有必要让效率低下的国企增强活力。因此,在维护国企核心地位的同时,完善其体质、增强其竞争力才是本次改革的本质。虽然《指导意见》的第五项中提到要“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但并非将国企全面民营化,而是将国企的一部分股份让渡给民企,在经营中听取更多意见,增强竞争力,以此来完善国企的内在机制。

日本《公司法》带来的启示

就本次改革的亮点来说,我认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企进行分类借以推动改革的做法值得关注。在《指导意见》的第二项“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中,将国企划分为公益类和商业类,根据其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确定具体的改革方向。而且,将商业类国企进一步划分为“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和“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的基础上明确了方针。虽然这二者均要积极推动混合所有制,但是后者要保持国有资

目前,旨在形成规模占全球GDP四成巨大经济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达成基本协议,其中专门提到,要限制国有企业在市场上压制民间企业的活动。不过有人认为,在基础设施出口等领域的国际竞争中,有强大国企的参与会更有效率。

而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正在描绘着让国企强势“走出去”的宏伟画卷。中国国务院不久前正式发布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由于这项改革涉及被称作“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的国企,必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我是日本财务省出身、三年前担任日本驻华大使馆经济

本的支配性地位。

上述第二项还规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负责制定所出资企业的功能界定和分类方案,报本级政府批准”,对于构成国企核心部分、成为中国经济顶梁柱的中央企业,将由国资委和财政部制定分类方案。由于未来在该分类方案的基础上,或会制定在国企中占很大比重的地方企业的分类方案,因此该分类方案值得关注。从防止大量国企被归类为公益类,从而瞒天过海、改革走过场的意义上讲,对商业类国企进行具体分类的做法应当得到很高的评价。

第二,具体提到了旨在完善企业治理的措施。在《指导意见》的第三项“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中,为了充分发挥董事会的决定作用,指出存在“一些企业董事会形同虚设、‘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这一病理现象,同时也提到“董事会外部董事应占多数”等具体方针。

从根本上讲,要落实这样的改革绝非易事。由此让我想到今年5月1日日本推行的《公司法修订法》,或许能给中国提供参考。日本这次进行的公司法修订,主要内容之一是要完善企业治理、提高企业经营水平。

泡沫经济后,日本业界长期身陷囹圄,很多企业因而把大部分利润作为内部留存积攒起来,结果失去了投资者的信任,导致股价低迷。企业治理改革的目的是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这次审议过程中最大的一项争议在于,是否强制规定上市公司设立外部董事。这是

因为,通过设立外部董事,可让不同意见参与到公司的运作中,使当前体制获得妥善建议和有效监督,从而提升国内外投资者对日本企业的信任度。然而,最终妥协的结果是,不将设立外部董事作为义务,但如果相应的大型企业没有设立外部董事,须在股东大会上解释“不适于设立的理由”。“要么遵守,要么不遵守但要说明理由”的这种规定,是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企业治理中采用的管理策略。

第三,体现了直接让经常性亏损的国企退出的姿态。《指导意见》的第四项“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提到,“建立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充分发挥失业救济和再就业培训等作用,解决好职工安置问题,切实保障退出企业依法实现关闭或破产,加快处置低效无效资产,淘汰落后产能”,表示会制定国企清算破产的退出机制。

为了遏制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减速,中国采取了约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措施,但由此带来的金融宽松使得项目选择不审慎、最终导致产能过剩,

在“走出去”的号令下,着眼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激发国企活力、增强竞争力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趋势。但值得警惕的是,这样做可能会削弱中国民企的积极性。

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一般而言,与淘汰企业相比,人们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能带来经济稳定、确保就业的经济政策,但如果为了避免出现失业而回避破产、搁置问题,只会使不良债权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制定有效的退出机制,淘汰过剩的生产设备。

国企改革的悬念

进一步说,毕竟不能做到国企的民营化,在“走出去”的号令下,着眼于全球范围的竞争,激发国企活力、增强竞争力可以说是一个自然趋势。但值得警惕的是,这样做可能会削弱中国民企的积极性。因此,本次改革同样存在悬念。

本次改革的着眼点是如何提高国企效率、增强竞争力,对于民企如何获得充足的资源(资金、人才等)、焕发活力、增强竞争力,需要另外做出考虑。如果只是加强国企的实力,民企必将处于严峻的竞争环境下,因此从均衡的观点看,同样需要为民企采取振兴措施。

《指导意见》中提到,要“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但同样表示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所谓混合所有制,就是虽然民企可以成为国企的股东,但在控股比例上仍是国有资本占主要部分。这样民企即使出了钱,在经营的重要决策上也很难有话语权,这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有自愿为国企出资的积极性。

同时,国有资产的估值也存在困难。而无法计算出恰当

的股票价格,就可能出现国有资产的流失。虽然《指导意见》的第六项就“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单独做出了规定,但是国有资产毕竟不是自己的钱,执行者如果感觉不到切肤之痛,损益评估就难以到位,甚至可能做出有利于出资方的资产估值。

此外,虽然《指导意见》在第一项的“主要目标”中提到“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但这个目标似乎不够充分和明确。确实,《指导意见》中能看到诸如“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这样的具体目标,但是其他基本上都是定性目标。那么到了2020年是否实现目标,不能全靠主观做出判断。当然,这或许与本次改革提出的是“激发活力”这样一个很难量化的目标有关。我们期待在《指导意见》中提及的目标,能够得到更加具体化的体现。

很多人说,国企享受政府照顾、享受国有银行的优先融资,即使经营不善也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这是低效率的国企横行的原因,那么建立让效率低下的国企退出的有效机制才是关键所在。能否很好地提高国企效率、增强国企竞争力,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继续运转的试金石,我们将对《指导意见》下的具体制度和机制的制定情况拭目以待。

(本文不代表日本政府和日本驻华使馆的意见)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2005年9月

默克尔在柏林的一个投票站投下选票，之后成功当选，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



2006年1月

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默克尔与爱尔兰摇滚乐队U2主唱博诺合影留念。



默克尔十年

在外界看来，默克尔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有原则，但能灵活运用和尊重现实。

特约撰稿 / 陶短房

对于德国现任总理默克尔来说，近一个月迎来了两个重要日子：十年前的9月18日，她首次带领基民盟/基社盟参加德国联邦立法选举，以微弱多数击败社民党候选人施罗德；而十年前的10月10日，基民盟/基社盟和社会民主党组成首个“黑红联盟政府”，她也在这天被确定出任德国继神圣罗马帝国女皇后、千年来首位日耳曼地区女政府首脑。而在11月22日，默克尔将迎来其正式就任德国总理十周年的纪念日。

据德国《明镜》周刊不久前披露，默克尔有意作为联盟党的总理

候选人竞选第四任总理。有意思的是，此消息一公布，德国媒体争相转载。德国最大民意调查机构之一Emnid甚至做了份民意调查，显示假如德国现在举行大选，联盟党将获得43%的选民支持率，社民党为24%，默克尔再度当选将毫无悬念。而当德国媒体普遍赞扬默克尔在位十年的辛劳与成就时，默克尔本人却并没有任何庆祝的意思。

从“科尔的女孩”到“科尔终结者”

默克尔出生自原东德，并作为东

德政治体制改革后的民主力量代表，在“民德倒计时”阶段崭露头角。两德统一后她原先所属的东德政党并入基民盟，她本人则作为“前东德民主力量代表”被吸纳进赫尔穆特·科尔内阁，出任妇女与青年部长。

根据东西德统一的协定，西德政府在下次联邦大选前应吸纳5位东德部长入阁，但1990年10月3日统一政府组成时，默克尔并不在其中。同年12月19日，东德最后一任总理洛塔尔·德梅齐埃因被指控曾为东德情报部门工作，被迫辞去特别任务部长一职，原本因资历不够而落选



2007年5月
默克尔在柏林欢迎
到访的新任法国总
统萨科齐。

2008年4月
默克尔参加奥斯陆国家歌剧院
揭幕典礼时，一袭低胸礼服立
刻成为摄影师的焦点。



2009年11月
默克尔出席柏林墙
倒塌20周年纪念活
动，与波兰前总统瓦
文萨（中）、前苏联
领导人戈尔巴乔夫
（左）会面。



的默克尔成为5位部长中的“替补”，从此登上了德国的政治舞台。有意思的是，洛塔尔·德梅齐埃的堂弟托马斯·德梅齐埃如今在默克尔内阁出任内务部长，并因“难民潮”问题变得举世闻名。

两德统一时西德为不失时机，许下了许多政治承诺，甚至连德甲都特意扩军，吸纳了两支东德足球俱乐部。但随着政治方面新一轮的新陈代谢，绝大多数“照顾性质”的“东德元素”因不适应新体制而被淘汰或边缘化。这其中默克尔却成为异数：1994年换届时，她非但未如其他多数前东德阁员那样昙花一现，相反出任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长一职，成为基民盟（CDU）中举足轻重的要员。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她本人出众的政治素质，一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牧师家庭出身让其知识渊博、口才出众，而长期在东德处于受监视

的异议人士地位，又让她养成了深思熟虑、谨慎务实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科尔的欣赏和提拔也不容忽视，这位“德国统一之父”十分欣赏这个来自前东德的政治新秀，不断委以重任，并曾在公开场合称她为“小姑娘”。默克尔也一度有了“科尔的女孩”的绰号。

如果仅满足于此，她或许未能后来居上，成为除撒切尔夫人外、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欧洲国家政府首脑。当时公认的科尔接班人，是老资格政治家、比默克尔“大一轮”的现任德国财长朔伊布勒。但1998年，基民盟/基社盟卷入政治献金丑闻，并在大选中败给社民党/绿党的“红绿联盟”，作为丑闻漩涡中心的科尔灰头土脸，朔伊布勒也难脱干系。

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科尔的女孩”当机立断与“恩人”划清界限，以“科尔终结者”形象强势出头，并在2000年4月当选基民盟主

席，取代了朔伊布勒。虽然两年后联邦选举时她未能带领“黑党”获胜，但三年后仍如愿以偿。

不一样的“铁娘子”

许多人喜欢拿默克尔和撒切尔夫人相比，并将她称为德国“铁娘子”。的确，两位都是中右翼女政治家，都拥有令人瞠目结舌的漫长政治生命和总理任期，也都和美国关系密切，还都主张自由市场经济，且在经济上有所作为。

默克尔接任之初，德国经济正因“马克危机”和“统一后遗症”深陷滞胀泥潭，财政包袱沉重，赤字问题严峻。经过十年，如今德国已成为欧洲最令人瞩目的火车头：出口和出口盈余高居欧盟第一，2014年GDP增速达到3年最佳的1.5%，失业率为1990年以来最低，预算盈余高达创纪录的200亿欧元，这些都与“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似曾相识。



2011年6月

默克尔访问美国期间，在白宫与欢迎仪式上的孩子们握手。



2010年6月

默克尔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大多伦多的G20峰会现场。



在国际舞台上，默克尔成功让德国介入一系列国际事务，且未因二战战败国身份而遭致抵制和非议。十年间，德国迅速成长为欧盟“两大支柱”中较法国来说更粗壮的中流砥柱，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达到战后高峰。

但在国内很少有人称默克尔为“铁娘子”，她和撒切尔夫人的不同之处远多过相似之处。

撒切尔夫人和她在任时的英国不仅始终以“美国表亲”的姿态干预国际事务，更公然在欧盟中扮演“美国卧底”角色；而默克尔治下的德国和美国更像一对有分寸的政治合作伙伴——紧密、但谈不上亲密。默克尔和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不存在这种“知己兼闺蜜”的特殊关系，相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长期将她列入窃听名单的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此外，同为保守派政治家和自由

市场经济信奉者，撒切尔夫人从言到行都显得“原教旨”一些，她和里根一搭一档强调“市场万能”，在国内激烈推动国企私有化并不断拿社会福利和政府开支开刀；默克尔在这方面显得温和得多，她推动基民盟制订的“新市场经济”原则更强调稳定，突出市场作用却也兼顾政策引导，虽强调“节支”但并未大幅度削减福利，相反不断出台保护女性就业和增加儿童福利等方面的法律、措施。

更引人瞩目的则是“国际颜色”：撒切尔从不掩饰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反感，不仅是“铁幕”的摧毁者之一，也始终对任何带有苏联色彩的元素避而远之；默克尔虽然“出身”更加反共，但执政后却显得长袖善舞，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一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保持相当友善的关系，甚至危机爆发后也多次努力充当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斡

旋者，而非单纯的制裁参与者。

天生的现实主义者

在外界看来，默克尔是“天生的现实主义者”——有原则，但能灵活运用和尊重现实。

默克尔反共，但只要认为对德国有利，也从不放弃和社会主义国家或“苏联余孽”合作的机会。上任之初她对中国的批评之声差不多是西方领导人中最激烈的，还说过诸如“全球粮食危机是中国人牛奶喝多了造成的”之类尖刻的话，但随着中国经济、政治实力的增长，她领导下的德国和中国间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德国成为欧盟内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重要的高科技来源地之一，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的合作也越来越频繁和默契。耐人寻味的是，随着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和密切，默克尔“批评者”的形象非但未



2013年12月

默克尔出现在德国议会，不久后她再次连任新一届联邦政府总理。



2012年4月

德国马洛，默克尔参观鸟类公园时被鹦鹉包围。



黯淡，反倒更巩固了——正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指出的，她这位“老朋友”的话就算刺耳一些，中国领导人也更容易听取和包容。

默克尔所处的时代，基民盟/基社盟的政治优势并不像冷战后期及科尔时代那样明显，迄今她所参加的四次联邦立法选举，一次（2002年）失利，两次“不输”却未获得决定性胜利，真正的“完胜”仅2009年一次，但她都能克服政治障碍和左右隔阂，与政治对手——中左的社民党组成“黑红联合政府”。这是二战之后历届中左、中右领导人都未曾做到的。

之所以能做到前人之不能，最关键的要素恰是灵活和务实。被称作“默克尔主义成功第一块基石”的“新市场经济”，最初是中左社民党一直极力推动的纲领，并曾被基民盟/基社盟的干将大张挞伐，而默克尔却并没有按照“对手支持的我们

必须反对”的逻辑行事。

默克尔曾担任过核能负责人，对核电有好感，也曾不顾环保主义者反对，执意延长德国核电站的运转周期。但在作出上述决定后不久，日本福岛核事故爆发，德国公众反核电情绪空前高涨，她便当机立断，毫不犹豫地宣布全面关闭境内核电站。

在难民问题上，默克尔的灵活性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对于吸纳过多难民，她的态度和相当一部分基民盟骨干一样，是有保留的。2010年针对难民和非法移民过多、德国社会消化压力沉重，她曾公然表示“多元文化在德国已死”。

今年早些时候她在视察时，面对一名巴勒斯坦小女孩关于“我要留在德国”的恳求，不顾对方流泪直言峻拒，被一些人斥为“冷血”；但随着9月2日难民船事故的发酵，德国舆情、民意发生大逆转，同情难民的

声调高涨，“冷血默克尔”也迅速转化，一下成了对“地中海难民”最慷慨的世界领袖和“默克尔妈妈”。

德国在9月5日率先宣布对叙利亚难民全面“不设限”开放边界，次日更宣布准备在年内接纳80万“地中海难民”，要求2016年额外拨出6亿欧元用于安置难民（将当年难民安置预算增加近60%），在已宣布建造30万套难民安置房基础上要求各州再建造15万套，并由联邦政府出面担保，大众银行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融资。

不过，由于欧盟9月22日在内政部长会议上罕见地以“多数票”方式强力通过分配12万难民的方案，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对西欧，尤其德国的“欺凌”表示不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更说，拒绝接受德国在难民危机上的“道德帝国主义”。

可以想象，只要默克尔时代延



2014年7月
默克尔访华时来到四川，向川菜大厨学习宫保鸡丁的做法。

2015年9月
默克尔出席柏林举行的七国集团妇女论坛时，与阿富汗女政治家巴拉克扎伊自拍留念。



续，这种现实主义的“急刹急转”还会不断上演。

默克尔时代如何延续？

如无意外，默克尔的总理任期将延续到2017年，届时她将打破撒切尔夫人的战后欧洲女政府首脑任职年限纪录。

届时她只有63岁，在世界大国领导人中并不算年长，按照德国的政治体制，她仍可谋求连选连任，前提是她的基民盟/基社盟可以在选举中占据优势，赢得单独或联合组阁权。从目前情况看，尽管尚未公开表态，但默克尔有可能会在2017年谋求继续连任，事实上不论基民盟/基社盟内部，还是其他“红”、“绿”、“黄”德

国党派，目前都尚找不到一个足以构成对默克尔地位有力挑战的人选。

当然，默克尔时代并非没有隐忧。

首先，尽管德国经济平稳、社会安定，但思变者仍然不在少数。2013年原来的“黄色”盟友自民党（FDP）未能获得议席，导致基民盟/基社盟不得不和政敌社民党联合组阁，并为此付出内阁不稳定和政策受掣肘的代价。2017年若重演这一幕，这种不稳定和掣肘也将带入下一任期。此外，因政治妥协而入阁的“超级部长”——副总理兼经济和能源部长、社民党主席西格马尔·加布里尔很可能在2017年成为社民党总理候选人，届时“黑红”这对“露水夫妻”间的竞逐将会十分微妙。

其次，此次难民潮的应对在党内外引发不少非议，党内许多骨干、盟友（尤其是基民盟/基社盟传统票仓、难民潮首当其冲的“重灾区”巴伐利亚）都埋怨默克尔“开放”得过于轻率、慷慨，对民意舆情看得太

重，政治对手则指责她开放后又“反悔”，出尔反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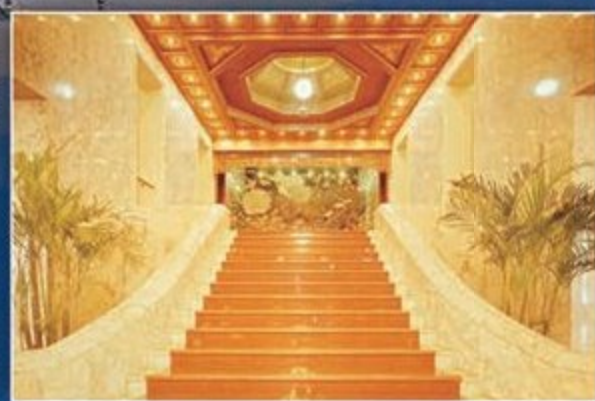
难民潮也让公众意见出现严重分歧。德国开放边境后数日所做的一项民调显示，33%受访者希望接收更少的难民，希望不减少的有37%，希望接收更多的也有22%。但德国N24电视台与私营机构Emnid做的联合民调显示，2/3德国人认为此次德国政府在难民危机处理方面的工作“相当糟糕”或“非常糟糕”。很显然，短短十几天内围绕难民问题，德国舆情民意多次反转，至今莫衷一是。难民问题的后遗症很可能在2017年前后发酵，届时这些都可能成为反对党攻击默克尔的“炮弹”。

但无论如何，默克尔时代在德国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她对战后德国的政治影响和政治遗产，恐怕超过此期间任何一任德国总理——连阿登纳、勃兰特和科尔也皆无例外。

难民问题的后遗症很可能在2017年前后发酵，届时这些都可能成为反对党攻击默克尔的“炮弹”。

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

尊贵典雅 贴心服务 商务至爱



地址：中国北京中关村南大街1号 | 邮编：100873
预订：(86--10)68498080 | 电话：(86--10) 68498888
传真：(86--10) 68498866 | E-mail：rd@BJfriendshipotel.com

www.BJfriendshipotel.com



友谊宾馆官网



友谊宾馆微信

南亚罗生门

印度封锁尼泊尔内情

特约撰稿 / 毛克疾

继4月遭受大地震之后，尼泊尔近来再度遭遇严重危机。因为不满尼泊尔国会通过的新宪法，生活在南部的马德西人（Madhesi）进行了抗议活动，通往尼泊尔的燃料和物资通道也被迫中断。尼泊尔指责印度赤裸裸地干涉内政，印度却断然否认，并把运输中断归咎于尼泊尔的混乱治安和动荡政局。

10月28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鉴于印度继续封锁尼印边境，尼泊尔政府官员11月会飞抵北京，商讨汽油购买协议的条款。尼泊尔政府官员表示，初始交易中国将提供130万升汽油。这将是尼泊尔有史以来第一次从北方邻国进口燃油和其他石油产品，也意味着其将结束基本能源供给完全依赖印度的历史。

这种罗生门式的情节背后，正在上演的是一出怎样的危机？这场由尼泊尔国内问题诱发的事件，因为先后牵涉进印度和中国而产生了深刻

的地缘政治隐喻。南亚中小国家对于印度经济上的依赖和政治上的怀疑，对于中国“对冲”印度的期待和对于印度“秋后算账”的担忧构成了极具张力的地缘图景，再次将南亚推入世界焦点的核心。

封锁活动剑指尼新宪法

尼泊尔作为内陆国家，三面被印度包围，尤其是南方连接印度的通道对能源、食品和药物等关键物资的运输影响极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4年的数据显示，来自印度的货物占尼泊尔进口的63%之多，可谓“印度一打喷嚏，尼泊尔就会感冒。”

运输生命线被切断后，尼泊尔政府下达严格的油料限额令，优先满足公共部门和应急部门的需求，甚至动用仅够使用17天的紧急储备燃料。尽管如此，公交车、救护车、公务用车还是在加油站外排起了几英里长的队伍，但多数加油站早已无油可售。航空公司被迫修改航线，依靠中途加油以完成飞行。严重依赖柴油发电机供能的工业活动也受到影响。除了军警的紧急储备以外，尼泊尔大部分地方已经滴油不剩。

残酷的是，原来尼泊尔和中国之间的货运走廊在今年4月的大地震中受损严重，至今还没有恢复通行能力。因此，这场能源危机对尼泊尔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伴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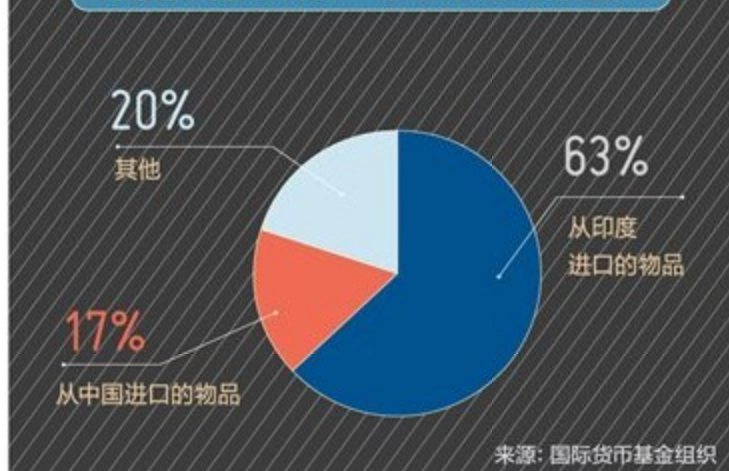
着社会动乱的火焰，一场人道主义危机可能上演。

这场危机的源头锁定在尼泊尔南部与印度接壤的地区。由于对本国新宪法的选区划分及国会代表权不满，马德西人早在宪法通过前就在边境地区进行了示威活动。新宪法刚刚通过，印度方面就借口“尼泊尔境内的安全和社会问题”对北上尼泊尔的运输车辆进行了“严格的安全检查”，并连发两个政府声明，声称尼泊尔政府“未达成广泛共识”，并敦促其回应马德西人的要求。

虽然印度一再否认有干涉尼泊尔内政的企图，但这种说法似乎站不住脚。首先，如果运输中断的原因真是由于尼泊尔国内抗议引发的社会动乱，那么早在新宪法颁布之前就应切断运输，因为马德西人的抗议活动早在今年8月底就展开了。但现实情况是，直到9月中旬新宪法公布不久后，运输线才被切断，因此此举明显针对的是新宪法。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新宪法尚未公布时，印度以“切断尼泊尔交通线”相要挟，阻拦新宪法通过；而新宪法一旦通过，这种要挟就兑现为对尼泊尔的“惩罚”。

其次，马德西人抗议活动的区域有限，集中在比甘吉（Birgunj）地区，并没有完全覆盖与印度接壤的地区，但两国之间的运输通道却几乎被完全切断。如果单是出于安全考虑，印度完全可以在没有被抗议活

印度控制尼泊尔一半以上的物品进口



动侵扰的区域——比如最西端的边界——开放运输路线，而不是不加选择地全面封锁。这种无差别的全面封锁更像是尼泊尔政府施压的手段，而不是出于安全考虑的无奈之策。

此外，印度认为抗议活动在尼泊尔境内进行，因此本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印度军警不可能出境执法，运输路线因此才被阻断。但尼泊尔方面指出，很多马德西人其实在边境的“两不管”地带进行抗议，除非印度方面配合，否则这种游移在边境线上的抗议很难对付。虽然尼、印两国签署了协议，印度有义务为货物过境提供便利，但这次事件中印度军警和抗议者的关系暧昧，并没有进行联合执法的意思。

“印式门罗主义”作祟

由于地缘政治赋予的压倒性优势，印度对周边小国早有“插手”内政的传统。最近发生的危机似曾相识——1989年印度对尼泊尔进行过经济封锁，令很多尼泊尔人至今忿忿不平。由于不满尼泊尔从中国购买军火，印度当时通过操纵尼印之间的贸易—过境协议，对尼泊尔进行了长达13个月的封锁。这使得尼泊尔的GDP增长从1988年的9.7%骤降到1989年的1.5%。在国内外双重挤压下，当时的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被迫引入君主立宪下的多党议会制。当尼泊尔新政府上台、同意印度的“友好”要求后，两国之间的交通线才恢复通畅。

将南亚视为后花园的印度，长期以来或直接或间接地践行“印式门罗主义”。在这种思维的引导下，中国作为“域外势力”往往被其视为区域内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之一。著名政论家古查兰·达斯曾评论称，“印度的国家利益在于不让友好的尼泊尔落入中国手中”。

然而，从这次封锁事件缘起、发酵、爆发，再到平息的过程来看，印度的做法可谓“适得其反”：不仅没能强化对加德满都的影响力，反而激起尼泊尔各界的反印情绪。

随着印度切断尼泊尔的物资供应，印度不仅物质上的存在感难以为继，心理上的影响力也日渐式微。近年来，为了对冲中国日渐强大的影响力，印度对尼泊尔采取了卓有成效的外交攻势，比如莫迪曾邀请尼泊尔领导人参加就职典礼、挑选宗教吉日出访尼泊尔、在大地震之后积极投入救援等。但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却因为封锁事件灰飞烟灭。在尼泊尔人眼中，莫迪曾是积极高效、务实合作的政坛明星；而今人们不再对其顶礼膜拜，甚至有人焚烧莫迪状的人偶以泄愤示威。

中国成为“心灵寄托”

虽然封锁事件本身与中国并无瓜葛，但中国在这场纷争中却扮演难以回避的角色。正如尼泊尔政坛老将拉马什·潘迪所言，“印度留下的真空必须有人来填补。由于印度带来了封锁，中国便成为尼泊尔的‘心灵寄托’。”

中国是尼泊尔除了印度以外唯一的邻国，因此尼国上至达官显贵，下至人力车夫都对中国寄予厚望，不仅希望从中国获取物资、燃料等实物，还希望中国能发挥更大影响力。与此同时，回避内政、尊重主权的中国与盛气凌人、热衷干涉的印度也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之中在尼泊尔积累了海量声望。

虽说封锁造成的客观影响使印度在尼泊尔形象尽毁，但中国似乎对这样的“战略机遇”并不感冒。中尼之间因为地震损毁的跨国通道很快将被打通，关键物资如涓涓细流输入尼泊尔，但中国并没有在此时针对



尼印争端发声。当印度各界都在讨论中国坐收渔利时，中国则表现得低调淡定，没有出现印度担心的“借题发挥”。对此，本港“亚洲时报在线”评论称：“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浑水摸鱼获利，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北京没有选择这么做。”

更让印度郁闷的是，被认为最亲印的柯伊拉腊在最近的选举中被倾向民族主义的尼共（联合马列）候选人奥利击败。联合组成奥利政府的三个党派都与中国有传统友谊，而亲印的尼泊尔国大党则从执政党变成了在野反对党，且在声势浩大的反印浪潮中地位尴尬。

不过，当危机尘埃落定，尼印关系将复位到新的常态中去，毕竟尼泊尔对于印度的脆弱依赖一时间难以改变。虽然中国有心有力，但是远水难解近渴。随着中尼铁路规划的推出，中尼过境基础设施的全面改善，今后两国联系只会越发紧密。毫无疑问，尼泊尔全面依赖印度的基本面正在悄悄起着变化，而当这种量变积累为质变，中尼印地缘关系才可能彻底重新洗牌。

↑ 2015年9月30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尼泊尔青年焚烧印度总理莫迪的假人，抗议印度政府的边境非正式封锁造成尼泊尔境内石油等必需品短缺。尼泊尔新宪法实施导致两国出现紧张局势。

俄牵头“四国情报联盟”刺探IS

四国情报中心能够汇总各方掌握的极端组织信息，有利于打击跨境恐怖活动；更重要的是，这将大大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软实力”。这绝不是美国所乐见的。

特约撰稿/雷炎

据美国《华盛顿时报》10月13日报道，有赖俄罗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组成的情报协作中心帮助，伊拉克安全部队已对境内的“伊斯兰国”(IS)目标进行了猛烈空袭。伊拉克议会国防和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哈基姆·阿尔·扎米里表示，该中心运作约一周，伊军方获得大量有关IS中高层指挥员的情报资料，对反恐行动大有裨益。

专家分析，四国情报中心能够汇总各方所掌握的极端组织信息，协调各方军事行动，将有利于打击跨境恐怖活动，更重要的是，如果该中心运作正常并成效显著，将大大提升俄罗斯在中东的“软实力”，而这绝不是美国所乐见的。

华盛顿逐渐失去影响力

俄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位于巴格达的情报中心由四国官员轮流领导，首先始于伊拉克官员，任期三个月。扎米里称，四个成员国国家分别有六名成员具体从事该中心的情报共享和安全合作，他们在巴格达戒备森严的“绿区”举行会议，那里曾是美国占领军的总部。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伊拉克官员透露，有两名俄军少将常驻巴格达，“我们觉得(情报中心)非常有用。”这位官员说，“我们希望将这种模式制度化，从而与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形成一个成熟的军事同盟。”

有传言称，上述四国未来可能在巴格达设立专门委员会，用于策划和协调打击IS的军事行动，指挥控制四方武装部队。

对于上述变化，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陆军上校史蒂夫·沃伦表示，无法确信伊拉克、伊朗和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他也坚称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才是打击IS最有效的国际机制。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厄内斯特则酸溜溜地说，美国主导的反恐联盟已在伊拉克进行了一年多的反恐行动，“我们相信这些协调和努力远比俄罗斯领导的单边联盟更为有效”。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不久前也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伊拉克所采取的积极进攻策略促使美国必须做出更加强硬的回应，“我们不能回避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举动，俄罗斯希望通过提高美国干预叙利亚局势的成本和风险来达到目的，我们有必要采取某些反击步骤来表明态度”。

事实上，继叙利亚之后，伊拉克也越来越依赖俄罗斯和伊朗来抵抗IS的威胁，这似乎意味着美国逐渐失去在中东重要产油国的影响力，这是华盛顿难以容忍的。

俄军技术情报手段突出

观察俄军事介入中东反恐之后，深受极端组织之害的叙利亚和伊拉

克明显在军事方面有了“主心骨”，连情报工作也变得主动起来。俄军事科学院院士谢尔盖·列奥尼多维奇·佩楚罗夫认为，俄罗斯向中东伙伴国提供情报支援方面颇有心得，尤其是技术情报手段更是独占鳌头，对四国联合反恐帮助甚大。

以叙利亚战场为例，俄空军投入的苏-24M、苏-34前线轰炸机乃至苏-25强击机都具备快速转为侦察用途的能力，这些固定翼机都能安装AFA-39或ASHFA航拍设备，同时还配备录音机，飞行员在侦察过程中可将自己见到的情景和感受用语言记录下来，使得侦察情报更具立体感。

俄空军的到来，使得叙军长期缺乏的夜间侦察难题得到改观。要知道IS分子经常在夜幕掩护下转移阵地，起初叙军飞机靠投掷照明弹来寻找和指示目标效果不彰，因为在山谷沟壑中，照明弹发出的光线在地面上形成太多阴影，机载航拍仪根本拍不下来。但参战的俄军机拥有更有效的红外摄像机，像可供苏-24M携带的“冬天牌”红外摄像仪可在夜间拍摄到清晰图像，如敌人汽车在山谷中行驶时留下的尾气红外线，它们在屏幕形成一条清晰的汽车行驶路线。该摄像仪还能拍下篝火灰烬，从而确定敌人曾出现过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俄军机全面普及无线电通信侦察系统(COMINT)，

像苏-34、苏-24M轰炸机和米-24直升机通过SRS-13、SRS-9侦察设备，能够及时捕捉到IS的无线电信号，并能确定其地理位置。俄专家分析称，随着俄军介入叙利亚战事的程度加深，不排除俄军著名的“撞锤”地面无线电监听系统也将投入前线——该装置能安装在MTLB-U履带式装甲车上，可以捕捉UKV频段的无线电信号，而迄今IS武装分子的无线电通话大部分集中在这一频段。

另外，由于叙利亚战场的复杂性，特别是美俄战机交叉出入叙领空，俄军还要把大量技术情报资源投放到对美侦察上，避免“擦枪走火”。俄军长期在拉尔图斯、大马士革等地部署有无线电截收站，目前外界只知道它们的代号为“杰作”。早在冷战时期，苏联设在叙利亚的“杰作-1”信号截收站就准确获取了美国第六舰队及以色列国防军在东地中海的活动情况，甚至窃听到时任国务卿基辛格在埃及、以色列之间穿梭访问时在专机上同白宫的谈话。显然，这些资源会一如既往地用在美国身上。

最佳“人工情报”来自伊朗

除了航空航天侦察照片和信号侦察设备外，俄罗斯当然清楚，要想打败极端组织，最有价值的情报还是来自于本地区的“人工情报”（HUMINT）。就巴格达情报中心的构成而言，俄罗斯迫切希望其他三国在“人工情报”方面提供帮助。

专家分析，叙利亚情报机关完全是苏联时期一手组建起来的，像负责内卫的政治安全局形同俄联邦安全局翻版，而属于军方的军事情报局则在组织结构等方面完全模仿俄总参情报总局（格鲁乌）。今年4月过世的叙政治安全局长贾扎利，就是在俄



罗斯接受过专门谍报与反谍报工作训练的高级官员。

伊拉克的情报系统则较为特殊，隶属国防部的正规军，却至今缺乏正常的情报侦察监视机构，倒是隶属内政部的警察部队存在有限的人工情报网，它主要依托什叶派民兵和库尔德武装菲什梅加的帮助，主要任务是打击非法武装和恐怖活动、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但伊拉克的情报系统受美国影响甚大，至今仍有大量美国顾问在其情报部门工作，因此俄罗斯方面对其也很难完全信任。

俄军事专家帕维尔·费尔根豪尔认为，参与协调中心的俄罗斯军人必须有一颗冷静、细致的头脑，要在多渠道获取的情报中去伪存真，分析出敌人真正的意图，为此他们必须学会与中东多国情报同行和睦相处，并掌握当地人细腻的处世之道，“这样对方才可能在闲聊中讲出一些更深入的问题，例如冲突地区目前的态势、地方势力首领之间的关系、人员数量等”。

相比而言，俄罗斯所能依赖的最佳“人工情报”来源非伊朗莫属，该

国革命卫队“圣城旅”拥有本地区数一数二的谍报网。据美国资深记者西摩·赫什介绍，圣城旅的主要任务是在伊朗境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并为亲伊朗组织提供训练、装备以及经济支援。

此前据一位前美国陆军情报官透露，圣城旅同遍布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激进组织都有联系，该组织根据地缘政治的不同，划分为8个任务区，分别为西方国家、伊拉克、南亚次大陆、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土耳其、北非、阿拉伯半岛和独联体分区。

其中，“黎巴嫩-以色列-叙利亚”分区以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贝卡谷地和叙利亚本土为大本营，建立了规模惊人的“线人”谍报组织，目前该分部成员正忙于援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曾多次报道，阿萨德身边有不少圣城旅的顾问协助作战。在伊拉克分区，圣城旅在2003年萨达姆倒台后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在伊拉克内部扶植起强大的亲伊朗政治军事势力，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隐形财产。

↑ 2015年10月7日，在俄罗斯空袭的帮助下，叙政府军在哈马省Morek镇的攻击显著提升。

□ 编辑 漆菲 □ 美编 虎妹

摩托车驰骋的草场

驾驶割草机打草，或者乘着皮卡车和摩托奔驰的牧民，无从真正赶上外界的急速变化，却在草场上留下了过深的辙痕。

记者/袁凌





🔥 草原上很难看到骑马, 如今赶羊放牧都是骑摩托车。

宝安家的草场是一条平缓起伏的小山谷，处在几户邻舍的草场最里面。这是科尔沁草原乌兰毛都苏木（乡）的大体地貌，牧民的草场顺着川道和两侧小山谷延展收束。

割草季节刚刚过去，羊群在变浅了的草场上缓慢移动，啃噬尚存的青色。当它们游荡到山口遍布干草堆的过冬草场，宝安的爸爸格日乐图就骑上一辆摩托，在草皮上驱驰而去，受惊的羊群收起边角，像扯动的羊毛围巾向深处移动，却不能越过山顶的铁丝网栏。

羊群比附近牧民家的小，大部分还不是自家的。多年前格日乐图遭遇的一场车祸，和前年宝安的患病，让这户牧人的光景落在了全嘎查（大队）的后头，屋旁的割草机和小四轮都生了锈，电视也是人脸大小的一个。

比机械更破敝的，是接羔房院墙上随意弃置的一副马鞍，皮革剥落开裂，坐垫翻卷起毛，显露长年风霜剥蚀的痕迹。草场上寻常望不到马的踪迹，更少见到骑马奔驰的牧人。

告别了“马背民族”的历史剪影，行动迟缓、其貌不扬的羊群是牧人的性命所系。铁丝网限定了他们的生活边界，连续两年低迷的羊价，则是这片方圆几百公里的草原上牧民的共同心病。驾驶割草机打草，或者乘着皮卡车和摩托奔驰的他们，无从真正赶上外界的急速变化，却在草场上留下了过深的辙痕。

吃奶的劲儿

九月初，打草季节收尾，两个住在苏木上的人开车下来收“破羊”（生病的羊），几十元一只，不够好羊价格的1/10。宝安家的羊群被赶进了羊圈，察验之下没有一只“破

羊”。这和全家人的身体恰成对照。

格日乐图蹬着摩托车的一条腿是假的。十七年前的那场车祸后，他在干重活方面从此逊色于寻常的蒙古汉子，打草和堆草都要雇人。过万的费用使他只能拖着咣啷作响的破旧义肢，等待政府五年一度的免费更换。宝安五岁时的一场鼻窦炎，为这个家再次加上一笔重负，手术花去了2万多元费用，十年前这笔费用只能自家完全承担。但这不过是前奏。

去年夏天宝安没有迹象地突发头疼，宝安长期患中耳炎，因为嘎查草场上没有诊所，到乌兰毛都苏木看病有四十公里路程，长期没有治疗，脓液滴进了大脑，导致脑炎。家里的三百多只羊低价卖去了一半，堪堪凑齐手术费用，另外十几万元来自于五伯的帮助和抬钱（民间高利贷——编者注）付息。幸好这时有新农合政策，以及乡村儿童大病医保组织的帮助，报销了过半医药费，但自家仍然总共花去十余万元，大部分是借账，其中一部分需付二分的月息。

2014年的冬天，是这个四口之家最难熬的季节。由于科尔沁右前旗和兴安盟的医疗水平有限，父母带着宝安多次去长春看病，家里只靠念大学放假回来的长子看羊，过冬的草料没打够，开春还飘着雪粒时就吃尽了，羊群不得不四处寻觅枯草下面冒出的新芽。邻居家的草场却开放了过冬剩余的干草堆，供羊群随意享用。债台高压在一家人头上，收入只够偿还利息。

人和羊群终究熬过了漫长的冬天。宝安开始骑自行车练习康复时，新的羊羔也在摇摇晃晃跟着母亲学步了。抱起一只落伍的羊羔，把手指伸进它尚未长牙的嘴里，你会知道什么叫做吃奶的力气，似乎要把手指吮断。这和少年宝安骑着自行车一再从草坡上冲下去，以及父亲带着一只假腿去

抽水赶羊的力气，是同一种。

羊群缩水之后恢复缓慢，买羊羔一只要五六百元，自家接的羔长到半大也要卖掉还钱，割草季节之前卖了一批，开学之后第一次回家，宝安看到自家的羊群由300多只减到了200只左右。这与别家相比远为逊色。

开春山口外边享用“盛宴”的羊群，是宝安二伯家堂哥的。他家草场的面积比宝安家略小，羊群和牛群的数量却多不少，每





↑ 永志家除了自家有千多亩草场，还另外承包了2000多亩。他家请了一个打草工人一起干活，每天支付150元给工人。

年卖掉的牛就有20多头。

假期到宝安家来玩耍的同学新力，家在山谷的另一边，翻山过去半个小时能走到。他家眼下有500多只羊，30多头牛，一辆皮卡车。新力学牛叫的声音可以乱真，很难相信这是出自人的声带。

对面山谷中的一户牧人，拥有上千只羊，宝安家需付利息的借债都来自这家，他家更显赫的是一辆丰田霸道，常常疾速从山

坡上开下来，在草场上闪着镍合金的光泽。

岁岁枯荣的青草和安宁的羊群背后，是庞大的投资。宝安家深山和浅山两口子畜饮水的井，分别为90米和80米深，掘井加上管子、铁制水槽的费用一共要4万多元。山里的掘井费用一直欠着。散落在住房周围的割草、耙草机械以及柴油机、小四轮和摩托车，都是大笔的开销，连分隔自家和邻居草场的铁丝围栏，仅铁丝就花费了2万多元。

接羔房是5年前起的，8万元的费用政府补贴了一半，自家住的水泥平房则花费更多，政府也补助了一部分危房改造费用。接羔房附近，以前全家住的石头地窝子倾斜下陷，荒草遮没了窗内的旧日陈设。新房顶上带着三个烟囱，一旁安着太阳能电池板，风车呜呜转动，带来了照明和电视的动力。

9月4日这天，苏木政府派人来免费安装新的太阳能、风能两用发电设施。第二个



↑ 宝安一家4口人，爸爸十多年前因车祸落下残疾，妈妈有心脏病，自己也在两年前患有脑膜炎，“完好”的哥哥在乌兰浩特读大学。

造型更漂亮、效率更高的风车，在草场上空呼呼转动起来，似乎这里的时光停滞了一段，眼下又加快启动了。

羊倌的利害

宝安家草场上的羊群，大部分并不全是自家的，耳朵和脖子下染的不同颜色的漆，标明了各自的归属。

眼下宝安家代养了别人的400只羊，从5月代养到进圈的10月，每只羊可得90元。风险在于死羊或者走失：前年代养300只羊，死去4只，只好让人拿走自家的四只母羊。

宝安大伯家堂哥的羊群，在宝安家草场的上方游曳，时而消失，到了山谷的另一边。

和宝安家不同，他放牧的全是公羊，共有300多只。公羊在圈养季节之前不能和母羊混放，以便集中产仔接羔。每家留下用于

配种的公羊数目都不多，堂哥放牧的是这一带好多家的，比母羊金贵得多，死去或走失一只要赔六七千元。代养公羊的报酬也比母羊高一倍多，达到200元一只。宝安家的因为是亲戚，堂哥免费。

这些托人代养的人家，自家未必有草场。宝安家代养的羊群就属于嘎查一家有羊圈没草场的人户，没有草场的原因是兄弟多不够分。全嘎查798口人，面积总共80来平方公里，每个人平均的草场面积并不大。

宝安爷爷奶奶一辈，山谷内外的草场原来属于一家。格日乐图有六弟兄两姊妹，排行最小的格日乐图成家后在开小商店。兄弟分家的时候，草场分为四块，格日乐图分到的比兄弟们略多几十亩，“照顾我的腿”。眼下六兄弟之中，只有三个还在世。大哥在二十余年前驾马车出事身亡，二哥和四哥分别死于食道癌和高血压。三哥的草场承包给了别人，五哥是电工，住在苏木镇子

上，兄弟中眼下在放羊的只有格日乐图，大哥和二哥家的草场传到了下一代。2015年9月5日测量员来嘎查进行新一轮草场划界测量，颁发新的草原证，格日乐图骑摩托车带着测量员奔波了半天。

宝安家免费给五伯家长年代养七八头牛。在镇子上做电工的五伯，自己想要养几头牛赚点钱，却没有分到草场。他家的独生女每年会到宝安家来玩两次，站在草场上兴致勃勃地问叔叔格日乐图“我家的牛好看吧”。

代养之外，承包草场是另一种选择。收“破羊”的人走的那天晚上，格日乐图和妻子天亮认真地衡量了利弊。承包是连同别家的羊和草场一起，每只羊每年付给主人200元租金，接下的羔归自己。一只羔羊卖350元左右。如果下羔率高，200只母羊下到160只羔羊往上，才会有赚头。看起来这不如代养划算，但自家的草场有限，想要扩大



↑ 900多亩草原，只有自己一家人，父亲干活，母亲做家务，宝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待着自娱自乐。

羊群，承包也是一种路数。

家住川道的永志，是这一带的牧人大户，自家有700多只羊、20来匹马，还承包了别家的3000亩草场连带200多只羊。由于草场面积太大，别家的草场割完之后，他还带着雇工在承包的草场上割草。

这个雇工是个汉族小伙子，住在乌兰毛都镇上，家里有30亩地。今年秋收后，他已出门到牧区干了十天割草的活，每天150元。去年他在牧区干了一个月，和一个有车与割草机的朋友合伙，承包一片草场的收割，挣了4000来元。

汉族人给牧民打工，是这里的常事，除了打草季节的短工，更长期的是当羊倌。眼下的羊倌工价不低，夫妻二人一年包吃住之外，主家净付6万元工资。单身放牧的行情则是月薪3000元。柯右前旗古迹村的一对夫妇，去年就做了乌兰毛都牧民的羊倌。

但对于多数农区人来说，当羊倌并不

是一件有吸引力的活，原因是辛苦，顶风冒雪不说，接羔和打草季节的劳累，不是轻易能捱下来的。另外难免有寄人篱下之感。放牧的风气在农区仍然兴盛，他们更愿意选择的，是几家一起合资包下牧民的一片草场，养自家的羊。

柯右前旗巴拉格歹乡中胜屯小学生龚旭阳的爸爸，在离家200公里的阿尔山牧区承包了上万亩草场，和另外两个人一起放牧了1100多只羊，每年4月份动身，到10月份包卡车运载羊群回来，来年开春再去，住在侵华日军留下的炮楼废墟里，这样已经三年。龚旭阳的同学当中，还有不少是这样的情形。

在柯右前旗，牧民的经济情形普遍好于农民，出外打工的人很少。农民却几乎必需打工贴补家用。但永志的雇工并不羡慕牧人。“农民比较好，有忙有闲。牧民一到了接羔和割草季节，雇人都忙不过来。”草

场的投资大，一旦亏损就债台高筑。

此外，草场比农田更仰赖气候，乌兰毛都的牧民都知道，今年呼伦贝尔的草不好，他们这里的雨水较为充足，但明年老天偏向谁，没人能够预知。

不敢骑马的蒙古少年

永志和雇工搭伴操作一台新式割草机，霍霍地掠过齐膝深的草地。被斩断的青草散发出新鲜的气味，草地上留下了依稀辙痕。一天下来，这台机器可以收割一百亩草场。

宝安和哥哥六岁时就学会了开割草机，坐在后座上协助抬起铡刀，避免地上的石头伤铡齿。除了赶羊，绝大部分和草有关的人力都被机械取代。草场之间的川道以至牧区公路上，不时有巨大的机器隆隆驶过，使人疑心是边防的装甲辎重。川道上和通向各家牧民的小路，深浅不一地留着碾压的辙痕，一到下雨几乎无法通行。草场上也有纵横的小四轮的辙痕。

无法使用机械的地方，人手也变得潦草。收割后的草场上，伫立着大片墨绿的青储林，是密植不结实的玉米，用作牛羊过冬的青饲料。宝安二堂哥的青储林旁边有一口近两米深院坝大小的青储窖，以前是用来储藏青储的地方，需要把入窖的青储罩上塑料薄膜，再覆盖泥土，可以一个冬天不变色，让牛羊在年底吃到青色多水分的饲料。但眼下这口窖已经废弃，对待青储的办法简化为砍倒后就地堆放，变为干储，任牛羊入冬后啃噬，“毕竟水分还是多”。传统方法的废弃，原因是耗费人力。

即使赶羊，通常也是骑着摩托车。宝安的方法更简单，在住屋附近放一只过年剩下的“二踢脚”，受惊的羊群立刻向深山奔跑。

骑马在草场上赶羊的情形，已难得一



见。家里有不少马匹的永志，骑马也更多是一种喜好，他曾经骑快马参加过兴安盟的那达慕大会比赛。养马是复杂的事，若非外地有市场需求，在铁丝网圈住的草原上已无实际用处。

宝安家有四匹马，但没有人骑。父亲截肢之后，骑马成了至今放不下的念想，却无力尝试。眼下他把家里的一匹小马送给别人驯，希望未来可以再上马背。唯一能骑马的哥哥远在赤峰上大学。

宝安小时候常被哥哥带着骑马。小学三年级时他学了骑马舞，还在乌兰浩特的全盟比赛中得了第四名。但当他自己学上马

时，连续被马踢了两次，从此心生畏惧。近年来的脑炎导致身体半边不灵活，更使他放弃了这个念头。在骑手永志家的草场上，外来者面对没有配鞍的马跃跃欲试，宝安却躲避着马匹，自顾听着手机歌曲。

骑着单车驰骋草场成了他最爱的事情，也让来家玩耍的同学新力痴迷。

单车之外，宝安的注意力更多在手机屏幕上，他的QQ空间里储藏各种心仪的美女照片，大部分是网友。其中一位，还是他在长春治病期间认识的当地病友的女儿。

尽管宝安最爱哼的歌来自本民族歌手乌云高娃，他喜欢的网友照片却是清一色的

美图秀秀修饰出来的锥子脸和美瞳，和大城市的少年没有区别。

相比自小的母语蒙语，宝安更喜欢汉语，在网上也更多是和汉族网友聊天。连他的名字也不再是典型的蒙文，派出所把他和哥哥姓名中的一个“包”字讹为汉字的“宝”，没有上过学的父亲将错就错，宝安自己更喜欢这个“宝”字。

喜欢汉语，是牧区和农区蒙古族孩子共同的特征，眼下全内蒙古仅存的一个蒙语村级教学点的老师白玉平解释，无所不在的电视和手机节目，是孩子们更习惯汉语的原因，蒙语学习课程更多是出于高考时的



↑ 9月4日，政府给宝安家免费安装新的太阳能、风能两用发电设施。除夕夜为确保春节联欢晚会时不停电、轮换着在外面搅动风能发电机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

敖包上牵拉着缀有彩色经文的丝带，每一片丝帛上都印着一匹奔驰的马。但放眼山下不见马匹，只停靠着一圈人们前来时驾驶的皮卡和摩托车。

照顾政策。

寂静的敖包

即使是在宝安的父亲格日乐图身上，也看不到祖辈穿着蒙古服的草原汉子形象。全家人的蒙古服藏在衣橱里，只有到敖包聚会敬神或者大的节日才穿，衣服的质量也不是很好。而在平常出门会客的场合，格日乐图更想有一套西装，这曾经是他多年的念想，“和母亲一争嘴，爸爸就会说，他连一套西装都没有”。

直到去年在长春复查期间，母亲终于带着宝安，在一家购物商场给在家看羊的爸爸买了一套西服。在宝安的记忆中，这套特而雅牌子标明产自福建石狮的西服价值2000元，实际是商贩标榜的原价，妈妈说实际花了300来块。夏天的时候，爸爸穿上这套西服出门，参加了别家学生考上大学的喜宴坐席，此后一直珍重地挂在衣橱里，再未舍得上身。

宝安脚上的运动鞋来自于网购，是到城郊的四姨家探亲时购买的。宝安还教会了父亲和母亲用微信，电视上播出阅兵画面时，这个蒙古家庭的三口人都坐在炕上低头看手机微信，上面有宝安哥哥发来的信息。

身在赤峰的哥哥很少回来。学会会计的他直率地对父亲表示，毕业后不会考虑回家，要在外面找工作。在大学谈的汉族女朋友，更让他坚定了这一想法。对于宝安来说，前景还比较复杂。爸爸的态度是，考不上大学就回来，“给我看羊”。

宝安自己不像哥哥那样坚决。但小时候喜欢画画的他，最向往的是成为“画家”，“随便画一个图，按图样盖房子，就赚好几万。”这样的房子，不可能建在草场上。他也向往电视上选秀节目中背着吉他弹唱的

歌手。国庆放假期间，他只是偶尔到山坡转转，更多时间耗在微信上，“无聊”成为他最经常发送的表情。

宝安心仪的小学班花考到了乌兰浩特的重点中学，这给成绩差了十几分的他留下了遗憾。在他的同学中，还有不少这样考去远处的重点中学的，包括亲戚家的几个女孩，她们往往比男生更用功。“小学女生多男生少，到了初一，班上48个学生只有14个女生，别的都考到好的学校去了。”

永志说，这里考不上大学的女生没几个，考上大学之后，她们一般会在包头、呼和浩特寻找工作，回来的也没几个。

尽管宝安的妈妈，牧民找媳妇成家并不难，但现实是草原上绝少看到年轻姑娘。24岁的永志相貌、家底都不错，但至今没有合适的对象，而这在草原已属大龄。更多的时间，他只能一个人骑在骏马上，没有带着女伴驰骋的机会。

在宝安家的后山上，越过分割草场的铁丝网，有一处自家建的敖包，起因是家里一再不顺，希望改善一下风水。宝安把主持修造敖包的喇嘛叫做“算命先生”，这位蒙古僧人四年前已经去世。

每年春天，宝安会和父母一起，带着白酒和糖前去，在敖包前杀羊，把糖粒撒在敖包的石块上，祈佑人和牛羊平安。永志家的山上有更大的一座敖包，每年5月29日，远近的人会聚集，主家宰羊，旁人奠酒、撒糖、浇奶，围绕敖包绕圈敬拜祈福，随后聚餐。

敖包上牵拉着缀有彩色经文的丝带，每一片丝帛上都印着一匹奔驰的马。但放眼山下不见马匹，只停靠着一圈人们前来时驾驶的皮卡和摩托车。

在宁静的夏夜，涂上了一层微光的敖包旁边，也没有骑手与恋人相会的身影。

□ 编辑 崔世海 □ 摄影 赵俊霞 □ 美编 虎妹

F EATURE
特别报道 |

联合国70年： 中国角色之变

记者 / 王衍 (发自纽约联合国总部)





Strong
UN.
Better
World.



位于纽约曼哈顿东河畔42街至46街的联合国总部大厦，应该是世界上每天升降国旗耗时最久的地方——随着太阳东升西落，193面各国国旗依次在大厦门口被升起落下。这样日复一日的一幕，至今在此上演了整整70年。

今年9月适逢联合国举办70周年系列峰会，《凤凰周刊》记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经过近一个月的观察，深入了解这栋38层的大厦，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真实存在。

在联合国总部的三个存在

与上世纪70年代“参与不投票”的沉默角色不同，如今的中国已然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重要力量。平日里，联合国及其周边会有三个明显的标志，或可诠释中国的独特存在状态。

一个外围的标志是，络绎不绝的中国游客早就成为联合国大楼门口最为常见的风景，只要穿过门口熙熙攘攘的人群，就能听到熟悉的各地方言。

穿过层层安保进入大厦后，坐电梯来到28和29层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称“经社部”），就能感知到中国的另一个存在——这里是中国面孔最多、地位

最高的地方。

在庞大的联合国机构中，经社部作为最为重要六大支柱部门之一，负责协助世界各国实现其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自2007年开始，管理该部门的人首次由来自中国的外交官担任。2012年前中国驻德大使吴红波接任沙祖康，成为来自中国的第8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样的人事易位意味着中国在联合国越来越靠近实权地位。

“因为中国发展得好嘛，所以就让中国外交官来管经社部，”原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2013年在北京举办的一次小型演讲中透露。这个显著变化来自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大力支持，作为中国支持他的“回报”。

第三个标志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实习生出现在联合国。此次联合国70周年系列峰会的外围，随处可见来自中国的年轻面孔，他们多数担任会议服务人员。当《凤凰周刊》记者问起哪个部门的中国实习生最多时被告知，“哪个部门都很多吧！”

随着经济腾飞，中国无形中被赋予很高期待。其中之一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今年联大会议上讲到的——联合国的挑战是在进行人道主义援助时的资金不足。

9月举办的峰会上，中国宣布了一系列支持联合国的措施：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的无偿军事援助，并免除了一系列国家的债务。对此，潘基文还向习近平当面致谢。

但这显然满足不了联合国的胃口。10月上旬，联合国会费委员会传出消息，拟将中国2016-2018年的联合国会费大幅增加，分摊比例可能从现在的5.148%上升到7.92%，从第6位上升至第3位。中国方面立即反对。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称，反对任何在经常预算比额方面把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的做法，不会接受超出中国支付能力的计算方法。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近几年来联合国内部时常出现渴望中国增加会费的声音。”一位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中国外交官对《凤凰周刊》记者私下透露，“大家明明知道，中国虽然综合国力强大了，但人均水平还远远在发达国家之后。但这就是联合国啊，如此现实的国际平台。”

维和分量越来越重

除了资金，中国今年在联合国舞台上的

来自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自中国1972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来，有8位中国外交官先后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分别是唐明照（1972年-1979年）、毕季龙（1979年-1985年）、谢启美（1985年-1991年）、冀朝铸（1991年-1995年）、金永健（1996年-2001年）、



陈健

◆第6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

◆2001年至2007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要负责会议事务。其外交风格为“身段柔软、意志坚定”。



沙祖康

◆第7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

◆2007年至2012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被誉为中国第一位有实权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其外交风格直接强硬，人称“沙将军”、“铁嘴”等。



吴红波

◆第8任
联合国副秘书长

◆2012年至今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主要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其外交经验丰富、职业素养高、为人和善。

另一个历史性转变，莫过于增派维和部队人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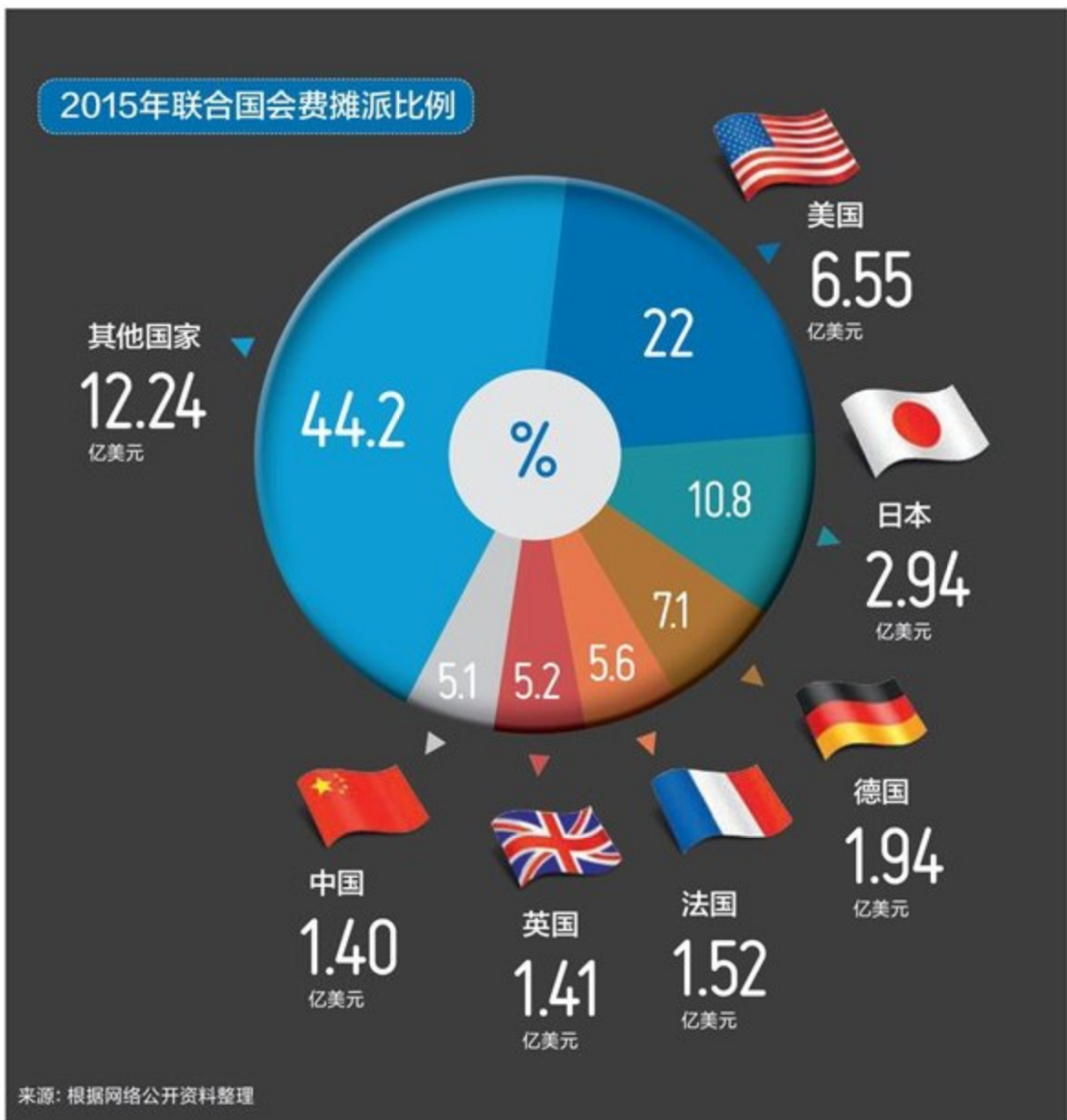
9月末，中国宣布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这样的规模无疑突破以往：按照中国官方资料显示，目前有3100多名维和人员在世界各地为和平值守；而这也是官方首次高调宣布中国参与维和的性质转变。

“中国此次的转变令人兴奋，我们确实需要增加维和的战斗能力。”联合国维和任务部负责公共事务的首席执行官尼克·比恩巴克（Nick Birnback）告诉《凤凰周刊》，

“在我的印象里，中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维和任务，当时派的主要是工程师，他们到了现场也不太与人交流，而是低头做自己的事。现在不同了，中国不仅派出了战斗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也变得更加活跃。”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9月在大陆官方媒体上称，“自1989年以来，中国派出3万余人次参加了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梳理中国参与维和的历史不难发现，此前中国在维和人员的派遣上主要集中在工兵部队、医疗部队等非战斗部队。微妙的变化逐步发生：从向东帝汶派出维和民事警察，到派出成建制警察分队参加海地维和，再到派遣成建制安全部队参与马里维和，以及最近派遣战斗部队去南苏丹维和。

某种意义上看，中国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的行动，也被外界视为中国外交的试金石。原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参与维和，打破了毛时代‘不向海外派遣一兵一卒’的外交政策。”而在2014年中国维和步兵营首次走出国门，更被外界视为





中国参与 维和行动 一览

1988.9

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1989

中国首次派人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

1992.4

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

2003.4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部队包括工兵连和医疗队。

2003.11

中国赴利比亚维和。部队由运输分队、医疗分队、工程兵大队组成。



← 2014年9月24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现场。

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突破。当时据《外交政策》杂志披露，这些皆是中国主动的意愿。

尼克认为，在目前联合国16个维和区域中，中国对南苏丹最感兴趣，“因为那里有中国的利益”。据悉，目前中国从南苏丹进口的石油占其海外进口石油总量的5%。因此也有声音质疑中国是去维护其自身利益的，而不是维护当地和平。

在记者问及联合国如何进行维和任务分配时，尼克并不避讳，“我们不排除考虑到中国（派维和部队）去南苏丹的诉求，同时也会对其他地区有所兼顾，如果某个地区的维和人员已经足够，联合国也有权对申请国说‘不’。最终会有一个平衡的结果。”

谈到各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平等性问题时，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李东燕曾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维和行动的每一个参与方都是各国精锐部队，但往往是发达国家出资多、派出的人少，发展中国家派出的人多，因而在战场上牺牲的也多。”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尼克回应说，“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拥有最先进而强大的部队，因而他们派遣的往往是最高指挥官等少数高职位的维和人员，而发展中国家派出的则是具体作战的部队。”

9月末，联合国罕见举办了由50多个国家领导人参与的“维和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到，作为联合国维和行

动的主要出兵国，有18位中国军人和警察在维和行动中牺牲。这番话也让在场的其他国家元首不胜唏嘘。

弃权票背后的大国博弈

一项事关全球问题的决议是否重要，要看它从联合国庞大组织机构中的哪个部门产生。像维和任务这样重要的事务，就来自于绝对的“中枢神经”——安理会。

相比其他没有强制力的领域和机构，联合国安理会是所有国家紧盯的平台。安理会会场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路过的人都会对它所代表的分量肃然起敬——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所称的“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及侵略行为”的安理会决议具有强制性。

如何处理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关系，是历任联合国秘书长最为“头疼”的工作之一。

“潘基文必须非常小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Stéphane Dujarric）笑着向《凤凰周刊》记者说，作为联合国的五大主要建立国，每个国家都会在关键时刻提醒联合国秘书长应负的职责。要知道，第六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就是因为没有处理好大国关系而没有获得连任。

“我们时常开玩笑说，联合国秘书长有时候更多是‘秘书’，而不是‘长’。”

作为1945年在《联合国宪章》上第一个签字的国家，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像联合国总部大厦内标志性的长城挂毯一样醒

2004.10

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员赴海地维和。这是中国首次派成建制的防暴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5.10

中国维和部队赴苏丹。部队有工兵分队、运输分队和医疗分队。

2006.3

中国维和工兵营开赴黎巴嫩。这是中国首次向中东地区派出维和部队。

2013

中国派出工兵、警卫、医疗3支分队赴西非马里执行维和任务。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安全部队。

2014

中国维和部队开赴南苏丹。这是中国首次派出建制步兵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目。9月末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习近平刚说完“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票永远代表发展中国家”这句话，立刻获得了台下一片掌声。这不仅因为中国是“被非洲兄弟抬进联合国”的，也是因为这个平台上多个国家利益交锋的现实。

“尽管在现代国际体系中，中国不曾像其他四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那样占据绝对的重要性位置，但也肯定不是‘二等公民’。如今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安理会的决议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来自俄罗斯的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高级官员尼古拉·盖尔金（Nikola Galkin）告诉《凤凰周刊》。

否决票是中国参与联合国国际事务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杀手锏，这张牌所牵连的国际利益残酷而微妙。梳理中国在历史上所投的反对票，多数与俄罗斯立场一致。

“尤其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问题上，中国态度倾向于俄罗斯，其投票或弃权都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尼古拉说。

而中国的弃权票，也往往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冲突纠缠在一起。据陈健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老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安理会谈判桌上的气氛异常紧张。中国手里的这张票把当时的中美关系推向了喉咙眼。

“那会儿中国还受着美国的经济制裁，关系很紧张；但最后中国仍投了弃权票，给美国开了绿灯。随后美国马上邀请中国领导人访问华盛顿，中美关系破冰。”

如此这般重要的权力，自然是各国眼中的肥肉。巴西、德国、日本、印度因此组成“四国集团”，多年来一直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扩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今年

**某种意义上看，
中国不断扩大参与联合国
维和的行动，也被外界视为
中国外交的试金石。**

→ 2015年4月7日，中国首支维和步兵营后续分队的130名官兵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启程，前往南苏丹。

↓ 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在华盛顿发表《联合国共同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

联合国70周年的系列峰会上，上述四国国家元首再次重申了此诉求。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不想让自己在安理会的权力被其他国家稀释，另一方面最在意的当然是日本。”北京语言大学联合国研究中心主任李铁成告诉《凤凰周刊》，多年来中国在日本“入常”问题上态度鲜明。2005年安南时代对联合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时，扩大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方案差一点在一次审议后被通过，“当时有近2/3的国家通过了投票，关键时刻中国开始一一做工作，甚至准备动用手中的一票否决权。好在最终（改革）没有进行。”

再激烈的冲突也是平常事

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遭遇的博弈，还远不止这些。“只要涉及到台湾问题，中国一定是跳脚的。”尼古拉回忆说。据悉，中国自1993年以来多次挫败台湾当局收买少数国家向联大提交的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提案，以此维护了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严肃性。

人权问题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在联合国“斗得最狠的”。据李铁成回忆，“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上，关于中国的人权议题每年都会被提出要不要讨论，这时中国都会努力地在法律程序上把这个动议打掉。因此迄今为止，从未有过真正的讨论。”

不过，再激烈的冲突在联合国这个舞台上都是平常事。“各国代表会为了一个议题没日没夜地辩论。很多问题，每个国家站在自己的角度会有不同看法。”经社部政策协调部部长约普·突尼森（Joop Theunissen）谈及此处满脸苦笑。他告诉《凤凰周刊》，一旦出现争议，自己和部门同事们就需要通宵达旦地“陪同”各国代表进行谈判。

“70年代以来，鉴于资源缺乏，中国





选择了务实的姿态加入了当今国际体系。”不久前，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在媒体上称，“中国对经济体系从整体上说还是满意的；至于安全体系从来就没有满意过，中国也在寻求对此做出修改。”

这也多少反映在二战后的联合国舞台上。沙祖康曾公开指责“联合国重安全轻发展”，而这种意见近二十年来在中方的外交态度中十分常见。

对此，陈健和吴红波并不赞同。他们提到，随着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也接受了来自联合国的发展援助。“从2000年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到今年设立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在发展问题上还是下了很大力气的，只是在舆论的呈现上，发展问题不像安理会的决议那样显眼。”

自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至今，多



位国家领导人都在联合国舞台上呼吁过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变与调整。1974年，邓小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呼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0年和2009年，江泽民和胡锦涛分别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和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今年9月，习近平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立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树立共同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

为了储存成千上万的会议要点，联合国的图书馆每年都会如期出版《联合国年鉴》。在这本厚重的书籍内，上述所有关于“中国”的点滴都会记录在案。若干年后，再打开这本年鉴时，或许能回忆起中国参与构建国际秩序之路。

世界可持续发展与中国角色

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

记者/王衍

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的办公室坐落在联合国大厦总部29层，从窗户向外眺望，可鸟瞰曼哈顿东河美景。不过办公室内最抢眼的，还是一位画家朋友送的熊猫图，精致典雅。

中国人眼中，吴红波被视作联合国内最高级别的国内代表；但作为联合国的职业外交官，他自2012年上任之始起，须立誓只服务于联合国而非其他任何国家。这样看似矛盾的身份，实则是对职业素养的考验。

在任三年多来，吴红波一直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联合国成立70周年之际，其牵头制定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成为联合国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站在全球立场上，未来70亿人口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就此问题，在联合国最为忙碌的9月末，吴红波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长达一小时的专访。

落实联合国成果是关键

记者：您所带领的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工作也有辞旧迎新的转折，15年前设立的“千年发展目标”结束，未来15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开启。我们注意到，相比前者，后者制定的目标更为详细，这是为什么？

吴红波：2000年首脑会议的时候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只有8项，而我们刚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需要完成的目标是17大项、169小项。

首先从参与制定这个目标的范围来说，前者制定时是一批专家闭门准备的，最后再由千年首脑会议讨论通过。而这次花了三年的时间，从2012年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开始，国际社会包括所

有的193个联合国成员国都参与了。可以想象，众口难调，这么多国家都来，而且各国的重点不一样，因此我们这次目标比上一次多一些。

更重要的原因，是两者有着重大区别，可持续发展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个是经济要发展，第二个社会要进步，第三个就是环境要得到保护。因此这三个议题必须有更多的指标，才能够体现出来，获得恰当体现可持续发展三个关键。

记者：相比十五年前，如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按照现在的国际形势，要完成2030年的目标，主要有哪些困难？

吴红波：现在的国际形势，首先是地区动荡和冲突还比较多，造成难民潮；另外贫困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很多国家不平等现象在加剧；第三，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老路已经被证明是一条危险道路。接下来怎么走，对人类社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非常欣慰的是，这么多国家通过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表明了国际社会在今后的发展方向上取得了一个共识——可持续发展，这来之不易。能不能够实现，这涉及到全球70亿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根据之前“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很需要重视的是落实。第一是各国决策者能否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意识到了“可持续”三个字的真正含义，这一疑问直接关系到各国落实的程度；第二，各国政府和机构需要调整或者改革行政管理架构和运行方式，打破条块分割、加强横向沟通、做好统筹协调。因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比如，水问题、卫生防治问题等；第三，在“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目标中，各国需要按照本国国情就相关的目标进行立法，增加落实力度；第四，能否最大程度地调动各国政府、议会、审计机关、企业、民间组织的力量和各类社会资源，完成落实和监督问题；第五，如何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培训，特别是在数据统计方面的能力建设培训，以完成跟进和审查工作。

记者：克服这些困难有哪些解决方案？

吴红波：全球来说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国家层面，国家是落实主体，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 and 环境保护发展好了，那必然是这个国家负责任，别人不能替这个国家负责任，这个国家也不会让他来做。

第二个是区域层面，联合国五大区域的经济委员会会在每一个地区提供平台，各国政府特别是部长级的官员可以在里面交换意见，提供一些教训，另外可以共同发起做一些事情，这都是自愿的。此外，其他一些区域性组织也将积极参与，发挥协调作用。

最后是全球层面，全球这次专门设立了一个高级别政治论坛机制，每四年由国家元首举行一次峰会，其他每年都是由部长级代表参加。这里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回顾在这之前落实的情况，这个高级别政治论坛每四年要出一个全球可持续发展报告，每年出版专题报告，提供全球落实情况。此外，我们也鼓励和欢迎企业及各种各样的机构能参与这项工作，自愿提交报告。

中国的经验不能照搬

记者：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否

可以说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榜样？

吴红波：我认为这样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各国情况不一样，可以说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面发展基础雄厚。像中国这样工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世界上很难找出第二个。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几代中国人努力的结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学中国，不能完全复制中国的道路，因为条件不同，国情不同。但是中国走的道路是可以有所借鉴的。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很多发展中国家派人来学习中国的经验。

我们已累计为受援国培训了1200多万各类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但是环境没有保护好，现在再回过头来治理环境，这是教训。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时，中国能够帮助它们少走弯路，力争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采用和选择污染少、节能好的一些技术。

记者：中国现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有国家看到中国发展出的繁荣以及付出的代价，担心中国是否会把不想要的过剩产能转移出去。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吴红波：“一带一路”是基于传统观念上的一个创新想法，是新倡议也是一个新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逐渐在接受这样一个概念。我觉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这个产能要看什么样的产能，过剩产能不一定是坏的产能，或者是污染产能，也可能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需要的匹配技术，比如在非洲目前推广电子产品就很难，因为很多非洲国家识字率低，但是如果是制鞋制衣这样的制造业就很容易和他们对接。

记者：如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引发全球关注。如何看待经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

吴红波：从世界的一个规律来看，发展要素基数小的国家，容易做到高速发展；经济体量越大，速度越慢。中国现在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我觉得是正常的。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关键转型期，需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如何避免？放眼



↑ 吴红波在联合国总部办公室接受《凤凰周刊》记者采访。

全球的经验，唯一路径就是创新。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往往不会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那些高尖端技术给你。比如，德国的宝马、奔驰等顶级车肯定不会在中国生产。

很多国家到了这个阶段都是在重复已有的低端技术，这也是为什么上世纪60年代被评估为中等收入的国家，至今还是原地踏步。只有个别国家突破重围，比如韩国。韩国靠什么？一个三星、一个现代。有了这些高科技的东西，韩国才可以和西方国

家PK。

中国现在面临经济转型，转型必然是痛苦的。那些低附加值、高污染的夕阳企业，如果还死死抱着不放，大家就只能一直呼吸有毒的空气。难道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这样的中国么？

中国有好的教育基础，有成千上万的优秀工程师、科学家，这是其他国家所羡慕的。只要走创新道路，我想，经过一段痛苦的过程后，中国就会在新的轨道上快速前进。●

□ 编辑 漆菲 □ 制图 美编 虎妹

大陆能否 承受GDP增速破7

大陆经济增速6年来首度“破7”，且经济下行趋势尚未见底，就业、财政等纷纷告急。在此背景下，宏观调控也需及时调整到新的轨道。

记者/赵福帅

中国经济增速终于跌落到7以下。

10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大陆前三季度主要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大陆经济仍继续探底。中国官方承认，由于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

根据官方统计，今年前三季度大陆国内生产总值(GDP)48774亿元，同比增长6.9%，为6年来首次“破7”。分季度看，一、二、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分别为7.0%、7.0%和6.9%。从环比看，三季度GDP增长1.8%。

而且，其他各项主要数据

几乎均呈下滑态势。

前三季度，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9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更只有5.7%。1-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9%。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0.3%，增速比上半年回落1.1个百分点，创2000年6月以来新低。前三季度，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仅2.8%，显示内地经济仍未触底。

进出口总额同比下降7.9%。其中出口下降1.8%，进口下降15.1%。9月份，进出口总额同比下

降8.8%，其中进口下降17.7%，显示进出口仍在恶化。

唯一向好的数据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另外，内地前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下降5.0%，9月份更同比下降5.9%，已经连续第43个月下跌。大陆仍持续面临类似1997-2001年通缩风险。

法新社的报道评论称，“自中国股市夏季暴跌并且随后人民币在8月意外贬值以来，今天(10月19日)公布的数字是官方首次证实投资者对中国GDP增长的担忧。”

正常的破7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但是自2010年后，中国经济增速节节下行。中国政府已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为7%左右。然而过去几个月，中国经济形势似乎在恶化，表现在股市、汇率等方面。这加剧了各界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忧虑。

不过，在近期接受路透社、《华尔街日报》等外媒专访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应说，“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有快有慢是正常的，不能说只能加速、不能减速，这不符合经济规

律。”“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居世界前列。中国经济运行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中国需要的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中国国家统计局更表示，即使今年增长率低至6.5%，也在目标范围内。

在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就表示，增速下行破7是情理之中的。中国以往30年的高速增长是因为基数小，产业空间大，劳动力和资源环境成本低。

“但现在中国作为追赶型国家已进入稳健增长期。中国人要调整心态，不要以为现在不正常，现在恰恰是正常的。”

根据国际经验，追赶型经济体经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超过11000国际元后，经济增速都出现明显回落，日本、韩国等降幅在30%左右。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大陆人均GDP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

“高增长时代早就该结束了。”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胜军对本刊表示，大陆经济之前10年的超高增速严重透支和透支了未来，使得各种矛盾都到了临界点。比如华北雾霾问题若继续下去，社会运行都会紊乱。

“中央也看到和承认这样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代价巨大。所以现在的增速下滑是告别疯狂，回归理性，而不是世界末日。”

至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局面将持续多久，在9月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中国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经济增速预计将保持在7%

左右，这一状态可能持续4到5年。由于中国过去依靠政策刺激取得9%到10%的增速，是不可持续的，并导致产能过剩和库存大量增加，必须逐步消化产能和去库存，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重回强刺激？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虽属正常，但宏观调控政策如果应对失当，就会提前引爆长期积累的风险，从而使中国经济运行偏离“新常态”的轨道。

10月1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部分省（区、市）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强调，既要坚定发展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完成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10月16日，李克强又主持召开金融企业座谈会，指出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金融环境。

9月以来，国家发改委加快交通基建项目审批节奏，短短40多天的时间内就批复了39个项目，总投资规模达1.26万亿元。

内地多个省份在这期间召开四季度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以大项目冲刺全年稳增长目标。据悉，贵州今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额度为1.5万亿元，而1-8月其完成额度仅为5389亿元。9月28日一天，贵州就集中开工了38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2080亿元。

由于稳增长与强刺激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一些观察人士担忧目前中国政府的稳增长正滑向“4万亿式”的强刺激。

“政府要有战略定力，破7

就破了，刺激经济是放大泡沫，重复原有产业结构，发纸币发得人们都慌了，纸币根本不是财富。每届政府开始都说得很好，但做起来很难，因为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眼看着经济增速在自己手里下滑。”李义平说。

刘胜军认为，政府应对30年来从未有过的7%以下增速且仍不断下行，是没有经验的，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保7%，害怕企业破产倒闭而去救企业；还是该淘汰就淘汰，该清理就清理，经过痛苦的涅槃完成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

“我们现在看不出政府到

底想干什么。政府有些摇摆，一开始说要坚定面对转型的压力，但是当压力真的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政府有些后退，又回到4万亿的框架中去。”

他指出，近年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政府就只能变本加厉地刺激，拼命投资砸钱，银行拼命放水，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的债务问题和产能过剩，对经济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我们最忧虑的是政府和社会还没找到应对的感觉，这个感觉就是：第一，对高杠杆和高产能一定要面对，不要奢望能避开。第二，现在的结构性



问题,只有靠大幅改革才有可能解决。改革推不动的话,搞再多的短期措施都无济于事。”

不过,在经济繁荣时期,多项重大改革尚不容易实行,在经济下行时期,这些改革恐怕更难以推进,因为这可能引发大量破产、失业和经济硬着陆。

李义平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肯定不会让经济硬着陆,因为中国不能接受危机和破产。“但是硬着陆也不是坏事,经济有泡沫和脓包,一下子挤掉,反而就好了。现在之所以反反复复就是四万亿不断刺激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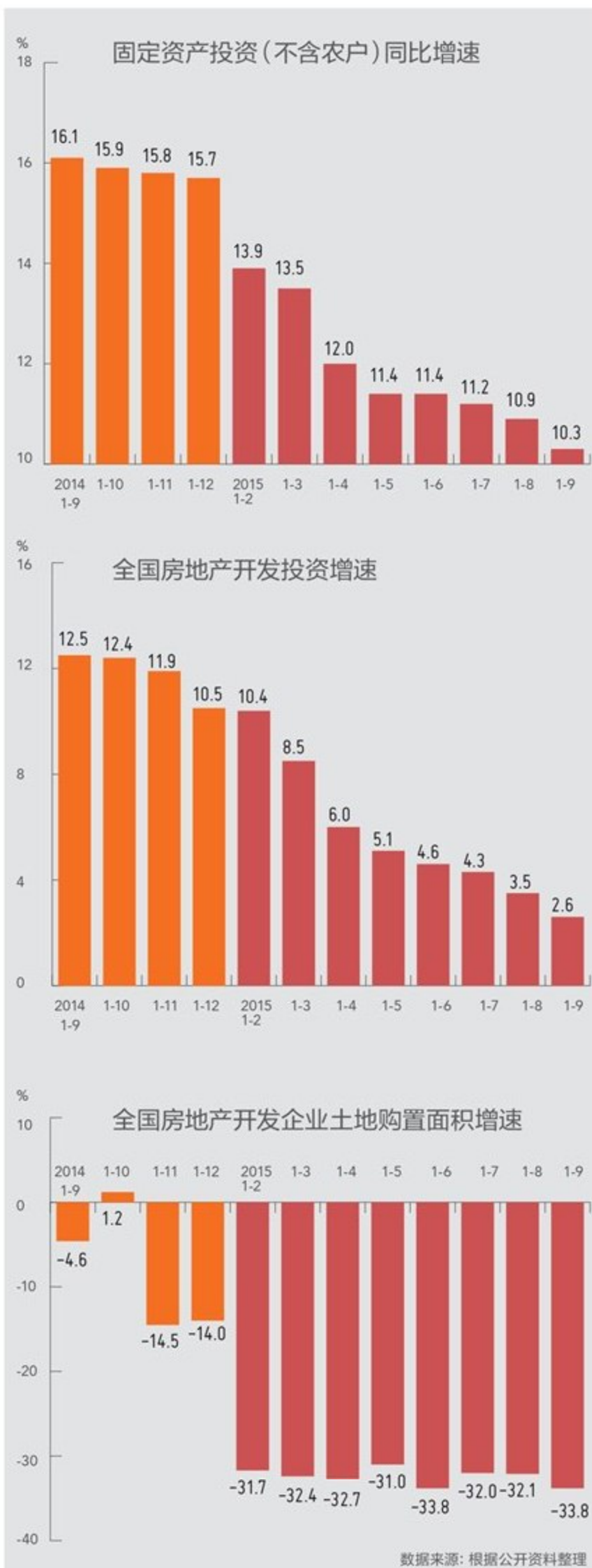
他更批评中国始终对市场经济叶公好龙,危机和破产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一旦这种市场机制真的要起作用,中国就不能接受了。

“危机不是倒退,而是一场新竞争的开始,没有危机和破产也就没有经济活力。经济在低潮时,才会强制性地淘汰落后、挤出泡沫,并极大地刺激科技的迅猛发展。两次大危机都发生在美国,但是美国经济现在最发达,调整得最好。”

相反在中国,目前过剩产能迟迟退不出来。李义平分析,这是由于地方保护,另外没有兼并重组和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退出机制。

“因为缺少这些机制,在中国,诸多问题最后都会变成政治问题,结果就无解。这是导致中国经济现在该转型却转不动、一直卡在中间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刘胜军说。

他认为中国经济的困局和挑战才刚开始,并建议,第一,



实行大规模减税。第二,人民币应大幅贬值,而且一步到位,让热钱没有溃逃机会,小规模贬值只会引起恐慌,贬值理由是调整汇率机制,从盯住美元转变到盯住一揽子货币。第三,要有大胆的政治突破,比如打破央企垄断这一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

财政之困

随着大陆经济节节下行,并延续至“十三五”期间,货币政策无法奏效,财政政策就成为中国稳增长的主要手段。预计财政政策仍将持续加码公共支出与投资,加快盘活财政存量资金,进一步降税清费,推进PPP项目引导民间投资。政策性银行将继续发挥“第二财政”作用。

“财政政策一方面要适应经济下行,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另外防止增速断崖式下降,防范各种风险和危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教授温来成对《凤凰周刊》表示。

不过,市场更为忧虑的是中国财政是否会出现自身难保?更遑论保增长、保民生。

根据中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1-9月累计,全国、中央、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口径增幅分别为5.4%、5.6%、5.1%,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2.7个、0.4个和5个百分点,全国财政收入呈中速偏低增长态势。

另外,1-9月,全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口径下降26.4%。地方同口径下降29.3%,占其大部分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34.7%。

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则延

续猛增势头。1-9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口径增长15.1%,为预算的70.4%,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城乡社区、节能环保、交通运输等项支出均增长超过20%。

在愈演愈烈的财政收支矛盾下,中国的财政政策还能否保持积极?刚性支出会否下滑?财政还能否正常运转?

温来成认为,中国财政仍有回旋余地。比如压缩三公经费等行政运行成本,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比如细化投资项目,凡是民营资本愿意投资的,直接交给社会特许经营;收益低的,通过PPP模式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政府只全额投资于没有任何收益、纯公益性的项目。比如与民间资本合作组建产业投资基金,委托给专业机构,政府不再插手微观经济,从而减少财政支出,提高资金效率。

不过温来成提醒,财政收入减少,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有可能出现债务违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末,地方政府总负债已达到30.28万亿元,杠杆率超过42.7%,是中央政府15.1%杠杆率的几乎三倍。

温来成表示,政府今年已经开始做中期财政规划,对各年度需要还本付息的债务,及早安排,通过债务置换、借新还旧等,调整债务结构。

2015年至今,中央政府已经下达6000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和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债务额度。地方政府偿

债压力由此得以缓解,稳增长支出大幅回升。

不过,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夏斌在一次论坛的发言显示地方债风险犹在。“当前资金松不到中小民营企业,地方债务压力和地方平台以及一些大国企的产能过剩吸走了大量资金,现在是八个瓶子七个盖,盖来盖去少一个盖,要打破一个瓶子,该破的要破。对地方平台的不良资产要赶紧剥离重组,最终损失可以先定下来,由中央、地方、银行共同背。”

另外,各界普遍担忧,政府收入吃紧可能阻碍大规模减税的实现和执行效果。“不能因为财政收入下降而缩水减税、推迟税制改革,甚至征收过头税、乱摊派等,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永远走不出复苏。”温来成说。

中金公司近期的研究显示,2014中国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年高达37%。而且政府收入并没有及时返还实体经济,而是以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等形式大量沉淀为存款储蓄。截至今年7月底,机关团体存款高达20.3万亿元,财政部门国库现金存款接近4.6万

中国缺少兼并重组和社会保障再就业等退出机制,不少问题最后都容易变成政治问题。这是导致中国经济该转型却转不动、一直卡在中间的原因。

亿元。

由于企业与个人税负过高,严重影响了企业投资和技术更新的积极性,也抑制了消费与人力资本积累,甚至危及企业生存与就业。

对于政府担忧减税会降低政府收入,刘胜军回应说,现有税负偏高,如降低税率,短期内会减少财政收入,但随着企业和个人经济状况转好,增税效果很快就会表现出来。

就业承压

10月20日,中国民营玻璃巨头华尔润公司全线停产清算,与全部职工解除劳动合同。总部在江苏张家港的华尔润是中国大型浮法玻璃企业,现有员工8000多人,玻璃产销总量连续13年列国内同行业之首。

另据智联招聘近期发布的报告,第三季度平均一个白领职位收到35.4份简历,较一季度的26.1以及二季度的29.3大幅上升,求职竞争指数上升趋势明显。

该报告分析,中国经济持续放缓,部分行业面临较为严峻的形势,对人才的需求减少;其次,一些外资企业在华开始裁员或缩减业务;此外,随着互联网行业投资热情逐渐冷却,身处其中的白领也开始担心发展前景,谋求更好的平台,从而导致第三季度人才供需竞争指数大幅增加。

对于就业压力,国家统计局在10月19日发布会上回应称,内地前三季度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计划目标。9月调查失业率在5.2%左右,比前两月略有

上升,主要原因是8、9月份正是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旺季。但是25-60岁的就业人员调查失业率稳定。

刘胜军则认为这些数据未必准确,就业表面上没问题,不等于真的没问题。“有一些企业该倒闭的倒闭不了,政府和银行是在用非正常手段养着这些事实上已经倒闭的企业。”

一旦中央政府态度变化,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银行失去了救助能力,失业率就可能大幅上升。“到那时中国就会比较麻烦,因为中国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再就业体系。所以政府现在要做好预案。过程中,不要过度维稳,现在维稳花的钱足够支持企业淘汰和员工再就业了。”

至于一些行业白领出现竞争加剧、失业或降薪,李义平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金融衍生品行业的繁荣都是吹上去的泡沫,对经济没多大好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因为金融衍生品。泡沫一破灭,肯定要裁员减薪,这是理所当然的。其他行业也一样,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会有加人加薪,也有裁员减薪。新的行业新的业态也在不断出现,劳动力可以转到这些领域。”

刘胜军分析,即使好企业,面对现在的经济形势,也会保守一些,减少投资,就业数量和质量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要保就业就必须改变社会的悲观预期。“必须通过大规模减税、真刀真枪的改革措施来扭转大家的悲观预期。”

□ 编辑 王毕强 □ 制图 美编 虎妹

P2P+保险, 谁是赢家?

因大陆监管层出台行业新规, P2P理财平台开始大洗牌。为了生存, 越来越多的P2P选择傍身保险。而险企也从被动进入转为主动出击。

记者/曹蓓

尽管是业内公认的P2P理财平台领军者, 近期高价启用域名、跨界合作等动作频繁, 但陆金所仍难消弭被大公国际移入黑名单的隐忧。

今年3月, 大公互联网金融信用信息平台对外发布公告, 决定将陆金所由大公互联网金融信用风险预警观察名单移入黑名单。这是平安旗下、作为业内标杆的互联网理财平台陆金所今年以来第四次被大公“点名”警示, 也是最严厉的一次警示。理由是, “平台实缴出资额发生较大变更; 债项信息严重不对称, 涉嫌建立资金池; 涉嫌关联担保。”

P2P金融指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在收取一定服务费用的前提下向其他个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 借款者可自行发布借款信息, 包括金额、利息、还款方式和时间, 实现自助式借款; 借出者根据借款人发布的信息, 自行决定借出金额, 实现自助式借贷。

伴随互联网金融而兴起的高风险但高收益的P2P金融理财平台在近两年疯长, 但由于违规、跑路等负面信息频发, 一直被视为互联网金融的高危区域。诞生之初, P2P平台就长期游走于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

直到2014年才被明确由银监会主导进行监管。

7月18日, 央行等十部委联合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明确P2P平台信息中介的性质, 并由银行作为资金存管机构。业内预测, 80%以上平台将面临淘汰。

也正是在行业大洗牌的过程中, P2P平台萌生了与保险合作的念头, 目的是在高风险的标签上贴一层保护膜。据网贷之家统计, 截至7月底, 共有43家P2P网贷平台和保险公司进行增信合作。但照目前的结果来看, 大多言大于行, 实质性合作寥寥无几。

只是噱头

今年4月永安保险的一则声明, 揭开了P2P平台和保险公司合作的最后一张牌。该声明称, P2P平台“财雨网”在其主页中登载“财雨网所有借贷项目全部由永安保险公司承保”、“财雨网平台上的每一款理财产品、每一笔交易都将由永安保险保驾护航, 投资人的本息100%得到安全保证, 没有任何投资风险”等宣传是失实内容。

这样的尴尬并不是个例。今年2月, 理财平台财路通与国寿财险北京分公司之间也爆出

类似事件, 据陆媒报道, 中国人寿称, 与财路通合作仅限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其他风险保证保险均不在公司的承保范围。

被多家平台公司标榜为“保险承保”的合作, 大多只停留在针对借款人生命健康、针对抵质押物的财产安全、针对用户资金账户安全类的保险产品, 而不是用户普遍担心的履约保证险, 即当借款人出现逾期等未能正常履约的情况时, 由保险公司赔付, 保障出借人的资金安全。

据网贷之家最新统计, 今年以来P2P网络贷款平台出现跑路或提现困难的公司多达677家, 还有更多P2P闭口不谈的逾期和坏账。这是到目前为止高收益P2P平台的最大阻碍, 而引入保险, 则是跨越这一阻碍的有效尝试。

但问题就出在P2P平台在寻求与险资合作的过程中, 大多险企并无太多兴趣。国寿财险内部人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由于P2P的高风险, 保险公司在合作时对开展信用险方面的合作很谨慎。原因除了平台风控能力弱的原因以外, 还包括P2P平台的客户原本是无法从银行贷款、信用风险高的群体。

一位保险公司负责人告诉

《凤凰周刊》, 对P2P平台有兴趣的大多是规模不太大的公司, 保险业的巨头很少涉及深度合作, 因为牵扯精力太多。

开始破题

单纯作为宣传的噱头难以长久, 开始逐渐被P2P行业认清, 于是一些平台转向寻求与保险的深度合作。

8月, P2P平台米缸金融与天安财险合作, 推出履约保证险。据悉, 投资者在米缸金融购买经天安财险承保的理财产品, 均可获得由天安财险出具的保单, 保险公司根据保单的约定履行保险责任。

而此时, 另外一些平台早已酝酿。2014年5月, 一家刚刚成立的P2P平台小赢理财找到同样成立不久的众安保险, 希望双方可以达成深度合作, 不同于其他“P2P+保险”之处在于, 这个平台上的所有产品, 均由众安提供“信用保证保险”, 出借人可以获得本金的保障。

众安保险是大陆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 由阿里系蚂蚁金服、腾讯、中国平安等发起设立。在众安保险看来, 两家基本上同期成立的, 经营理念也比较一致, 通过保险识别和控制风险的能力, 可以获得理财

平台的获客渠道并分享收益。而这家平台也获得了打消投资者顾虑的途径,所以据当事人描述,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并在今年的10月15日正式宣布深度战略合作关系。

更深层次的不同是,双方采用了系统直连,也就是保险公司可以直接看到理财平台的数据,技术和逻辑实现完全对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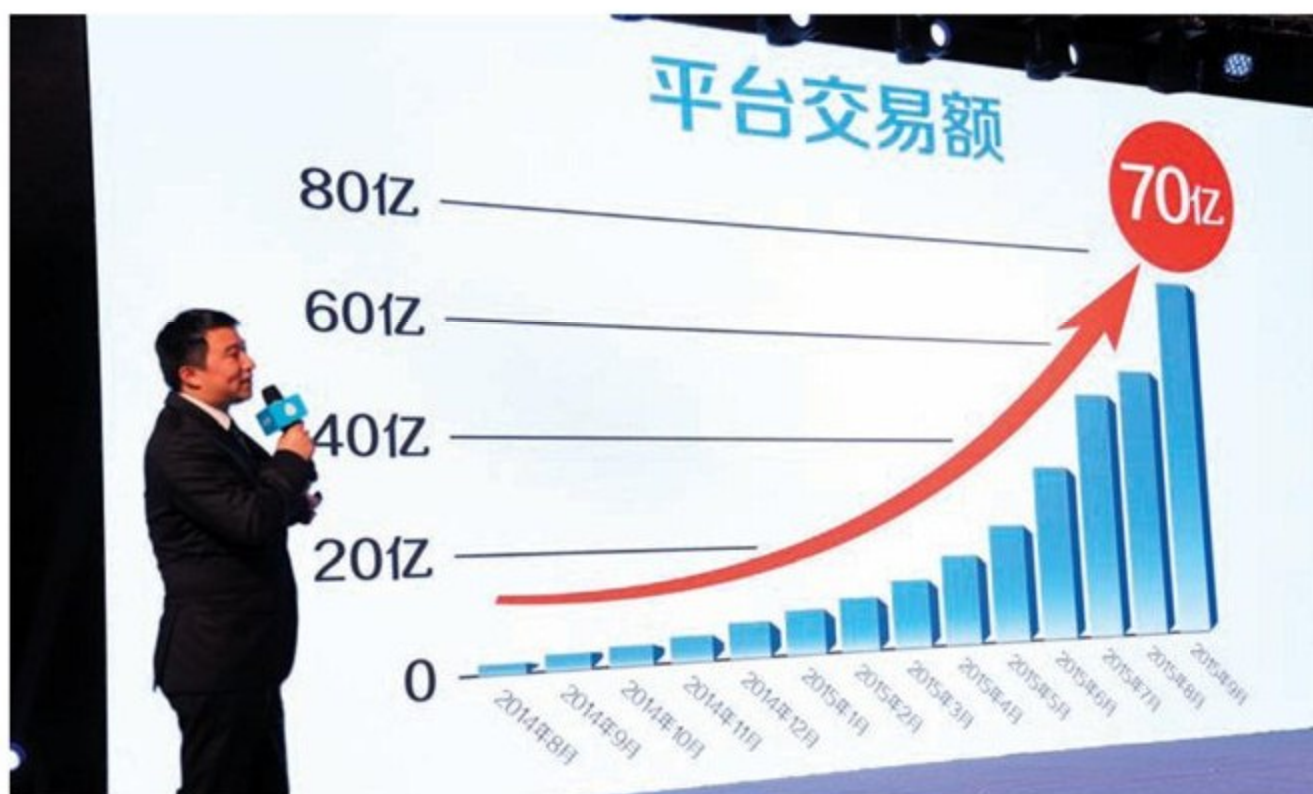
业内人士分析,花费如此大的成本与一家刚成立的理财平台合作,众安的想法也许并不仅仅是获得短期收益这么简单。

众安保险首席风险官吴述对《凤凰周刊》称,从目前来讲,双方的合作需要耗费很大的精力,因此对这次合作很慎重,目前众安这种级别的合作仅限于两家关联企业。同时他指出,考虑在适当的时机参股小赢理财。

“P2P平台有各类丰富的资产端,保险资产很难全部获取,更重要的是,二者的合作使互联网流量流向保险,这是险企更为看重的。”申万宏源研究所所长易欢欢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此外对于P2P来讲,保险公司的信誉会成为良好的背书,也能解决监管要求的其资金池问题。因此,未来这种P2P平台和险企的深度合作,应该会成为趋势。”

但是他提出了当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在P2P平台的创新性和保险公司严格的风控之间,如何寻求平衡。“现阶段,可能会因为险企的高标准而降低P2P一定的创新性。”

然而,即便真正实现了与保险公司实质意义上的合作,参



▲ 2015年10月,小赢总裁黄聪展示了小赢上线至今每个月的平台交易额,截至10月初,已突破70亿元。

与者众多的P2P平台却很难高枕无忧,因为他们要面对的竞争者,不仅包括来自互联网巨头旗下的平台,也包括传统金融背景的公司,况且,P2P领域从来不乏各路资本和各种创新思维的新进者。

险企的野心

与天安财险、众安保险类似,并不是所有的险企都因为牵扯太多精力而放弃P2P这块肥肉。

网贷之家联合盈灿咨询在10月发布的《中国P2P网贷行业2015年9月月报》显示,2015年9月,P2P网贷行业整体成交量达1151.92亿元,环比8月上升了18.19%,首次单月突破千亿元成交量大关。另据机构统计,尽管已经连续几个月呈下降趋势,9月份的P2P平均年化收益率仍达到11.48%。

而同期与此对应的,曾经屡创新高的银行理财产品却似乎进入萧条期。来自银率网的统计显示,9月份理财产品收益率普降,超过百款的银行理财产品预期收益率低于3%。另据融360数据监测,9月,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4.49%,连续5个月下跌,创下近两年来的新低。

这就意味着,在监管层出台新规、下手整治的大背景下,只要越过风险的门槛,未来P2P的发展前景十分可期。于是,曾经被动进入这一领域的保险,显示出更大的野心。

与米缸网展开合作后不久再度出手,10月19日,媒体报道称,天安财险与一家名为小马金融的P2P平台达成合作,为其产品提供履约保证保险。天安财险副总裁孙宇生曾表示,在目前与P2P公司合作框架下,今后可能会考虑成立P2P公司,杀入这一领域。

而考虑在适当时机参股小

赢理财的众安保险,在被《凤凰周刊》问及是否会考虑接下来进一步组建一家P2P公司时称,短期内不会有这样的考虑。

事实上,已经有保险公司上演亲自操刀的戏码。4月12日,阳光保险集团宣布发起设立“惠金所”,这是继中国平安的陆金所之后,第二家保险公司杀入P2P领域,设立互联网金融平台。在金融、地产等多领域大肆突围的安邦保险集团8月份称,该公司旗下互联网金融平台“邦融汇”,已经于7月中旬开始内测,近日将正式对外开放。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郝演苏对大陆媒体表示,作为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进入网贷领域具有绝对的优势,除了可以提供相应的保险保障之外,还是大金融机构的一次试水。她指出,虽然未来前景尚不明确,但需要提前占领市场却毫无疑问。

□ 编辑 王毕强 □ 美编 虎妹

链接

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势



解读

配套措施需跟上

【本刊综合】延迟退休最直接的作用是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降低每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的退休人数,增加经济发展的劳动力供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对此表示,延迟退休年龄这套方案在制订过程中,国务院层面会为其配备多种配套措施,比如,养老金的制度结构,它不仅是财务问题,更是年轻人对养老金制度的支持问题,尤其个人账户一定要体现出多工作、多积累的特性。她强调,农村富余人员和加工业大龄人员向服务业转移需要很多的政策支持,比如,需要职业培训、咨询、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政策,同时,由于这部分人的精力以及时间有限,还需要社保缴费能否按照小时为单位计算等一系列政策。清华大学已针对延迟退休的配套方案作出了一套计划,希望在推行延迟退休年龄的同时,解决相应人员向专项服务业转型的问题。此外,推行延迟退休年龄还需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从而减轻实施的阻力。

延迟退休并无实际意义?

【本刊综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延迟退休长期持否定意见。他认为,现在常说养老保险有缺口,意指单位和个人缴费不够发养老金,其实将社会保险看做商业保险了。现在拿不到养老金的都是制度外的人,参加社会养老的人应该拿到了养老金。当然也有个案,如果有缺口,应由政府财政补上。社会保险法规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于三方面:单位缴费、个人缴费和财政补贴。老龄化趋势下,交社会保险的人越来越少、领保险的越来越多,所以单纯靠缴费不够,还需要财政补贴以及其他很多手段,比如用国有资产收益补充。而且养老保险基金至少五年到十年内不会出现问题。老龄化出现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年纪会逐渐偏大,顶峰时平均会达到30多岁。如果延迟退休年龄,实际无助于解决结构性问题,也无新生劳动力。中国离老龄化最高峰还有约20年,要真正解决和缓和中国老龄化高峰,是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焦点

延迟退休方案拟订完成
2017年正式出台

【本刊综合】延迟退休越来越近。10月14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介绍“十二五”以来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成就时表示,经中央批准后,人社部将向社会公开延迟退休改革方案,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推迟几个月,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他同时透露,要到2017年才能正式推出延迟退休具体方案。“通过前期的磨合与讨论,人社部的方案已经拟订完毕,下一步就是走国务院审批、征求意见、进一步讨论等程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透露。

对于采取渐进式“小步慢走”的基调,早在2013年人社部对外征求涉及方案时就已涉及。当时,来自社科院、人大、清华、武大等院校的多个专家团队参与制订了多套改革备选方案;其中,受关注程度比较高的则属清华大学和社科院提出的两套方案。

清华方案建议:从2015年开始,1965年出生的女性职工和居民应当推迟1年领取养老金,1966年出生的推迟2年,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女性65岁领取养老金;从2020年开始,1960年出生的男性职工和居民推迟6个月领取养老金,以此类推,到2030年实现男性职工和居民65岁领取养老金。同时,艰苦岗位的男女职工可以提前10年领取养老金,也就是男女分别进行延迟领取,用15年的时间完成该项工作。

而社科院的方案建议,每几年延长3个月,延迟5岁用20年的过渡期,但为了避免制度碎片化,特殊群体并不单独列出。

尹蔚民表示,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退休年龄,除了非洲的一些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是在65岁、67岁,而且都是渐进式延迟的,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按人社部所言,实际退休年龄“平均不到55岁”,也就是说,退得早加之中国又是一个急剧快速老龄化的国家,延迟退休已是刻不容缓。

2017年



更多资讯 更多阅读方式 尽在

鳳凰週刊

新媒体

New Media

微信

微信客户端扫描以下二维码
或搜索香港凤凰周刊
添加我们的公共账号吧
每天为您播报更多资讯



新浪微博

用新浪客户端
扫描以下二维码
赶紧 @ 凤凰周刊
随时获取更多即时资讯



亚马逊电子书

扫描以下二维码
即可购买凤凰周刊
亚马逊 Kindle 电子书
获取更多资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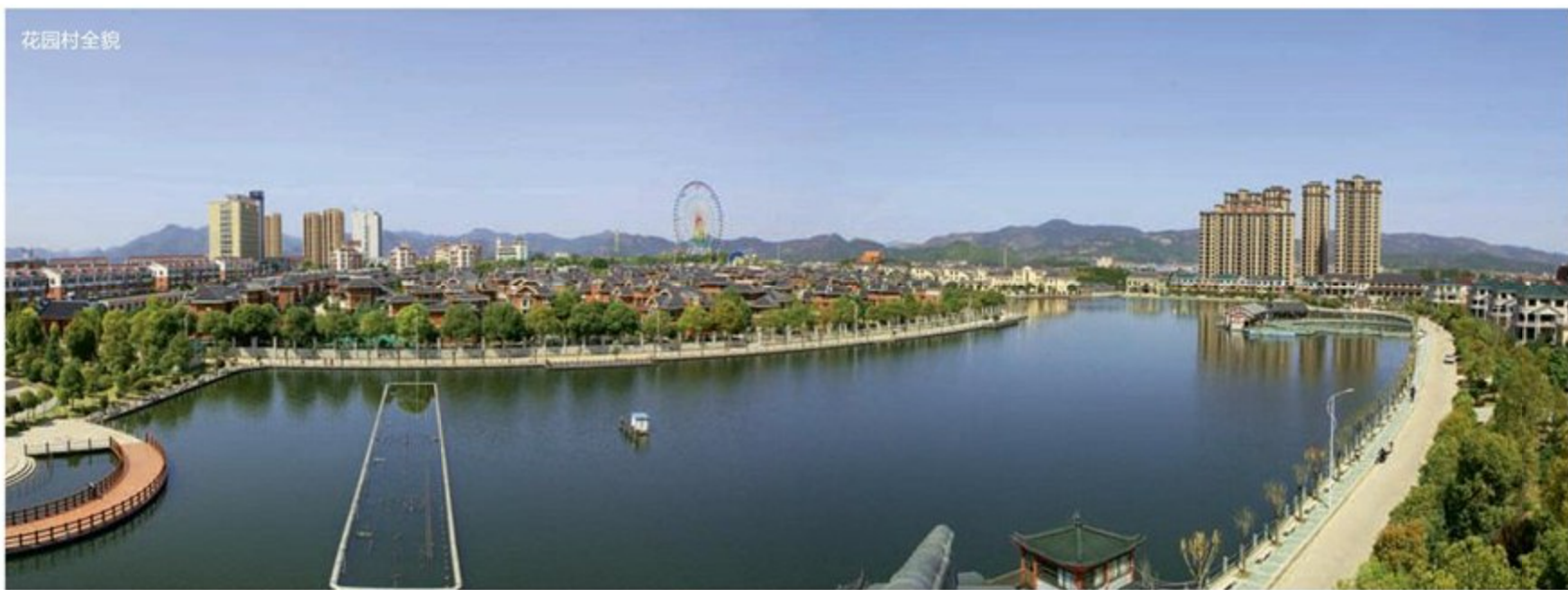


官方网站

登录以下网址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您可以无障碍在线浏览精华内容
或在线订阅《凤凰周刊》
www.ifengweekly.com



花园村全貌



浙江花园村首创村域城镇化发展新模式

有一种红 叫花园红 有一种梦 叫花园梦

文 / 章乐一 摄影 / 金光强 王江红

今年，在第十五届全国“村长”论上，第二届中韩村官交流会引起世人关注，韩国17名来自京畿道以及完州郡等地的村官代表，与浙江东阳花园村等中方村官代表一起，就村庄发展实践经验以及生态农业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其间，花园村被授予“中韩村官交流示范基地”，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个以促进中韩村官交流为目的的示范基地。

党的十八大报告全篇提及“城镇化”多达七次，近年来，政府工作报告的热点话题之一也有“城镇化”，与此同时，许多专家和学者提出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要超过60%，可见，城镇化建设是今后国家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0多年来，花园村以新农村建设为依托，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以及健全社会保障等方式，兴起了一场又一场农村城镇化的热潮，成为全国中心村建设的典范，这就是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建设的一种好方式，它就是要让政府的基础设施和社会管理延伸到区位比较好并能为周边村

庄提供带动作用的村庄。

浙江东阳花园村党委书记、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认为：“城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简单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最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鼓励和引导广大有基础有实力有特色的农村，承担一部分城镇所需的功能，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而花园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提高花园人的富裕程度，今后花园村必须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才能让花园人永远的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

完善基础设施 助推农村经济 打造中国红木家具第一村

2004年前，花园村已经是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在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中，村里给农户的拆除房屋补偿资金就有数亿元之多，呈现了一个全新的花园村。与此同时，花园村两委加大对基础设施投入，除一般性投入外，还建设了花园粮油商贸城、花园田氏医院、花园购物广场、吉祥湖休闲区、花园文化广场、花园剧院、中国农村博物馆、图

书馆、花园游乐园等休闲文化设施。

其中，花园红木家具城如今是全球最大红木家具专业市场，打造了“中国红木家具第一村”，花园红木家具产业“无木不成林”的经济模式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花园红木家具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农民创业致富，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为加快当地新农村建设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起到了引领性作用，使花园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

在花园集团龙头工业企业的带动下，全村目前引入了各类工商企业2727家，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和众多创业机会，集聚了超过3.5万多外来务工者涌入，助推了花园村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花园村2014年实现营业收入338亿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13万元。

经济的发展，更是吸引了金融机构到花园村抢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东阳农商银行以及东阳市富民村镇银行等都纷纷在花园村设立营业网点或开辟自动存取款业务，既方便了花园人的生活，也促进了各工



村民图书馆



免费村民公交车



花园水世界

商户的快速成长。

优化公共服务 创全国村级影视产业先河

事实上,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公共事业,为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等提供保障。

如今,花园村学校、医院、市场、公园、剧院、超市、酒店、银行、高档别墅、高层住宅以及老年公寓等一应俱全,村民足不出村就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所能享受的公共服务,给村民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花园人享有良好的教育资源,拥有省二级幼儿园、文化艺术培训中心以及省重点职业技术学校,村民子女入学还可享受50%的优惠,考上大学、硕士以及博士的学生毕业后回村创业就业,就可以享受每年10000元至50000元不等的奖学金,促进了下一代工作的健康发展。

在文化事业上,花园村经常性举办各类文艺活动,组建了花园艺术团为村民、员工以及游客表演不同艺术形式风格的节

目,编制了“花园村民读本”、《花园之歌》、《花园村志》以及半月一期的《花园报》等。此外,花园村还成立公司进军影视文化产业,首部电视连续剧《大明按察使》就登入央视一套和央视八套播出。

通过优化公共服务,花园村各种资源共享,不仅提高了花园人的生活品质,而且提升了花园人的幸福指数。

健全社会保障 增进民生福祉 建全国最大村级医院

一直以来,花园村先后落实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福利待遇,全村建立和健全了医保、社保和养老等保障体系,解决了广大村民的后顾之忧。

花园村为村民们织起了保障网: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地农民保险、城乡居民保险、农房改造补贴、数字电视费(单双向)、电话月租费以及公共设施共享费等10多项免费福利,老年人每月可领口粮费以及80岁以上的每年还有2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高龄补贴;大学生享有奖学金制度以及回乡创业基金;困难户可申请扶困补助;村民看病自费部分还可报销一半……村民找工

作,只要愿意,都由村或花园集团安排。

花园村还以二级甲等标准建造了花园田氏医院,推动了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确保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破解了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难题。去年,花园田氏医院病房二期投入使用,床位数达到了520张,成为了全国村级最大医院,村民这在里看病还可以享受除农保报销外自费部分50%的优惠。

经过30多年的不断探索,花园村已经成功实现了城镇化。无论是领导专家,还是学者游客,大家都会发出一个感慨:花园村好似欧洲小镇,已经奔向了小康生活。

中央农村经济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2011年参加浙江中心村培育建设发展论坛时就指出,“看了花园村的30年发展成就,就能了解到在浙江什么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什么叫以工促农和以城带乡,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什么叫中心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花园村的发展模式具有可持续性,是我国今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一个范本。”

花园村 中国“好声音”

花园村先后被授予全国创建精神文明先进单位、全国文明村、全国模范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红木家具第一村、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首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中国十佳生态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幸福村、全国绿化模范单位、全国巾帼示范村、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村官培训基地和全国新农村建设A级学习考察点,打造了中国名村考察游、红木家具采购游、生态休闲观光游的最佳旅游目的地,名列2014年中国名村影响力综合排行榜第三位。



花园夜间灯光秀

贫穷笑不出来



2009年，香港一名男子坐在“笼屋”的床上。这是香港“笼屋”内百态人生中的一张普通面孔。一群老弱贫苦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罐头似的“贫民窟”里，一张张床位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犹如一个个笼子。住在“笼屋”的人被称为“笼民”。它让世人见识到这座“东方之珠”的另一面。

2015年10月,世界银行宣布,为反映近十年来全球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世行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国际贫困线标准从此前的每人每天1.25美元消费上调到1.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2元)。此举可能导致全球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增加数千万人。但它仍十分必要,这是贫困人群谋生,免于饥饿,外界予以经济政策扶持的基准线。

没有饥寒交迫过,大概无法了解什么是缺乏。很多人简单地把贫困归因于懒惰,或者不会过日子。然而现实中的原因极其复杂,可能是家庭、疾病、自然灾害、文化、乃至社会制度缺陷所致。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美国政府对贫困的态度一直是放任自流——政府不参与济贫而让私人慈善团体去帮助。大萧条扭转了这种思路,精英们意识到需要建立并完善防止贫困的社会保障制度。

在视“城中村”和贫民窟为丑的时代,贫困很容易成为社会的盲区。“贫困”字眼本身过于平淡,可能很多人都有过手头窘迫经历,但只有在打量贫困线标准这样卑微的数字,或是目睹“贫穷”二字的下限时,才会理解。按照新的国际标准,中国大陆竟还有两亿贫

困人口在吃饭、喝水、上学等基本生活方面都非常困难,他们日子如何,恐怕关心者不多。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估算,全球现仍有1/4的人口无法获得足够的食物,其中有10亿人处于极度贫困中,每天收入不足8元人民币。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多地的贫困问题仍是普遍现象,未见明显好转。贫困将这些地区的人们带入无尽的恶性循环:饥饿、营养不良、疾病、生产力低下。

贫困是复杂的难题,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即便发达地区也不能例外。香港楼里藏着罐头似的“贫民窟”,被铁丝网团团围住的“笼屋”里,上演着贫困人群的百态人生。欧美社会的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大量见诸公共视野。

联合国组织在1992年12月22日的会议上通过决议,从1993年起把每年10月17日设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以唤起世界各国对因制裁、歧视与财富集中化引致的贫困族群加以援助。从2014年起,中国也将每年的10月17日设定为国家扶贫日。

这组照片由路透社分布在全球各地的记者拍摄,它覆盖了多个国家和地区,是这个世界上“贫困面目”的一组写真。(曾鼎)



2012年,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贫民窟的一名儿童站在瓢泼大雨当中。这片土地是世界上公认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无论国民人均收入、健康寿命或是受教育程度都严重落后,基础设施建设也严重不足。

2011年，巴西圣保罗，无家可归者带着行李在一栋无人居住的大楼中。房价和租金上涨令无处栖身的人越来越多。巴西一个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圣保罗44万户家庭的租房支出超过收入的30%。这些家庭可能被迫拥挤在一间卧室里，或住进摇摇欲坠的棚屋。一些为底层民众争取住房的巴西民间组织鼓励人们，占领被房地产公司闲置的废弃建筑。



2013年，菲律宾帕拉纳圭市，流浪儿童在桥下休息。近年菲律宾的经济增长很快，甚至超过了中国。但从政府近年来公布的贫困和就业数据来看，流浪仍是许多菲律宾人的日常，他们被新出现的繁荣甩在了后面。有10%左右的菲律宾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无法满足最基本的食品需求。





2007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儿童在途经贫民区的铁轨上玩耍。雅加达繁忙的铁路线两旁聚集着大量的贫民，雅加达的贫民窟里搭有数百个窝棚，有的窝棚距离铁路线不到一米，火车经过就会掀起成堆的尘土和垃圾。一个贫民区小女孩曾在这里追猫时被火车撞死。



2012年，希腊雅典，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发放食物，民众拿着领取的土豆。近年来，希腊经济持续低迷，贫困不断扩大蔓延，一部分希腊人因此在政治光谱上走向极端，极右翼“金色黎明党”在议会大选中异军突起，从以往的不到1%增至近7%的支持率。该党主张赶走所有在希腊的外国人，这些言辞激烈的政治主张在失业、贫困人群中很有市场。



2014年，美国洛杉矶，一名看手机的城市精英男子经过一位正在整理垃圾袋的男子。20世纪以前，美国人普遍认为新大陆充满机会，贫困是个人失败的结果。对于疾病、残疾等外来因素导致的贫困，人们主要依靠亲友互助和慈善团体的救济。但现在，更多的人认为贫困不只是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2014年，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一只鸽子从冒雪乞讨的妇人头顶飞过。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女性在职场上比男性更容易被挤出工作岗位。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数据曾显示，有一半妇女面临就业问题。对于孩子较小和多子女的母亲来说，失业的可能性更大，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对于她们来说，冬天最为难熬。

内外蒙古两大活佛的兴衰

章嘉、哲布尊丹巴分别主管内外蒙古，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的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这四大活佛体系都随着时代变迁走上了不同的演变道路。

文 / 班布尔汗（历史学者）

1957年3月4日，台湾台北市，一位67岁的老僧安然圆寂。身边的弟子亲随详细记录了老僧的遗言：自己的遗体火化后，遗骨交由副官陈静轩、外甥贺永庆二人供养。自己的转世灵童，由陈静轩负责寻找，希望政府对陈、贺二人的生活予以照顾。

这位老僧，便是清代藏传佛教四大活佛之一章嘉系统的第七世转世者，法名罗桑般殿·丹毕蓉梅。

清代四大活佛——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与章嘉，唯有章嘉系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这对于以中国文化道统正宗自居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是弥足珍贵的。然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困守台湾一岛，藏传佛教地区，无论西藏、青海还是蒙古均鞭长莫及，寻访灵童一事根本无从措手。虽有传言八世章嘉将在台湾本地甚至美国出现，但终究只是传言而已。被尊为“国师”、对国民党政府最为亲善忠贞的章嘉系统无奈地在台湾宣布断绝。日后，虽然流亡印度达兰萨拉的十四世达赖曾指认了八世章嘉，但这位章嘉活佛从未能回到自己在内蒙古的法座，也未能承袭从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开始、延续了251年的“国师”尊号。

然而，与章嘉齐名、在清代掌管外蒙古教权的哲布尊丹巴系统则要幸运得多。2010年，一直不为蒙古国政府所承认的九世哲布尊丹巴索南达扎被授予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正式被奉为蒙古国佛教领袖，在乌兰巴托甘丹寺举行了坐床仪式。虽然回到故地的九世哲布尊丹巴已经79岁，且在一年后便圆寂。但终究，被中断了87年的外蒙古佛教传统，从此可以回归正轨，福泽教民了。

那么，章嘉与哲布尊丹巴这对内外蒙古的最高宗教领袖，有着如何的过往，又为何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呢？

两大活佛系统的来历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都只是简称，完整的称号是章嘉呼图克图、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呼图克图”是蒙古语，是在蒙古接受藏传佛教之后所衍生出来的尊号，本为“有福者”，后成为“圣者”和“获得佛果者”之意。在藏传佛教中，“呼图克图”是要“道行至高”的喇嘛才能获得，所谓“道”是指精通佛典，学识高深，所谓“行”是指持守戒律、普度众生。

“呼图克图”的尊号在清代之前，是由达赖、班禅来颁给，仅是作为佛法上的至高

荣誉，类似于学位；而入清之后，则要由大清皇帝册封，就不仅是宗教的尊号，还代表着政治权力。

哲布尊丹巴系统来自于西藏，原本是拉萨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建立者嘉央曲杰的转世系统。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哲蚌寺法台多罗那他应喀尔喀、也就是外蒙古诸部的邀请前往传经约20年，深得喀尔喀诸部信奉和支持，被尊称哲布尊丹巴，藏语意为“尊贵的圣人”。回到西藏后，多罗那他被四世达赖认可为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1634年（明崇祯七年），多罗那他圆寂，次年，五世达赖认定土谢图汗衮布多尔吉之子札那巴札尔为其转世，法名罗桑丹贝坚赞，便是哲布尊丹巴一世。

哲布尊丹巴的前两世，都转世于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家族，在外蒙古诸部中极受崇信。但其地位是和达赖、班禅不能相比的，只是格鲁派在外蒙古地区的“主教”而已。

但到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喀尔喀遭到准噶尔汗国进攻，诸部汗王抵挡不住，发生了归附清朝还是俄罗斯的争论，而哲布尊丹巴一世力主往投清朝。因为他的至尊地位，喀尔喀数十万众归附清朝，宣告了外蒙古正式进入清朝版图。

有了这样的大功，哲布尊丹巴系统遂被清廷极为尊礼，康熙皇帝先后赐封“大喇嘛”、“启发哲布尊丹巴喇嘛”尊号。1725年（清雍正三年），雍正皇帝颁给二世哲布尊丹巴金册金印，正式命其掌喀尔喀佛教教务，使哲布尊丹巴成为了与达赖、班禅平起平坐的大活佛。



↑ 1955年4月8日，佛诞节。章嘉活佛主持由台北市佛教会在新公园举行的庆祝佛诞节及浴佛大法会。



↑ 第九世哲布尊丹巴蒋巴南卓。

如果说，哲布尊丹巴从一世起便是外蒙古地区的最高活佛，清朝皇帝对其的册封还是因时就势的话，那么章嘉系统则是清朝皇帝一手扶立起来的。

章嘉活佛的法座，在青海互助县的郭隆寺。郭隆寺是青海湟水北部流域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被誉为“湟北诸寺之母”，属寺众多，因此活佛也很多，有“五大囊活佛”和“九小囊活佛”等二十余位活佛。而章嘉活佛便是“五大囊活佛”之一，出身于青海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因此被称为“张家活佛”，后康熙皇帝因觉得“张家”二字不雅，钦赐改名为“章嘉”。

在一世章嘉扎巴鄂色时期，虽然出任过郭隆寺法台，并因精通佛典而受到推崇，但影响是不出青海的。到了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之时，因为辅助康熙皇帝安定蒙古各部有功，得到赏识，受命驻锡京城，从此成为驻京活佛之一。

此时西藏还没有为清朝所控制，而达赖喇嘛在蒙古诸部中拥有崇高威望，对康

熙来说，在内蒙古扶持一位活佛消解达赖喇嘛的影响是当务之急。在内蒙古本有很多历史久远、地位崇高的大活佛，但因是“坐地户”，一旦受到扶持，很有可能成为内蒙古地区的独尊活佛，这是康熙帝不愿意看到的。二世章嘉的出现，正好应了这个急，章嘉系统的地位完全来自于清廷的支

在外蒙古，“创立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持，在内蒙古更是陌生的存在，不会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

从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章嘉系统屡受赐封，最后不但获得即使达赖、班禅都没有领受过的“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尊号，并被授予

“黄教之事，由藏而东，均归尔一人掌管”的权力，正式成为掌管内蒙古、青海等地教权的大活佛。

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两大活佛，在清代“敷教安众”，对于内外蒙古的安定都做出了不凡的贡献。到清朝行将就木之时，章嘉传到了第七世罗桑般殿·丹毕蓉梅，而哲布尊丹巴则传到了第八世阿旺垂济尼玛丹彬旺舒克。

武昌城中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爆发，清朝已经摇摇欲坠，内外蒙古虽地处边陲，但也迅速被时代洪流冲击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而作为两地最高宗教领袖，也开始了与历任前世完全不同的人生。

国变与活佛之选择

庚子之变后，清廷开始推行“清末新政”，不仅在内地，在边疆地区尤其是蒙古地区，也全面展开。然而，新政虽“看起来很美”，但绝非清廷可以运用自如的。尤其在外蒙古，“创立新政日急，多不恤蒙情，蒙情始终无从上达，蓄怒愈深”，王公和百姓均怀怨愤，独立运动开始兴起。

作为最高活佛的八世哲布尊丹巴，虽是藏人，但自幼生活在蒙古，与蒙古血脉相连，很自然地坐上了争取独立的战车。

1911年（宣统三年）12月，在驱逐了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之后，蒙古库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

在成为“博格达汗”后，八世哲布尊丹巴以“所有蒙古人皇帝”自居，颇有雄心，派兵南下内蒙古，欲图统一所有蒙古地区。但一度支持他的俄国不过是想一块权益独享的殖民地和军事缓冲区，反而对他的“统一大业”不予支持，使得蒙古远征军“功亏

一策”。而俄国主导的《中俄蒙协约》，更是直接表露了“欲将蒙古暗中置诸自己保护之下，以使蒙古成为布哈拉或高丽第二”的用心。八世哲布尊丹巴对俄国彻底失望，转而配合北洋政府在库伦设置办事大员，取消了独立，实行自治，并接受了袁世凯所授予的“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的尊号。

1919年，沙俄崩溃，北洋政府派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率军进入外蒙古，迫使库伦政府取消“自治”。徐树铮做事蛮横，在外蒙古积聚了极大的不满。八世哲布尊丹巴开始寻找其他出路，暗中支持1921年进入外蒙古的白俄“疯男爵”恩琴对中国军队的驱逐，并在恩琴的扶持下再次成为“博格达汗”。但恩琴行事残暴荒唐，八世哲布尊丹巴只得派人到北京，希望北洋政府派兵驱逐恩琴。可此时陷在内战泥淖的各派军阀互相掣肘，久不能出兵，终于导致苏联进入外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消灭了恩琴，建立了以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名义首脑的独立政府。

对由苏联控制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八世哲布尊丹巴从一开始就表示出不信任和反对，在他们驱逐恩琴军队，进入库伦之时，他便发布文告，要求跟随革命党的牧民放下武器回家，“勤勉工作，帮助国家和宗教”，并明言“最后一批恩琴残匪已经由库伦逃走，国内已恢复了和平和秩序，因此似乎没有什么理由把军队开进首都，并且不需要建立新政府。”可蒙古已经处在“人民革命”的状态下，他的文告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

之后，新成立的蒙古政府发生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包括萨吉喇嘛领导的武装暴动、政府总理鲍道与中国军阀张作霖暗中联系，希望他出兵外蒙古等等，而这些活动的背后，都有八世哲布尊丹巴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是，在苏联的铁拳之下，八世哲布尊丹巴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流于失败。1924年5月，54岁的八世哲布尊丹巴突然圆寂，虽被称为寿终正寝，但也有传言，他是被新政府用毒杀的方式秘密处决的。在他遇害6个月后，外蒙古君主制被废黜，“蒙古人民共和



↑ 2015年7月18日，位于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南门峡镇本朗扎西滩(却藏滩)的皇家寺院——却藏寺举行了七世章嘉国师金身安座开光法典，在阳光普照之下，降降甘霖，天呈瑞相，喜迎章嘉国师回故乡。

国”宣布成立。而到5年后，蒙古国政府正式宣布中断哲布尊丹巴的转世。

当八世哲布尊丹巴在洪流中全力挣扎时，七世章嘉则相对顺风顺水。章嘉与哲布尊丹巴不同，他虽是内蒙古最高宗教领袖，但历世章嘉均以国师的身份常驻北京，并没有如哲布尊丹巴在外蒙古一般与内蒙古的教民有着割扯不断的紧密联系；而其地位的尊荣，完全在于中央政府的扶持，要想继续享有“国师”的地位，就必须与中央政府互动，至于这个中央政府是清朝皇帝还是民国总统，都并不重要。

1912年，外蒙古库伦政府宣布“独立”，并传谕内蒙古、新疆及青海各蒙旗，要求他们“一体归顺”。内蒙古王公中多有响应者。北洋政府一面召开“王公会议”进行安抚，一面也请七世章嘉出面对内蒙古各旗进行劝导。七世章嘉早就发表声明“赞成共和”，见中央政府需要，立即不辞劳苦，出面劝导王公们放弃独立主张。为酬其功，袁世凯于1912年10月，

加封七世章嘉为“灌顶普善广慈弘济光明大国师”。章嘉系统正式从大清帝国的国师转变为中华民国的国师。

待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为中国的中央政府，七世章嘉第一时间遣使致贺，表示拥护。而国民政府也投桃报李，1929年在南京设立“大国师章嘉呼图克图驻京办事处”。1930年更任命七世章嘉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1932年4月，国民政府又任命七世章嘉为“蒙旗宣化使”，委以劝导内蒙古服从中央的重任。而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七世章嘉的“蒙旗宣化使”更进一步开始宣传民族团结、御侮图存。

“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河北、山西，七世章嘉的驻锡地五台山也暴露在枪炮之下。日人对之多方威逼利诱，希图将之控制在手中。而七世章嘉不为所动，跟随国民政府辗转各地，宣传抗战，其作为被誉为“八年抗战期间，大师站在佛教立场，翊赞抗建大计，号召蒙藏同胞，贡献良多”。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七世章嘉的功绩，国民政府加封“护国净觉辅教大师”尊号，并继太虚法师之后当选为全国佛教会理事

长。不但宗教地位登峰造极，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1947年行宪国民大会时当选为国大代表，194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

然而，抗战的结束并非动乱的结束，而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始，国共之战随之全面展开，已经元气耗尽的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不过三年时间，江山易主已成定局。

七世章嘉也面临着八世哲布尊丹巴当年的困局，一向无论中央是谁都尊奉之的七世章嘉这一回却改变了“一定之规”，对国民党政府不离不弃，于1949年从成都乘机飞往台湾。在他身后，内蒙古的法座汇宗寺已于1945年被苏联红军烧毁，青海的法座佑宁寺于1966年被毁。

只是七世章嘉没有想到，今生自己比哲布尊丹巴幸运，但在后世，哲布尊丹巴可以重返故地，而自己却只能漂泊异乡。

杂志惠 zazhihui.net 哲布尊丹巴世系的恢复

按说，哲布尊丹巴系统的断绝比章嘉系统更早，境况也更为糟糕，为何在章嘉已无望重铸辉煌之时，哲布尊丹巴却能绝境逢生呢？而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曾是外蒙古的蒙古国已经宗教信仰自由，又为何迟到2011年，九世哲布尊丹巴才能回到自己的法座呢？

1924年八世哲布尊丹巴圆寂后，虽然

此时，九世班禅因为与十三世达赖关系破裂而流亡中国内地，在得到申请后，认定了灵童。但十三世达赖则认为，按照前清旧制，哲布尊丹巴除一、二世外，其余六世都在藏区转世，因此没有认定。

蒙古僧团的活动，使得蒙古国政府颇为紧张。1925年发布通告，指出转世灵童的父亲是应该被消灭的世袭贵族，这等于宣布了灵童的不合法。1929年2月，蒙古国政府正式作出决定，宣布从即日起不承认任何活佛的转世。

到1930年，蒙古政府干脆将进行寻访和认定灵童的首脑人物判处死刑，参与者则判处徒刑，彻底封死了僧团恢复哲布尊丹巴系统的希望。及至1937年，蒙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大规模屠杀新政权的“反对者”，而喇嘛僧团更被作为主要目标予以消灭。据不完全统计，肃反中摧毁寺庙797座，处决喇嘛20356人，到1939年时，喇嘛阶层和寺庙组织被彻底消灭。

而在这腥风血雨中，那位被指认的灵童却奇迹般地幸免于难，直到1948年去世。

蒙古僧团被消灭，灵童泯于众人，但哲布尊丹巴系统不仅是外蒙古的宗教领袖，也是西藏哲蚌寺的法主传承者，西藏僧团自然不能袖手不管。

1936年，就在蒙古僧团的种种努力都已宣告破灭之时，西藏僧团选择1932年出生

布尊丹巴的消息并未对外宣布。

1947年，热振活佛在政争中失败，被拘禁后神秘死亡，其追随者遭到残酷镇压。恩师的死亡使得索南达扎失去庇护，为了避祸，他流亡印度。在印度期间，索南达扎生活拮据，为了生计被迫还俗，直到1986年才重入佛门。

1991年苏联解体，蒙古国也实现了民主化改革。是年9月20日，索南达扎在印度被确认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并于第二年举行了坐床大典。

坐床典礼后，蒙古国政府获悉九世哲布尊丹巴在印度，反应不积极，但民间的各种活动却广泛展开，就有关九世哲布尊丹巴的真伪问题，举行了各种学术研讨会。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组织了“博格多基金会”，筹资修缮哲布尊丹巴宫寝。

1995年，蒙古14个寺院联名向政府上书，要求允许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没有得到批复。1996年，蒙古宗教界想邀请九世哲布尊丹巴访问蒙古，但被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转世仪轨尚不清楚为由拒绝。1999年，九世哲布尊丹巴借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之机，以普通游客身份取道进入蒙古，并在甘丹寺等地讲经，但很快被以签证过期为由强迫离境。

在返回蒙古屡屡受挫的情形下，九世哲布尊丹巴只能在俄罗斯的各藏传佛教地区布道，并获得巨大成功，仅在2003年，便给13万人进行了时轮金刚灌顶。这对蒙古的佛教徒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而对蒙古政府，则是巨大的压力。

压力之下，蒙古国政府终于在2010年授予九世哲布尊丹巴蒙古国国籍，并在2011年承认其为蒙古国佛教领袖。

哲布尊丹巴系统回乡之路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仍历经坎坷，而章嘉系统面临的问题要更为繁琐、复杂，要回归其法座，恐怕是难以期冀的，至于重新获得“国师”的称号，则更显得虚无缥缈，如天方夜谭一般了。

及至1937年，蒙古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据不完全统计，肃反中摧毁寺庙797座，处决喇嘛20356人，到1939年时，喇嘛阶层和寺庙组织被彻底消灭。

蒙古国政府宣布废除君主制，但僧团的喇嘛们仍然在博格达汗乌拉省(现色楞格省宗哈喇县)找到一个名为图德布·罗布桑道日吉的男孩，将之选定为八世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并向达赖和班禅申请认定。

于拉萨的蒋巴南卓·确吉坚赞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但此时十三世达赖已经圆寂，九世班禅仍流亡在外，因此只能由摄政热振活佛进行了认定，法名索南达扎。因为不符合宗教仪轨，索南达扎被认定为九世哲



1982年河北省定县元光大队对领取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家庭给予表扬和奖励。

马寅初为何提出计划生育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人口正处于高速增长中。这个增长率让不少决策者都感到忧心，周恩来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中就说：“这样一个增长率的供应问题，却是我们一个大负担。”

1954年，中央不少领导都明确改变了对节育的态度。依据邓小平的批示，卫生部关于避孕、堕胎和绝育的限制都出现了松动；而刘少奇更明确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经济没有发展起来，不节育是无法解决困难的。”在众多支持控制人口的声音中，马寅初把工作做得最细，他进行实地调研，并提出了政策建议。著名的《新人口论》，也是响应1957年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倡计划生育的规定而写就的。

毛泽东起初也赞同计生。1957年2月，他讲到：“人类要自己控制自己……实现有计划的生育。这一条马（寅初）老今天讲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正是因为毛的提法，“计划生育”这个新用语才被纳入正式政策。然而，一年后，毛泽东改变了看法，认为六亿人口是赶超资本主义大国的决定因素，马寅初和他的理论也因为先前的出挑而遭到批判。

九一八“不抵抗”缘自军令不通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以几百人进攻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几乎未作抵抗，悉数撤出，成就了日军占领沈阳的阴谋。个中原因，后人一般归于9月6日张学良从北平发给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报，指示无论日人“如何寻事”，东北军都要“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但据事发时北大营中的最高级军官320团团长王铁汉回忆，张学良并未指示东北军放任日人占领。荣臻第一次向其请示时，日方只是在营外开炮，没有其他异动，张学良以为日军演习司空见惯，遂令保持原有策略。等到日军大举进攻，电话线已被他们割断。虽改用无线电发信，但报

告辗转送到张氏面前，已是日军完成占领沈阳之后了。

整个军事异动过程中，沈阳军政负责人员都只是消极执行原有命令，未作权宜调整。若张学良可以坐地指挥，或明确将应变权力授予一线，会不会还是任由日军占领，并非一件十分确定的事情。

李鸿章预测戊戌变法的前景

1895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造访李鸿章，与之谈及变法维新。已经失势的李鸿章赞同变法，但联系自己的处境，对变法前景的预判极为悲观。

李鸿章对李提摩太说：“掌权的大臣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我倒看过几次。

京中大僚都称西学为鬼子学，所以人不肯研究。现在的八股考试，实在不得人才正用。从西国留学回国的学生，政府不肯优予位置，叫他各尽所长……现在政权在守旧派中，所以稍明新学的官员，得格外小心，不敢畅言新法。即使有新

主张，新政见，也作不成什么事功。”

尽管认定变法前景黯淡，李鸿章还是一度想要捐银两千两给强学会，以支持他们的变法之心。而强学会视他为“卖国贼”，拒绝接受其捐助，他才开始对维新分子发生恶感。



李鸿章对李提摩太说：“掌权的大臣绝不知道西国的情形，没人肯看《泰西新史揽要》”。

刘湘在世时，川军军长只是闲职

1937年3月，黄埔二期出身的刘子清奉调44军政训处长。44军是川军刘湘属下部队，军长王瓚绪，刘子清来到成都军部，发现这里完全就是个挂名机构。

他描述道：“军长管不着部队的事，部队调到哪里去了他也不晓得。刘湘直接要掌握的是旅、团长，次之是师长；至于军长，不过给他一个官位，让他安插一些亦官亦商的亲戚和旧部，按月分领一点民脂民膏罢了。”

没有实权，军部的办公当然也只是走走形式，各处主官去签个到，私人有事就走，无事就坐下来“冲壳子”（聊天）。刘子清说，军部的人一般上午聊女明星、命相学、生意经、麻将和鸦片烟，“有时也偶然想到国事，谈谈报纸上的消息，以及交换一点内幕新闻。”下午，就多半是打麻将、赶宴会，然后到私娼那里去玩玩。

九三炮战吓退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上台之初，对国民党政府占领金马大陈等外岛持支持态度。不但将美军顾问团送往外岛，协助台湾的骚扰行动，还数次策划让第七舰队访问外岛，以向中共展现实力的方式，既维持美国在远东的威望，也回避台湾对“协防或支援外岛”之正式承诺的要求。

不料，1954年9月3日，中共从厦门展开对金门的猛烈炮击。艾森豪威尔的观点立刻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从一个月前支持前太平洋区司令雷福德“威望论”，变成“金门除了心理因素，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反过来指责协防外岛就是挑动战争。艾氏明确强调

金门炮战是国共双方陆海空军迄今最后一次大规模较量，自此之后，双方的军事冲突仅维持在海上并逐渐减弱。图为1950年代，应对大陆炮击的国民党炮兵。



称，民众写信一直问他：“为什么我们要担心在那里（外岛）的黄种人遭遇到什么样的命运？”因而，避战才是重中之重，加上李奇微等提出冲突很容易引发大战乃至核战，美国总统干脆来了句“就算台湾丢了，我们也不会

因此而放弃整个太平洋地区”。

艾森豪威尔还说：打蛇要打头，如果真的非要面对战争不可，他也是宁可打苏联，不想打中共。

情非得已，势所必然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

文 / 许章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2015年9月20日，北大法学院，许章润先生在“法政速成科与中国暨《法政速成科讲义录》、《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首发式”上发言，本文据现场速记稿整理。

日本“法政速成科”，一个百多年前的教育设置，今日借《法政速成科讲义录》与《法政速成科纪事》刊行，再度复活于眼前。考其源流，为时不过五载，前后受教约莫千人，本为一临时体制。然而，当年东瀛的这一教育举措，生发于中日国力逆转，华夏青黄不接、风雨飘摇之际，然则因缘际会，生聚作息，又非一临时体制所能道尽，亦非其所能预料。今日回瞰，其间转折，情由因果，真可谓“情非得已，势所必然”。故而，此时此际，对于吾辈华夏后人而言，一卷在手，沧海桑田，不禁浮想联翩，言有尽，意无尽。

法制史学 厥功至伟

如两位前辈学者杨一凡和李贵连先生所言，历史研究的要义不仅在于保存人类记忆，陶冶历史意识，涵养鉴往知来的判断力与慎终追远的健全理智，从而慎重当下、尊重人生，对亿兆苍生，其生计，其悲欣，多所体贴与同情；而且，在于经此作业，砥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趋向善好的漫漫进程这一光明心态，于丰盈人性中造福人生。从而，历史和历史研究，既是在为人世奠基，更是在为人生立法。

就此而言，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其所陶养之历史意识和历史精神，其于

一般学术研究和学人，无论是个人的学养意识，还是整体的民族文明的成熟，均具有基本意义，先于一切知识和理念形态。如果说华夏邦国历来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中国文明是一种于历史脉络中含蕴温情与敬意的生存论，则史家与史义，构成了我民族与文明之魂灵也。

远观近看，晚近百多年，若以制度建设论，则最直接而实用者，为各种部门法知识。在此层面，其之贡献最大，成效彰著，不言自明。但是，一整套法律体系不仅架设于具体部门法制及其法理之上，同时，还蕴含着特定价值理念，导源于特定的思想体系，由此成就既有法制之身心。正是在此，部门法学概为一种知识体系，本身学术含量较低，思想含量更低，因而，难以提供此种思想理念。同时，就百年中国而言，由于它是一个舶来意义上移植的法学知识体系，一时间不遑中国文明语境下的更新创造，只能照搬，力争吸收，因此，它只具有制度建设意义和知识传播意义，而无思想建设意义，也不可能有多少学术与思想创新的可能性。

这就是为何置身中国法律文明语境，百

多年里，包括晚近三十多年来，具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的，多半是法治史研究，以及少量的比较法治、比较法律哲学以及法理学意义上的著述。我这样说，可能部门法学的同行不一定同意，但这是事实，真心感受，不得不说。不过，纵便言及法制史研究，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史料整理。早年张伟仁先生整理的清代司法档案资料，稍后杨一凡教授整理刊行的中国法律古籍珍稀资料，以及李贵连教授师徒整理的诸多材料，包括今天刊行的这套《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等等，足以撑得起这几十年大中华地区关于法律文明建设的史料要求，厥功至伟。

是的，百多年来，汉语学术以历史研究，包括中国法制史研究，厥功至伟。遭临危急存亡之秋，以唤醒历史意识和文明自觉为职志，而对中国历史以及比较文化视野中的历史概予梳理，而展现出中国文明的顽强生命力的，概莫历史研究，包括法制史研究。就中国文明之经磨历劫、贞下起元而言，历史学家厥功至伟。一百多年来的现代汉语学术，真正因其学术思想和文化价值而存留至今，并将成为中国文明一步一个脚印之基础者，恐怕也以史学最为显著。

实际上，比较而言，一百多年来的汉语法律学术，迄而至今，真正既具有资料价值，又具有知识价值，同时还具有思想价值的，多半也是法制史法律思想史著述。这就是为何今天我们翻阅蔡枢衡先生的著述，其有关刑法、刑诉和监狱法的部门法论

法政速成科：1904年日本法政大学为清朝留学生专门设立，存在仅三年时间，却吸引了晚清诸多科场名流、旧式私塾俊彦，如杨度、刘春霖、朱汝珍、夏同龢、张知本、朱执信等，为晚清民国培养了许许多多的政法精英，如汪精卫、宋教仁、胡汉民、汤化龙、陈天华、沈钧儒等人，成为影响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杰出人才。

述,充其量只在提供学术史样本的资料意义上,享有史料价值,但却不再具有知识价值,更无思想价值。毋宁,蔡先生有关中西交汇之际,清末变法修律的法制史理述和法哲学论述,依然并且仍将具有参考价值。所以,这一条不仅是学科分际的结果,也是不同学术分工所担负的不同思想使命和知识担当这一固有本性使然。

法学院的学徒,无论天资如何,其以理论思考为职志,却无法法律史修养和历史意识,则落于不着边际,所谓“空头理论”,便在所难免。说是“空头理论”,其实难言理论。想一想吧,既无形上支撑,亦无爬梳资料功夫以资说明,更无内在理路,特别是问题意识阙如,不过东拉西扯,怎会有所谓理论呢?!而理论和理论性思维,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之需,为汉语法学所缺。再说,即便奠立于某种形上学理之上,但就法学而言,不能通过历史之眼检验,也只是沙上筑塔,一击隳矣。所以,百多年来,华夏法意积劳积慧,虽说历经五代,第六代法学共同体亦且浮出水面,但于法哲学方面尚无特别卓

越之体系性原创贡献,此为原因之一。

想当年,遭临“东西文化冲突”与古今之变,萨维尼在《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这部历史法学的奠基之作中,就曾喟言,对于法学家来说,有两种最为主要的禀赋,也是养成法学家最为重要的素质:一是历史意识,一是政治意识。

所谓“历史意识”,或者历史素养以及历史方法,概为基于法律史和文明史而涵养的文明自觉,一种瞻前顾后的文化判断力,落实于法学,表现为关于法的历史品性的法学认识;一种表现为历史理性的法律理性。毕竟,如笔者曾所论述,历史意识是人类的基本心智,也是一种普遍人性,在某些历史学家看来,甚至于是唯一的人性。

所谓“政治意识”,或者“政治感”与“系统眼光”,其实讲的是关于文明自觉与家国天下,特别是对于它们一体关联之内在逻辑的切身体认和清醒意识。经此理论武装,用萨维尼的原话来说,知识和思想获得了“在一个国族范围内前瞻未来中评估时代的能力”。凡此两端,非古非今,恒古恒

今,对于一切法学从业者,包括今天的中国法学家,永具警示意义。

我个人的学习研究也可以为此作证,相信在座列位均有同感。这一百多年,近代中国的大转型,千头万绪,不外是一个“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的历史进程。不管身役教书匠,还是心雄万夫的先贤志士搬弄大经大法,均绕此打转。所谓“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所奋斗,不外乎此。其间,“双元革命”,即建设“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建设“民主国家-政治立国”,堪为重中之重,颠覆不破。所谓“现代秩序”,实际上,正是“双元革命”的结果。它们二元一体,双峰并立,造成现代秩序,蔚为晚近三百年间全球范围内最为宏大的人间景观。换言之,通俗所谓建设“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的新中国,其义理结构,概莫如此。

此一进程始自1860年代的洋务运动,继之以1898年的戊戌维新和1902年的变法修律,迄“1911”,终于初成善果。虽说歧路漫漫,今天依然人在途中,但是,不管怎么讲,这一大方向,却百折不回。就此而言,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让我们了然于自家的身世背景,教会



1906年(明治39年)6月23日,
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毕业纪念。

留学法政速成科的部分学生



杨度 (1875—1932年)
政治活动家, 筹安会理事
长, 后秘密加入共产党



沈钧儒 (1875—1963)
同盟会成员, 后发起成立
救国会、民盟



陈天华 (1875—1905)
革命家, 著有《猛回头》
和《警世钟》



居正 (1876年—1951年)
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
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

我们“以文明立国”和“以政治立国”这一双元革命的文化正当性与政治的文明担当, 正得益于历史, 并正在成为历史。

负笈东洋 情非得已

《法政速成科纪事》收录的若干原始资料, 饶有趣味。例如, 1904年(日本明治37年)法政学校校长梅谦次郎在首届学员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即为一则。其中几段话, 今日读来, 感受尤深。在他看来, “迩来清国深感输入新知识之必要”, 而且, “频繁引入新知”, 盖因“情非得已”。可见, 当时的东洋人对于大清, 对于衰败的清国, 1904年风雨飘摇的清国, 看得很透。因而, 两年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上, 才有教员代表志田博士致辞中所谓“清国长夜梦觉, 现正欲行一世界性大飞跃”这句话, 也才有其时学监乾学士告别辞中“获取新知, 明确清国居于世界何种地位”之告诫。

此梦并非当日才醒, 否则, 哪有“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清醒自觉。其实, 早此十载, 大清北洋水师葬身鱼腹, 而且, 为

蕞尔小国所灭, 即已唤醒四万万。要不, 也不致于到速成科来混。苟非如此, 生存堪忧, 今天我们就不会在此刊行史料, 并且集会研讨了。只不过, 彼时彼刻, 世艰势蹇, 愈见其迫而已。而日人目睹情势, 以过来人自居, 以身作则, 亦非始自当日。

早在1895年1月20日(日本明治28年), 侵华日军舰队司令伊东佑亨, 在致北洋水师丁军门汝昌的劝降书中, 就已作此陈述。大意谓, 三十年前, 日本如此, 为洋人所欺, 被迫取法西洋; 今日清国重蹈日本之覆辙, 惟有引入新知, 埋头苦干, 忍辱负重, 才能有将来抬头做人、比肩并立之日。“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 固非君相一己之罪, 盖其墨守常经, 不通变之所由致也。”由此, “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 亟从更张, 苟其遵之, 则国可相安; 不然, 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

职是之故, 今天读到梅谦次郎的这句话, 反复掂量“情非得已”四字, 实在是百感交集。所谓“情非得已”, 并非只因施行新政, 人手不够, 以至行政无法展开, 立法不得完善, 故尔才需培养新政施行之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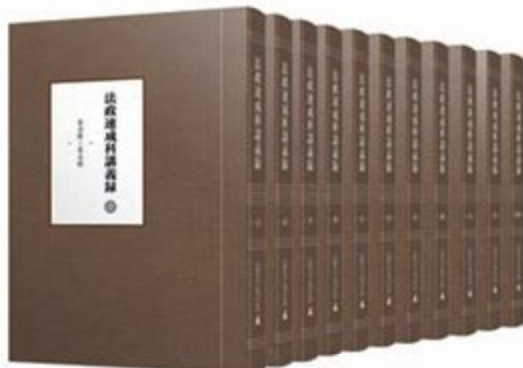
其为原因, 但属表浅原因。更主要的缘由在于, 整个亚洲, 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 面临西方强势之际, 不得不向自己的敌人, 那个武装到牙齿打过来的侵略者学习, 强令转变生活方式和理念价值, 这才是“情非得已”之所在。所以, 学习西方也好, 效法东洋也好, 在大历史看, 势所必然, 例属文明传播的常态。但于当事人而言, 则在在“情非得已”, 是以羞辱来洗刷羞辱。

情非得已, 事到临头, 只好如此, 朋友, 不在其间, 不知其难嘛! 对此进程, 以及更为广大之现代转型, 在下曾以“法意阑珊, 不得不然”概述, 同样有感于此而发, 其意在此。时过境迁, 从普世主义眼光来看, 说实在话, 有什么你的我的, 但凡有利于立国立宪立教和立人, 有助于亿兆云云过好生活, 不讲你我, 不讲东西, 不讲古今, 拿来便好。

梅谦次郎并且以同文同种同教立论, 概述留日习法的便利与“正当性”。如其所言, “清、韩自我邦取获文明, 比诸取自语言全异之欧美, 利便实甚”。尤有甚者, 在他看来:

况风俗、人情相似, 我邦始终以孔教立国, 故道德标准多所相同。其他风俗人情一致者, 亦所在多有。且考诸地理, 比邻之国, 一衣带水。故从距离、风俗、历史、人情任何一点观之, 从迥异之欧美获取新知, 皆不如从我邦获取便利, 固无待鄙人多言也。

不宁唯是。可能, 同样在他看来, 更为主要的是, 此刻的日本文化原就是由“日本固有文明”与汉文明相融而成, 又经输入欧美文明, 裁长补短, 几经调和实行, 至于今日, 方始适于生聚, 而得正果。换言之, 这是一个更新



近日, 日本法政大学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纂的《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中译本及法学家李贵连、孙家红编纂的《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曹汝霖 (1877—1966)
清末民初外交、交通高级官员



宋教仁 (1882—1913)
革命家，国民党的主要筹建人之一

整个东亚，太平洋西岸，蔚为一个文明共同体，曾经同时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此而言，晚清西法东移进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期然间，为此续添一笔，共同见证了那个东亚转型时代的风雨沧桑。

之后的新文明，也是一个足以自立之强悍文明。这才是根本原因所在。至此，旧日古典中国文明的学徒，今日涣然而为先生，时代在此节骨眼上变幻莫测，恍兮惚兮。

这一点，当年日本人并非自吹自擂。不仅这是对于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延聘法兰西学人东瀛授课的做法之如法炮制，而且，更在于经此努力，终于一战而灭北洋水师，也就是挫大清，二战而溃沙俄，也就是拼列强，所以才这般自信。是的，若非举国上下用功，加上效法西洋帝国主义的蛮横，是混不到这个份上的。

文化共通 势所必然

展卷抚读，其中一篇致辞耐人寻味。特此拈出，同赏而共商。此即1905年第一届学生毕业、速成科教师代表治田博士的“祝辞”。其间心情、语次和顿挫，与一年前梅谦次郎校长的开学致辞，不乏呼应，似又转进一层。

治田博士申言“东亚团结”，告谓黄种人当携手并进，以对抗西洋诸国白色人种的压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起承于“政治冰人”与“学术冰人”之分别，而转合以人种始、大同终的憧憬，仿佛策弩砺钝，似乎砺世磨钝，但激于世变，总有来由，亦称恳切。

原文不长，综理要点，意莫如此：

抑人种与人种之关系，为今日世界大问题也。日清两国国民应相互提携，以对抗西洋诸国人种压迫。遥远将来，此人种对人种问题必一扫而光。世界万民，同一交际，所谓同胞，于斯可见。吾等日本人，与占黄色人种大部之清国，携手并进，堪以对抗西洋诸国所谓白色人种压

迫，以期世界进于大同。将来诸君建设祖国，自小处言，乃为东洋各国民之利益，自大处言，即为世界人民之福祉也。

此间转折，不仅以近世东西冲突为背景，而且，含蕴三种意识，其之深刻影响20世纪的东亚和世界，绕不开，必须直面回应。虽客愁千里，而剪不断，终究要理清，终究要回应。此即种族意识、东亚意识和世界意识，以及基于全人类规模的大同理想。

种族意识适应于并推动着近世帝国主义的成长，在1884年欧洲做出瓜分非洲的决定后，更且甚嚣尘上，最终蜕变为种族主义，一定意义上，构成了欧洲语境下现代极权政治的主要理念源头。其势汹汹，横扫世界，涂炭东亚，逐渐发酵的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扩张主义国家政治的背后，可见其影响之一斑。换言之，日本明治维新以还，急起直追，以西洋帝国主义为效法样板，犹有过之，有以然哉，所以然哉，却不能减免其罪其孽。

在文明论意义上，整个东亚中日韩三国，同文同种，而且，一度同教，终亦必同教。走到今天这一步，蜂目豺声相对，是历史之大不幸。曾经的加害方，政客们居心叵测，无廉耻。居高位者，心胸狭隘，囿限于草根式民粹，难以超脱国族格局，不识大体。网上僇论，砍砍杀杀，尽皆不堪。当此之际，知识分子需尽到提醒的责任，既不忘民族苦难与文明浩劫，另一方面，展现原谅道义与和合心肠，不因历史而牺牲未来。

说到底，整个东亚，太平洋西岸，蔚为一个文明共同体，并且应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其间，借由盛唐以还古典中华法律

文化的传播，其实曾经同时还是一个法律共同体。就此而言，晚清西法东移进程中之“法政速成科”，不期然间，为此续添一笔，共同见证了那个东亚转型时代的风雨沧桑。因而，东亚法律共同体是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固有一环。

凡事初衷与效果，常有差距。逮至1905年科举遽废，举子功名无着，青黄不接，因而，纷渡东瀛，一时间，法政速成科来源嘈杂，法政学堂遍地开花。一年之期，徒有皮毛，虽说留学，实则多半唯《新民丛报》马首是瞻，拿个结业证书，换身铠甲而已。一旦回国，口口声声民主自由，而行止不堪，乃至新旧失守，自在意料之中。杨国强先生缕叙清末地方咨议巨细，阐说“新学生社会相”，即曾多所诟訾。所谓“归国留学生之为朝官者”，其实既无新知识，亦无旧道德，则摧枯拉朽之下，“斯文一脉横决而出，流入天下滔滔之中”。而个中缘由，无可收拾，同样又是一个“情非得已，势所必然”也。今日叙及晚晴，婆婆讲义，联想至此，顺带说出，以为补充，遥念此间之万般无奈，而为此大转型时代之难上加难，竟至于最终之血流成河，仰天一叹！

至于将留学生贬得一钱不值，甚至以汪兆铭之投日叛国为例，影射近代中国大规模留学运动之窳劣，说明对此“情非得已，势所必然”缺乏体认与同情，表明一旦历史意识和政治意识阙如，结果不堪。至于如此陈词，其心态是否不免狭隘，或者，过于阴暗，则又当别论，非刻下话题所当泛论者也。

专访英国国家档案馆馆长与赫里福德教堂大主教 被误解的英国《大宪章》

记者 / 李克难

作为英国《大宪章》800周年全球巡展的重要目的地,在中国的展览包括北京、广州、上海、重庆四站,可谓其全球巡展的重点。

1199年,名声显赫的“狮心王”理查一世去世,弟弟约翰与侄子亚瑟开始了对王位的争夺。约翰夺得王位,但在法国领地与法王菲力二世的战争却节节失利。为了夺回在法国丧失的领地,约翰在英格兰国内大量增加税负,从而激起英格兰贵族的反叛。1215年,在贵族的胁迫下,约翰签署第一份《大宪章》。

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并非唯一的版本。事实上,通过《大宪章》钳制国王权力在一开始便并不成功。当参与叛乱的25个贵族离开伦敦后,约翰王迅速宣布此前签署的文件作废,内战再起。但约翰王不到一年便去世,留下其子继承王位成为亨利三世。年幼的新王在众人的辅佐下于1216年、1217年两次颁布修改过的《大宪章》,才最终终结了内战。到1297年,《大宪章》的最终版本出台,并一直成为英格兰与威尔士的法律,直到今天其中少部分条款仍然有效。

在约翰王之后的800年间,《大宪章》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其法律本身的效力。这份英国王室与封建贵族关于政治权力分割的协议,成为英国宪政法治观念与君主立宪体系的象征。

据赫里福德大教堂档案负责人夏洛特·贝莉介绍,此次参加全球巡回展出的是1217年版的《大宪章》。这份藏于赫里福德大教堂的抄本是现今世界上仅存的1217年版之一。现今1215年版的《大宪章》还保留4



此次在中国巡展的1217年版的《大宪章》抄本,现藏于英国赫里福德大教堂。

份,1216年版则只保留一份。

在记者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长克里斯·伍兹和赫里福德大主教卡农·克里斯·普林神父的对谈中,两人认为,《大宪章》今天的声望脱离不了此后的革命运动中对这一古老文件的多次再诠释。

《大宪章》原为重申旧制度

记者:《大宪章》为什么在英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要知道,即使在同时期的欧洲,也不乏和《大宪章》性质相似的国王与贵族关于权力妥协的协议。

普林:非常好的问题,我也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匈牙利历史上也有1222年《金玺诏书》这样的文件,为何只有英国的《大宪章》

能受到如此多的关注,获得崇高的地位?某种程度上,《大宪章》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件,象征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我个人猜想,这一定程度上与英帝国后来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有关。

另外,美国《独立宣言》对《大宪章》的引用,也是《大宪章》获得声望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大宪章》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宣扬什么新的观点,而是对旧有制度安排的重申。它只是当旧有制度受到国王权力威胁的时候,人们让国王对旧有制度再次确认。

记者:在美国与法国历史中,受人推崇的文件都是革命时期所著的文件,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但在英国,并非什么革命时期的文件,而是《大宪章》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封建文书成为了标志性文件。这是为什么?

普林:在17世纪,《大宪章》在英国革命中变得重要。当国王希望能超越法律之时,人们的眼光投向《大宪章》。而当斯图亚特王室国王被处死,换上汉诺威王室后,人们也希望新上台的王室能遵守《大宪章》所定下的对王室的限制。或许,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大宪章》中什么最重要进行了重新诠释。因此,《大宪章》也被附着了一种革命的意涵。当约翰王颁布《大宪章》之时,英国国王与贵族间进行的战争本身也可以被看作一次革命。

伍兹:尽管美国革命时代与《大宪章》签署的时代天差地别,但我们也不妨将两者比较一下。在约翰王时代,一方面是从12世纪诺曼征服开始一百多年,一个从欧洲大陆移植的封建经济体系,逐渐侵蚀并凌驾于原有的撒克逊社会之上,这在英格兰

产生了长期积怨；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面对着一个日渐变得专制的王权，不断通过税收和封建义务，使其臣民贡献一切来完成他们的野心。尽管贵族们的既得利益是他们揭竿而起的重要动因，但我们也不应低估这些背景的重要性。当人们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趋势而希求改变，内战与《大宪章》的革命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记者：然后以一种英国式的方式进行这场革命，即是通过以保护旧有秩序之名来进行？

普林：是的，英国总是以一种安静的方式进行革命。我们也曾让国王的脑袋搬家，并建立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政体，但这个政体本身并不受欢迎，人们又重新希望迎回原来的体制。

伍兹：在过去三四百年里，我们没有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动荡，但在这之前，从蛮荒时代到16世纪的数百年间，英格兰经历了各种剧烈的社会动荡，而到16世纪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则已经逐渐稳定下来，过去的动荡因为年代久远而被逐渐遗忘。这种稳定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其中很重要的要归功于议会，而英国议会政治的建立离不开13世纪《大宪章》所确立的基础。

对《大宪章》的认知偏差

记者：我念书的时候，曾学到《大宪章》奠定了英国法治精神的基础。但当我真正读到

某个任命需要被取消云云。它也提到了“自由民”，但那只是指占1%人口的人。对于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则只字未提。

伍兹：历史背景非常重要。《大宪章》里有诸多要求退回到撒克逊时期封建义务的规定，其中无不反映当时的封建贵族利益。比如《大宪章》里看似进步的寡妇继承权，事实上来自于当时大量贵族为了服从于约翰王失败的法国战役和十字军东征而死在战场，家中土地继承权出现法律空白的背景。

普林：《大宪章》中对森林使用权全民所有这条古老规则的重申，即使在今天也有积极意义。在当时，相当多的平民生活仍然依赖打猎，而一旦王国内的森林全部成为王家的御用猎场，将会让众多人的生计出现问题。擅自闯入王家的土地则会被处决。

伍兹：到近年，才在联合国颁布的《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中，将对土著居民生计有关的自然资源给予保护写入国际公约。我们从《大宪章》中看到，二十多个贵族将符合他们利益诉求的条款加之于国王，这些内容的做出并非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但结果却是一致的。

记者：《大宪章》的内容与大众对它的认知，是否存在相当大的距离？

普林：的确如此。人们以为关于人权、言论自由等等都能在里面找到，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宪章》被认为是对人类政

章》时，并非通过《大宪章》中的具体内容，而是通过《大宪章》内容中所隐含的精神来论证。同时，爱德华·柯克也是北美弗吉尼亚殖民地宪法的起草者，他因此将《大宪章》的精神写入其中。

这些后来又成为美国《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的基础。《独立宣言》与《权利法案》才算得上是真正对个人权利神圣性宣誓的文件，但它们都将《大宪章》作为它们的先例。因此，经过这两番的诠释和借用，人们心中的《大宪章》与现实中的《大宪章》逐渐有了距离。例如，一位美国学者曾称《大宪章》是多数人针对少数人权利的保护，而美国权利法案和宪法则是少数人针对多数人权利的保护。

记者：英国如何维护《大宪章》的精神？

普林：事实上可以说，相对于英国，美国更好地贯彻了《大宪章》的精神。在美国，国会与总统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政府和行为，可能因为合宪性问题受到最高法院的质疑。而在英国，国会可以“制造”法律。由于没有成文宪法，法院不能通过合宪性问题来制衡国会的法案。在第一份《大宪章》，即1215年版本的《大宪章》中，曾有一条所谓的“安全条款”，即任命25个贵族组成委员会来监督约翰王的所作所为，保证约翰王没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这条规定后来被取消，但这个25个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看作是最早的“最高法院”。

伍兹：我们的权力制衡设计更加隐秘微妙。当一个法案在国会通过，政府为了让法案得到落实，需要制定相关程序细则，而这些细则会相当复杂深奥。一旦有案件涉及相关法律并上诉到法院，法院则会抓住机会，决定这些程序条款是否符合法律精神。相对于英国的这种监督方式，美国的制度更透明可见。

《大宪章》与民主的关联

记者：英国人对《大宪章》的尊崇，是否达到美国人对《独立宣言》的尊崇的地步？

普林：似乎还没有那样。最近对《大宪章》的兴趣是从去年才开始的，也是从《大

从16世纪的都铎王朝开始，英国政治逐渐稳定下来，这种稳定一直维持到今天。这其中很重要的要归功于议会，而议会政治的建立，离不开13世纪《大宪章》所确立的基础。

《大宪章》原文时，却发现《大宪章》事实上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宣言非常遥远。

普林：是的，事实上它并没有说那些人们以为它要说的东西。它只是说了一些现代人看起来觉得很奇怪的东西。《大宪章》本身首先只是一个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和平条约，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涉及到比如约翰王的某个决定被视为对民众的恶意，约翰王的

治发展有着分水岭意义的标志性文件，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

记者：出现这样的认知差异原因何在？

伍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17世纪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曾用《大宪章》作为证明詹姆斯一世与查尔斯一世没有权力解散国会的依据。他在引用《大宪



宪章》巡展开始的。如果你要问他们《大宪章》是什么，他们也说不出个头绪。人们只是相信这个东西很重要，却不知道它实质是什么。

伍兹：对21世纪的人来讲，《大宪章》的内容太晦涩难懂，它对现代人的意义在于，对《大宪章》所代表的原则的重申。

普林：在“9·11”等一系列事件之后，英国民众有一种感受是，我们拥有的自由权利以防范恐怖主义之名被剥夺。人们更容易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被拘留更长时间。人们对重申《大宪章》所代表的古老的自由权利的必要性也在不断增加。

记者：《大宪章》本身是贵族与国王之间妥协的产物。但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中，包括中国，政治上的妥协是稀有的，政治斗争往往都是赢家通吃的游戏。即使在今天，正如埃及所发生的那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赢家通吃的结局。在英国历史上，政治上的相互妥协能不能说是一种传统？这样的传统来源在哪里？

伍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忽视议会的作用。英格兰议会的出现远早于诺曼征服之后的王朝时代，在撒克逊时代丹麦人入侵时便已出现。因为源源不断的移民，英格兰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受斯堪的纳维亚北欧文化影响的国家。北欧文化中共同决策的议会民主制也延续到英格兰。因为有这样的渊源，当赢家通吃的局面似乎要出现时，例如当约克

家族在玫瑰战争中击败兰开斯特家族时，受影响的只有最顶端争夺王权的人，而议会政治则并未受到影响。

普林：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国教会。英格兰很大程度上受本尼迪克教派影响，而这个教派理念较为温和，鼓励人们通过妥协、谈判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今天英国议会的坐席安排的模式，是模仿英国修道院的模式，尽管今天人们更强调那是一种抗辩式的安排，但这也说明在过去很多时候，议会实际上是在教会里举行的。《大宪章》签署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坎特伯雷大主教史蒂芬·蓝顿，既是在约翰王时期掀起反抗的人，同时他也是亨利一世加冕协议的起草者，协议遵循撒克逊时代古老的传统，同时也获得25个反叛贵族的同意。因此，教会在其中总起着缓和局势的作用。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大宪章》与民主有何联系？

伍兹：《大宪章》与民主的一个明显联系是它对议会的强调。尽管那时候的议会在今天看来完全称不上民主，也与希腊时代的民主不同，在《大宪章》中，议会民主被模糊地表述为25个贵族封臣的协商，同时议会的职能转移到各个地方法院。如果民主意味着集体决策，特别是在一个等级制严重的社会，那么《大宪章》的确与民主有直接联系。

↑ 2015年10月13日，《大宪章》巡展在英国驻华大使馆内举行。

普林：《大宪章》第14条关于征税的条款非常重要。该条规定国王征税必须召集议会，为此他必须提前40天发出召集令，其中也必须写明他召集的具体理由。当然，并非一个国家的全体被召集起来，但这至少成为一个传统的开端。同时《大宪章》也提到自由人的概念，尽管在当时这只意味着可能不到英格兰总人口1%的人，但随着《大宪章》的不断修改，其中“自由人”的概念几乎包括了全体英格兰人。这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伍兹：我们也必须承认，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被认为是民主国家的地方，民主也可能在一些方面并不存在。在英国，妇女直到上世纪20年代才获得选举权，而在之前一半的人口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英国在上世纪才接近真正的民主。即使在美国，民主的概念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需要进一步达到的目标。美国在上世纪下半叶才让少数民族裔获得了平等的公民和政治权利。

普林：所以，当我们希望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一夜之间实现民主时，不应忘记即便在英国的历史中，民主的过程也延续了数百年的挣扎和斗争。或许，每一个民族通往民主之路，都要经历一段漫长的过程。☪

□ 编辑 徐伟 □ 供图 英国驻华大使馆 □ 美编 黄静

金马碧鸡坊不仅是昆明一景，而且这一带已成为充满生活气息与活力的商业街区。



我的故乡昆明

文 / 于坚 (作家、诗人)



从前，有一个地方叫“昆明”。
落日时分，当中国的城市从北方的平原上开始，一座一座沉入黑暗之后，南方高原之上的昆明，依然处于白昼的光芒中。这座古老的城邦接近太阳，阳光要在中国大多数都市都沉入黑暗之后，才从这个城市暗下去。因此这个城市永远有金色的黄昏、光辉的街道。

我童年的街道面对着落日，那街道像是一直铺到太阳里去。在那石板铺成的路面上，走过来倒垃圾的马车，像马神派来的使者，马车金光闪闪地停下来，赶马车的大

爹摇响黄铜铃铛，倒垃圾的人鱼贯来到街道上，他们的脸一张张被日光照亮，又消失在街区的阴影中。

昆明主要的街道都是东西向的，因此在日落之前，这个城市到处是通往落日的街道，闪着光，犹如刚刚被女仆们用抹布擦过的地板。天空蔚蓝而透明，空气清新，灰色瓦顶上的荒草微微摇晃着，梧桐树的躯干像镀金的豹子那样闪闪烁烁。落日渐渐地下去了，彩云布满天空，像是昆明周围山冈中野兽们超现实主义的梦，红色的狮子，紫色的熊，长在海绵中的孔雀，山羊的脸变成

了虎，独步于海滨的象，从巨鲸的尾巴里长出来的棉花……

为人生和栖居而创造

昆明人都是“家乡宝”，老死不离开这个地方。外地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到昆明来，是来享受生活、挣钱、放松、旅游、做爱、吃喝、摄影留念、穿花裙子、呼吸空气和阳光，甚至于娶妻生子，没有哪个会想到这里来叱咤风云，领导时代潮流。

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过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一座全国顶礼膜

拜的宫殿,它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小市民、淑女、母亲、绑着小脚的老外婆、奥勃罗摩夫式的人物和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在遥远的高原上,昆明天高皇帝远,对改朝换代不感兴趣,对中原逐鹿不感兴趣。在上世纪20年代昆明工商界的一份文件里有这样的话:“窃人生最关紧要之事莫为衣、食、住三者;天下最伤情之事,亦莫如生活被人剥夺。”昆明感兴趣的是过日子、“口福”,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阳、吃茶、冲壳子(聊天)”。这就是昆明世界的生活。

一个无比缓慢的城市,人们有的是时间来把生活精雕细刻,而置那气喘吁吁的叫做“时代”的列车于不顾。懒散,慢吞吞,“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无疾而终。你要去改造世界、去夺取天下、去“彼可取而代之”,你就离开昆明。呆在昆明,永远没有君临天下的机遇。云南出产的大人物郑和、聂耳都是离开了昆明,到北京去、到上海去、到延安去……才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和声名。

对于野心勃勃渴望风起云涌的人物来说,昆明是一潭死水,一个不会成功的地方,一个不会“出事”的地方,永远落后于时代,在时代的聚光灯之外,总是位于“过时”之中,总是处于“生活在别处”的焦虑中,孤独、寂寞、永远赶不上时髦。但对于一个热爱日常生活超过“日日新”的在路上生活的人来说,此地却是一个充满生活之欢乐的天堂。正如昆明诗人孙髯翁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中所说:“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三春杨柳、九夏芙蓉”。

这是一个对身体而不是野心有益的城市,它是为人生、为栖居而创造的,它代表了人类建造城市的最朴素理想。它不是某种文明或征服史的象征,它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建功立业的码头、你唱罢我登台的戏台。它只是大地、花朵、灿烂的阳光、丰饶的物产,只是让人安居乐业的寓所。如果你要过日子,你就留下来。选择或抛弃昆明,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哲学立场。一个功利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一个渴望“日日新”的人物会放弃昆明,但一个存在

主义者、一个享乐主义者、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李渔式的人物则会选择昆明。

风俗、语言和手工艺

在14世纪,人们从中原来到昆明,至少要走上半年,并且要翻过无数的高山,渡过无数的大河,能够活着到达就算是有福之人了。人们到昆明来,不是候鸟,而是种子,他们只能落地生根,创造生活。这些人的到来,不是带来革命和起义,而是带来帝国的文明,带来了它的图纸、风俗、语言、生活细节和手工艺。

“建都邑,成聚落,心有赖于木石泥工,云南至明洪武年间,移中原之民实滇,故房屋建筑无异于中原”。复盖屋顶的瓦,外省用的是板瓦,昆明用的是筒瓦,按规矩是皇家巨室才可用筒瓦,因为滇多大风,故明朝“特赦许用”。

在五百年间,人们精雕细刻,手工建造了一座到处是画栋雕梁、青砖汉瓦的城市。一座座古刹建造起来,城内有52处寺院:青门寺、归化寺、灵应寺、昙华寺……一个个深宅大院建造起来,无数的街道、小巷像蜘蛛网一样把它们连接着。到清末,昆明已经有150多条街道,大小巷道400多条,寺观150多处。

昆明城内已经有数百间店铺开张,一年一年,终于成为老字号。据昆明罗养儒先生说,仅马市口至三牌坊这一段(今日的正义路),就有两百多间铺子,涉及四十多个行业:银钱调换铺、金箔铺、银匠铺等。无数的花木在城中开放茂盛,这城是一个花园,茶花、梅花、菊花……罗养儒先生说,这些是一般人种植于花坛、花盆里面的,还有刺桐花、棠梨花、苹果花、十里香、打破碗等无人种植赏玩的野花,那就更多了。

大批的诗人在这个城市出现了。据统计,清代,昆明前后出过的人流的诗人有160多个。诗人的出现,使昆明得到了大规模的歌吟和描写,但大多数诗歌是以中原的景物、风俗来对照比附昆明,因此独创性的东西不多。

昆明像蝴蝶会一样,依然是一个“人民半杂夷”的多民族共处的城市,在城里街上随时可以见到少数民族,许多风俗、节日都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如六月的火把节,本是白族的节日,但各族人民都过,像春节一样重要。

在昆明“过日子”

昆明夏天的黄昏特别漫长,下午在市中心的翠湖公园喝茶,是享受之一。泡上一



2014年3月4日,云南省昆明市海埂滇池,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红嘴海鸥欢聚一堂,呈现一片人与自然的和谐美景。

壶，几个朋友坐在柳荫里面，一人躺在一把藤椅上。湖外是大街，汽车依然在行驶，但哑哑地没有声音。公园里面空空荡荡，鲤鱼从水面翻个跟斗，哗啦地一声。太阳出过一阵，雨又来下一阵，树叶上还没有湿到要滴水，就停了，像是被人用喷壶稍微洒了一下。天气就凉爽爽的，风吹柳摇，满世界像是开着天然的大空调。

几个朋友，说一下话，喝几口茶，一个个呆呆地看着阳光的影子在树上移动，想当然的认为，阳光都是洒在叶子朝着它的一面，却发现树叶的底部也有光辉，原来是从水面上反射上来的，并且又再照亮了树叶下面的人。

那阳光从树冠慢慢地向下溜，犹如刮胡子的刀片，到六点钟的时候，连树根那里都会灿烂起来，树顶却阴郁了。湖水里面飘满天上的晚霞，金色池塘，几只野鸭子在其间游来游去。出现一两个蝙蝠，公园里面到处是紫气。偶尔可以见到两个人，还在下象棋。有四个男女，还在搓麻将。

到七点半，天还亮着，但也差不多要黑起来了，蝙蝠爆发了起义，到处乱飞。当其时也，昆明人进入晚间模式，晚饭开始了。有的地方，一条街都是桌子，灯红酒绿，跑堂的都分不清自家的桌子是哪几张。吃什么的都有，宣威老火腿、广东烧腊、湖南毛家菜、四川乡巴佬、山东大饼、过桥米线、美

娘，一边翻烤着豆腐，一边为你计着数。她用若干小碟，每个小碟代表一位客人或者一伙客人，食客想吃哪块夹哪块，你吃一块，她在小碟里面扔一粒干包谷。最后数一下和你结账。

顺着湖边走，都是茶馆，都是坐满在露天里喝茶玩牌的人，不时有卖花的和擦皮鞋的从其间穿过。花是玫瑰花，五角钱一只。擦皮鞋是一块钱擦一双。又有骑三轮车的过来，车上拉着一车子植物，吊兰、剑麻、仙人掌、兰花、菊花……都是论盆卖，已经长得枝叶茂盛，买回去只需每日浇水就行。夜晚的序曲才结实，第一小节刚刚开始，喝罢茶还要吃些水果，还要找些话讲讲，还要搓搓麻将，看场电影……玩场多了。

这里写的只是昆明千篇一律的日子中的某些细节，如果要写下去的话，那是无法打断的。这种生活过去几百年中一直如此，自从昆明成为一个城市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渐渐地越来越精致讲究夸张罢了。正如，在明朝，人们建筑房屋，还仅仅是为了遮蔽风雨，过了三百年后，房屋的细节已经非常讲究，要雕梁画栋，要疏影横斜，要曲径通幽，以使人生更具有诗意。

昆明气候温和，雨水和阳光恰到好处，真是多一分嫌热，少一分嫌冷，仅仅适宜于生命。既不过分奢华，也不过分简朴，不慌

掠什么，图谋什么。水草丰美、天空蔚蓝、鲜花阳光、滇池里有生生不竭的鱼虾，等等。这个城市体验享用造物主恩赐的种种现成好处都来不及，哪还有工夫去改造这样，解放那样。

这城市的目的简单得很，就是为了过好每一个日子，按照季节和蔬菜，春捂秋冻，夏天吃蘑菇，中秋尝宝珠梨（昆明古代就有名的贡梨），春天喝阳春米线，冬日吃狗肉火锅。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怎么写得那么慢，那么不厌其烦，昆明可能最心神领会，他写的就是人们怎样“过日子”哩。

回归“日常生活”

但在三十年前，以上在昆明日复一日的生活却是罪恶的渊薮，被批判的对象、罪行。在时代的词典中，“只会过日子”，就是落后腐朽、革命意志衰退的意思，围绕着它的基本上是一群灰溜溜的贬义词。在经久不衰的批判之后，它已经声名狼藉，尊严扫地。

革命时期，有人仅仅由于擅长于“过日子”，例如我舅妈，喜欢穿裙子并且跳舞，就被流放到穷乡僻壤去改造，直到她的脚粗大到再也挤不进玲珑小巧的35码高跟鞋，只能穿解放鞋，为止。在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生活中，昆明自卑得很，它从未有过那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主天地之沉浮的殊荣。

我记得在1966年的某个时候，红卫兵北下来到昆明，在人民胜利堂建立了威风凛凛的红卫兵司令部，以唤醒这个城市沉迷在“过日子”的烂泥潭里的造反精神，真是令这个城市诚惶诚恐。这个城市永远开不了时代的风气之先，总是卑微地等着北方来的人来唤醒、来发动、来解放、来改造、来监督。稍不注意，它又过日子去了。在过日子上，这个城市总是自觉得很，文革一结束，这个城市立即重蹈覆辙，不到十年工夫，革命时期的高尚、壮丽的生活已经被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全面取代，以至像我这种出生于革命时期的写手，笔下也跟着一天天堕落起来，打字的声音和麻将牌的声音都几乎要混为一谈了。

在昆明，很少有人骑自行车的时候超过别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急着赶到哪里去的城市，从来没有一辆叫作“时代”的列车在旁边气喘吁吁地催促它，有，可能它也无所谓，让它等着吧。

国肥牛、肯德基、烧烤、小吃、烧豆腐。

吃烧豆腐最好玩，食客全部围着火塘，火塘上架个铁条的烧烤架，底下是泥炭火，上面烤建水运来的小方块的臭豆腐，烤到冒油，蘸着佐料吃。佐料分干湿两种，湿的，配卤腐汁、芫荽、辣椒、酱油等；干的，配干辣椒粉、盐巴、味精、花椒粉等。食客只管坐下就吃，不需报数，卖烧豆腐的姑

不慢。有深圳、美国来的人发现，在昆明，很少有人骑自行车的时候超过别人。这是一个永远不急着赶到哪里去的城市，从来没有一辆叫作“时代”的列车在旁边气喘吁吁地催促它，有，可能它也无所谓，让它等着吧。它从来不急着到哪里去报到，对于它来说，营造舒适人生的种种材料都已经足够，它不需要再改造什么，扩张什么，侵



↑ 1974年，昆明老街街景（左）与茶馆中的客人（右）。

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就是人生的最基本的生活，它以常识为基础。从这种生活开始，我们才有根基进行关于存在之意义的种种疑问和设想。你可以拒绝这种基本的生活，但你不能摧毁它，因为它是最后的、最基本的。没有这些，也就无所谓世界。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生活被大众所鄙视，为舆论所攻击，被视为改造的对象。真正的生活不再是它，而是某种更高尚的生活，所谓“生活在别处”。日常生活由于它的陈旧性，像大地一样的陈旧，被“革命者”视为旧世界的“老巢”。但全新的日常生活是什么呢？革命从来没有解释。革命的生活并不是日常生活，革命就是要摧毁日常，就是不断地破旧立新，为“更某某”而奋斗。

日常生活永远新不起来，所以它是革命的首要敌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最向往的生活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描写的那种生活，为了将来有一日被敌人捉住的时候不当叛徒，每天在钉满钉子的木板上睡觉。人

生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时刻准备着”，在任何时候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平心而论，这种革命家的生活确实是人生最有意义的生活之一，但它不是基本的生活，不是普遍的生活，而是特殊的生活，它没有基本的日常性，并且如果坚持这种生活的意志力不是自愿自觉的话，它对于人永远只是一种伪生活。

人们在评价歌德的时候，对这位伟大诗人——“法兰克福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总是不无惋惜。歌德应该是一个横刀跃马的战士么？他应该生活在卑俗的日常生活之上的净土中么？然而历史表明的却是——是世俗的“大公爵的朋友”歌德，而不是高尚的“人民的朋友”席勒写出了伟大的《浮士德》。这位魏玛剧院的老板无论如何比他的朋友席勒先生深刻得多、伟大得多，也亲切近人得多。对日常生活、对基本的“过日子”的否定，结果只令我们永远处于生活的肤浅部分、无根基的部分。

日常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意义

如此玄奥深邃、五彩纷呈的历史下面，它是支撑一切的东西，它是最基本的词，它是世界的河床，它不可能只服从于任何单向度的意义，如果一定要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修辞活动，去暴力地摧毁它的无意义，让它立场、路线、爱憎起来，世界就要倾斜、倒塌。但更无意义的是，我们常常不得不浪费时间来重申这种常识，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寻找意义。

前面说到哪里了？我们后来到了花间集茶馆，进去要了一壶菊花茶，话梅、瓜子，就找些话来讲，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讲到半夜二点，又吃些宵夜，才回去睡觉，六七个人，有五个是翻了墙回去睡的。这是上星期六的事情，但我可以说，这种事情，早两百年，如果有人写的话，也是一样的说法。☪

穿行于古老又新鲜的唐诗

唐诗是一片古老而新鲜的雪，能够随时取出，擦亮我们的感觉和语言。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干枯。

文 / 袁凌

在眼下，唐诗和我们的关系含有不动声色的困惑。

对普通人来说，从小学课本里的“锄禾日当午”，到成年的耳濡目染，唐诗仍旧代表着传统认同和审美标杆，地位不可动摇。

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似乎止于思古之幽情，不能与当下的人性感受发生实际联系。体现在创作领域的表现是，现代诗歌自觉斩断了传统的血缘，残存的古体诗写作则近似“打油”，鲁迅文学奖中的诗词类评选沦为闹剧。

我们想到李白、杜甫、李商隐时，会觉得他们是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里写诗，意境令人神往，经验却与今天不具可比性。一句“盛唐气象”或“天人合一”，往往就笼罩了他们的面目。诗人们与世界的关系，对待物质和自身的态度，人性的层次脉络，与我们所处的现代有了本质的隔绝。

这也意味着，唐诗更像是家中祖传的旧物，虽然亲切，引人摩挲，却失去了哺育生命的性质，不再提供创造的原动力。这种现象移植到荷马史诗或者圣经诗歌上，都是难以理解的，它们更像是后代人不断反向挖掘、汲之不尽的井。

唐诗的恒久生命力

是唐诗不具备延伸至现代的内在生命力，只能停留那个限制了它的“黄金时代”里；还是我们回头打量唐诗时，视距和角度已经出了问题？

这是我在早年接触唐诗的经历中隐隐感到的一种疑惑，一种不适。由于青春期



《在唐诗中穿行》

袁凌 著
东方出版社



对李商隐的偏爱，这种不适更趋强烈。作为所谓“朦胧诗鼻祖”，李商隐的诗里找不到通常的“盛唐气象”或“圆融意境”，反倒对于破碎、分裂、寂寞、晦涩有着独特的传达，个体性非常强烈，与青春期的我心境似乎天然互通。或许有人将李商隐及李贺看作唐诗中的异数，但以后在对孟浩然、杜甫、王维以至李白的阅读中，我仍然能感到强烈的个体性差异。

对于一般“盛唐之音”观念的不适，也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在近著《在唐诗中穿行》里试图探寻和释放。

探寻的路径，需要摆脱对“盛唐之音”的成见，把诗人们还原为生活中的个人，考察他们笔下的个体生存经验，与今天的我们有无共通之处。一旦摆脱“盛唐意境”和“天人合一”的笼统意象，我们会发觉他们的体验真实而具体，在可靠性和内在性上，与今天的我们并无绝对阻隔，反倒可以在

细致灵敏上疗救现代的某种麻木贫乏。更进一步说，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现代人”，而我们也并非远远超前于他们的感觉世界。

举例说，孟浩然笔下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或者柳宗元的“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在“意境清绝”的评价下，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对世界的观察，不只是外部性和笼统的，在精确性和内在意识上不逊于甚至超出现代人。这种精确或“体物入微”正是现代人丢失的语言能力。

杜甫在《北征》或者《赠卫八处士》对野果灌木、韭菜黄粱不厌其烦的描述，不仅是以诗为史，更含有对有限物质的珍视，对个体生存与物质世界供养关系的领会，这完全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存在意识。卢照邻在生前预先为自己营造坟墓，偃卧其中，隔绝世事，更可以说是在直面死亡中保存个体强烈的存在意识，含有通向西西福斯或“局外人”的讯息。

即使是天才诗人李白营造的“秋浦”，不也充满了晦涩恍惚、潜意识与现实交汇，成为某种存在状态的隐喻？在某种程度上说，“秋浦歌”正是朦胧诗的鼻祖，李白并非只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豪放。

以我们熟悉的唐诗的主题“友情”来说，在杜甫写给李白的诗中，既有“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这样的明快表达，也有得知李白流放消息之后写下的晦涩奇诡梦境。“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的诗句传达的，与其称为意境，不如说是隐喻，喻体是诗人命运抑或时代转折。

唐人与今人的精神共鸣

从作为普通人的生存、情感、身体以至自我实现需求上说，唐代诗人和我们并无不同。王维在借助玉真公主推荐成名，以后又身陷叛军的经历，显露了人生的无奈。

在他努力寻求内心安宁的诗句中，仍旧传达了无处不在的灵魂分裂感。从大处说，“安史之乱”的转折构成了整个盛唐诗歌的背景，任何诗人都需面对这一时代和精神的断裂，危机和冲突的张力内嵌在他们的诗歌中，这远非“意境”“气韵”等名词能够传达的。

在外部世界传达上，唐诗大大拓展了前代的边界，又保留着认真细致观察事物的视角。在意象营造、情感传达、物质观察上，唐诗已经超越了前代的单纯讲究气韵风骨或物象铺排，到达了体物入微又意在言外的层次，也就拥有了超出具体描摹的隐喻能力。这种建立在坚实意象之上的隐喻性，是现代文学和感觉方式的特征，可见其并非前无古人。

这并不是说要否定唐诗的意境之美、气象之宏。正是在个体生存体验、时代冲突张力的根基上，盛唐气象的意境才获得了超越性意义，而不是无病呻吟的绮靡或者是空虚抽象的玄言。

摆脱了对唐诗的成见，我们和唐诗的

对世事的承担、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李白提示了我心灵想象的能量和现实限制的边界；孟浩然、韦应物这样的诗人则更多磨炼了我对外部事物的观察体会。

不管是诚实、认真地面对理想、情感和外界，还是精确入微地观察体会事物，都是信息复制和消费主导时代我们正在丢失的某种能力，我们与物质世界的联络被消费链条置换，人际关系陷于密集信息围困下的疏离，体现在语言上，是无力面对和传达事物真实、只是沉溺于情绪的吐槽或鸡汤。这正是我们要反身求助于唐代诗人们之处。

自然，唐人和我们生活的世界相差很大，工业化制造的诸多事物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其间划出了鸿沟。但人性的深层结构和物质与人的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改变，这是古老信仰可以延续的原因，自然也是唐诗可以和当下人性相通的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唐诗是一片古老而新鲜的雪，能够随时取出，擦亮我们的感觉和语言。它也是掘在庭院中的一口井，眼下仍可汲取，永不干枯。具体到文学创作上，它的意象、精神和方法，理应为现代诗歌和文学提供取之不绝的营养。

《在唐诗中穿行》这本书的来源，也含有不乏深意的机缘：因为躺在春天潮湿的

回到个人的阅读史，如果说李商隐和李贺拓展了我在青春期的感受世界，提供了打量自我的镜子；杜甫和高适带来了成人对世事的承担、对个人与世界关系的认识；李白提示了我心灵想象的能量和现实限制的边界；孟浩然、韦应物这样的诗人则更多磨炼了我对外部事物的观察体会。

关系才会血脉贯通。如果唐代诗人的感受和我们并非全然隔绝，那我们今天能从唐诗当中吸取什么？

回到个人的阅读史，如果说李商隐和李贺拓展了我在青春期的感受世界，提供了打量自我的镜子；杜甫和高适带来了成人

地面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发病，初次体会生死后回溯唐诗，由同患肺病的李贺发端，探索前代诗人和认识自己，寻求生命的安顿。这番机缘，大约也说明了我们与唐诗的血脉关联。❶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

书屋

《拯救最后的犹太人》
亚瑟·纳伊姆(以)著
徐佳蓉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生活着一支独特的黑人部落，他们与世隔绝，却严守古老的犹太教规，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后的犹太人。1990年，冷战格局松动，埃塞俄比亚内战爆发，以色列政府决定拯救这支失落已久的部落，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

《父亲南怀瑾》
南一鹏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迄今为止首部完整还原南怀瑾一生的传记作品，作者南一鹏是南怀瑾第三子。本书从“继志述事”的立场，详尽述说了南怀瑾少时在家乡开蒙立志、青年离乡拜师访道、而立去台湾弘文励教、花甲至美国传道授业、晚年归根定居太湖等重要人生阶段的点滴故事。

《穿越中世纪》
让·韦尔东(法)著
赵克非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此书描绘了中世纪的广阔世界，从视野超不过所在教区、市集、磨房或乡镇的农民，到“旅行者”，再到伟大的探险家和那些在幻想世界里旅行的人，各色人等，勾勒出了中世纪的社会风貌。

《大先生》
李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此书是以鲁迅为原型创作的话剧。剧作家李静所写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死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❷